

5061/5600.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MASS., U. S. A.

# 中國語文

SEP 11 1967

总第55期

21 55-66

1957:1-12

1

1957

C35

1957年1月号(总第55期)目录

語法研究的理論意义和实用意义 .....	張志公 (1)
汉语語法中字和詞的問題 .....	楊柳桥 (6)
說“所以” .....	刘冠群 (9)
說“除非” .....	黃誠一 (11)
談語音对应关系 .....	張拱貴 (12)
怎样記詞彙和語法例句 .....	李榮 (17)
談歌曲演唱怎样掌握标准音問題 .....	刘明綱 (24)
談談語言学(語言学講話之一) .....	彭楚南 (27)
評汉字笔順排檢法 .....	周勛初 (30)
元代杂剧中的若干譯語 .....	蔡美彪 (34)
从附加成分看懂語的詞类 .....	王澤宏 (37)
国际上关于科学技术術語的工作 .....	H. K. 苏賀夫 (38)
語文短評 .....	(43)
書刊評介 .....	(45)
信箱	
多叠并列的最后兩叠之間加“与”类連詞的問題 .....	斯尔鑫、蕭斧 (49)
复合句和停頓 .....	孙毓萃 (48)
动态	
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 .....	郑达 (29)

# 語法研究的理論意义和实用意义

張志公

語法研究的理論意义和实用意义应当是統一的，然而在我們的語法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理論和实用互相脫离的傾向，甚至于在一部分研究工作者心目中，存在着理論和实用互相对立的傾向。这种傾向对于我們的語法研究工作是有害的。

語法研究的理論意义主要表现在对語法的正确認識上。例如，对某一种語言在某一个时期的各种語法現象正确地作出分析解釋，从而總結出規律；对一种語言的語法正确地作出历史的描述，从而闡明它的發展道路；对几种語言的語法正确地作出比較，找出它們的异同，从而闡明語法上的一般原理；正确地闡釋語言和思維的关系；正确地闡釋語言和历史的关系；等等。

語法研究的实用意义表现在对人們的語言实践的指導上，就是說，語法研究能够幫助人們正确地使用語言。

当我們能够对語言現象正确地作出分析解釋，并且總結出規律的时候，这規律必然就有指導語言实践的作用；反过來說，要是我們的語法研究的确能够指導語言实践，必然是由于它对語言正确地作出了分析解釋，找出了規律。

很难想象有这样一种語法理論，它跟語言实践沒有关系，然而可以肯定它是正确的；也很难想象有这样一种語法書，它能够很好地指導語言实践，可是它不是建立在正确的理論基础上的。

这个道理原是非常淺显的，然而我們在語法研究的实践中常常沒有这样作。

忽視語法研究的实用意义，为理論而談理論的現象，在我們的工作中是相当显著的，如果不用“严重”这个字眼的話。这里我指的特别是关于现代汉语語法的一般性的研究工作。

語法学者对某一种語言現象提出了一种理論上的解釋，學習語法的人問：“这样的解釋对我们运用語言有什么帮助呢？”学者們对这样的問題往往是不回答的。心里的答案是：“我作的是理論工作啊！”或者“这是描写語法，描写語法就是这样的啊！”这样的答案也偶然有人說出来过。

是这样的嗎？要是—种理論上的解釋不能在实践之中加以驗證的話，这种解釋就已經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嗎？我不这样想，恐怕也沒有人这样想。然而我們对于这种不能在实践中驗證的解釋，特別当它是由自己提出来的时候，倒是深信不疑的。語法学界的許多討論，也大都关于这类解釋的。我認为，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問題。

关于汉语的詞类，我們有过几种不同的解釋。一种是：汉语的实詞可以分为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几类，但是它們可以互相轉化，名詞可以变为動詞或者形容詞，動詞可以变为名詞或者形容詞，形容詞可以变为名詞或者動詞。理論上的解釋到此为止。是所有的詞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变嗎？如果不是，那么哪些詞在哪些情况之下可以变，哪些詞在哪些情况之下不能变呢？可以变的是怎样变法呢？这些問題，在持这样說法的著作里找不到回答。于是問題發生了。一位相信詞类轉化的教师批改学生的作文。作文里有这样一句：“我們的工作一定要榜样

\* 本文是作者根据在中国語文社青島語法座談会上發言的大意改写而成的。



着先进生产工作组。”(这是职工业余学校的学生。)教师說这个句子錯了。学生問为什么。教师說“榜样”是名詞,不能作動詞用。学生說,詞类不是可以轉化嗎?它用在謂語的位置上,变成動詞了。这不完全合乎先生講的規律嗎?教师沉吟良久,說:“这个名詞不能变。”学生問:“为什么呢?先生怎么知道的呢?怎么知道哪个可以变,哪个不能变呢?”教师默然。

另外一种解釋是:这几类詞基本上是不变的。凡是持这种理論的,联系到造句法上必然得出这样一种結論:每一类詞都可以作各种句子成分,例如形容詞,既可以作定語、謂語,也可以作主語、宾語。理論上的解釋也就到此为止。是所有的形容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作主語、宾語嗎?如果不是,那么哪些形容詞在哪些情况之下可以作主語,在哪些情况之下可以作宾語呢?也找不到回答。这同样要發生問題。学生写了这样的句子:“資本主义已經达到了腐朽。”教师說句子錯了,因为他誤把形容詞“腐朽”当作名詞用了。学生問:“不是說形容詞可以作宾語嗎?”教师給問住了。

事情很清楚。上边說的两个理論都缺少了很重要的后半截。正是因为缺少了这个后半截,这些理論表現不出应有的指导實踐的作用,而同时,作为一个理論,也由于殘缺不全而失去了应有的可靠性。我不是在討論詞类問題。我的意思是說,無論从語法学的实用意义着眼,或是从語法学的理論意义着眼,都不能这样脱离实际地談理論。因为,作为一个理論,它是殘缺不全的;如果說这是“描写語法”,这样的描写对于所描写的对象还不能提供完整的面貌,因而是缺乏說服力的。为什么我們願意滿足于这样的工作呢?为什么我們不更进一步去探索那个后半截呢?只有当我们找到了后半截的答案的时候,我們的理論才是个完整的理論——干脆說,才成其为理論,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們的理論才有指导實踐的作用。

在句法方面的一个根本問題上,我們同样也还是停留在半路上。每个語法学者都敢肯定地說,在漢語里,“主—謂—宾”格式的“我吃魚”不能說成“宾—謂—主”格式的“魚吃我”。可是漢語里能說“魚我吃”。在这个現象面前,大家有了爭論。有人說“魚”是主語,“我吃”是它的謂語,有人說“魚”是宾語倒裝。爭論双方的理論解釋都到此为止。說“魚”是主語的,不能說出,似乎也不求能够說出,謂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对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或者必須,表現为句子的主語;說“魚”是宾語倒裝的,也不能說出,并且也似乎不求能够說出,什么样的宾語在什么情况之下必須倒裝,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倒裝,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倒裝也可以不倒裝。大家都滿足于“这不明明是句子所要說明的主体嗎?”“这不明明是動作的对象嗎?”这一类的討論。至于学語法的人怎样把这些理論运用在語言實踐之中,大家都似乎觉得那是分外之事,不必过問。其实,那显然不是分外之事。当我们还回答不出“在什么情况下必須,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的时候,这个理論本身还是很不完全的。讓我們的理論完整起来,这是我們研究語法的人的無可推卸的責任,——即使我們認為直接指导語言實踐是語文教师的事。

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姑且提几个在語法書里不容易找到答案而学語法的人渴望答案的問題以見一斑吧。

“从、往、向、朝”这些詞應該划归哪一个詞类,或者應該叫个什么詞类,我們曾以很大的兴趣来爭論。实用上的一些問題,我們很少注意过。我們可以說“這間房朝东”,“朝东的大門”,也可以說“你往东”,“我往西”,“往南的大道”,可是不能說“你从东”,“从东的火車”。什么道理呢?这些詞,無論叫“介詞”或者“副動詞”或者别的什么詞,哪些个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帶上一个名詞或者方位詞作謂語或者定語,哪些个不能?为什么?不要認為这是沒有意义的問題。前些天,兩位同志为一篇文件的标题爭論起来。这个标题是“某某向大会的报告”。甲同志說这个标题不妥,得在“向大会”后边添上“作”或者“所作”,因为“向什么”只能修飾動詞,不能修飾



名詞(他們都認為这里的“报告”是名詞);乙同志說不必,因为語法書上說過,“介詞(或者副動詞)帶上它的賓語能作名詞的附加語”。甲並沒有被折服,他馬上举出了“从东的火车”那个例子。我們怎样替這兩位尊重語法的同志从語法的角度解决这个問題呢?

“所”應該叫作什么詞,若干年前就引起过很熱鬧的爭論,到現在也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它的用法呢?几乎所有論到这个詞的語法著作里都說,象“所說的話”里的“所”,在現代口語里是可以不用的。事实并不如此。把“所拥护的人”里的“所”去掉,变成“拥护的人”,会根本走失原意的。在一本講历史的書上有这样一个句子:“唐太宗認為,对于被征服的国家應該采取…的政策。”有一位不知道“被”“所”叫什么名称的同志說,这里的“被”字用得不对。用了“被”好象不是專指被唐太宗征服的国家,而是泛指一切被征服的国家,这显然不是原句的意思,可是去掉“被”又很别扭。他認為这里應該把“被”改成“所”。我觉得这位同志是很有見地的。可見“所”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可有可無。那么什么地方一定要用它呢?要是我們能說一說这条規律,我想是远比討論“所”是什么詞更能帮助那本历史書的作者把那个句子写对了的。

“的、地、得”該算哪类詞,算不算詞尾,这从来就是我們很感兴趣的問題。可是这些东西什么地方必須用,什么地方一定不用呢?我們談得極少。最近听見三位編輯同志辯論这样一个問題:“听得見听不見?”能不能說成“听見听不見?”“听不听見?”三个人三个意見:一位認為只有第一种說法是对的,一位認為前两种說法对,一位認為三种說法都行。这大概該算是語言规范問題。在我們已經严肃地提出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口号之后,当書籍、报刊的編輯同志希望得到我們的帮助为出版物中語言的純潔健康而努力的时候,我們不能認為他們这一类討論是沒有意义的。可是答案呢?我們不曾提出过。到現在似乎也还很少有人企圖为提出这样的答案而爭論。我們的爭論中心还是在“的、地、得”是不是詞尾或者是哪一类詞上。

結束我的举例吧。为一种極普通的事实举很多的例子是沒有必要的。

語法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傾向,在各个有关方面已經产生了十分可虑的影响。

近兩年來,我在工作中接触到跟語法有关系的好几种人。他們需要通曉汉语語法;他們念了我們現有的某些語法書;他們稱贊語法学家幫助他們解决了一些問題;他們敬重我們的語法学家。但是,我也时常听見他們对語法学家說些“抱怨”的話——不,應該說是些“期待、渴望”的話:他們在工作上不少的困难迫切地等待着語法学家幫助他們去克服。我想,明了一下他們的情况,對我們是有好处的。

有一位念速成中学的工人同志在溫習語法課,(用的是他們省里編的一种語法教材,每星期上課一小時,)我問他:“這門功課好學吧?”他回答說:“誠難哩啊!”(他說的是山東話,意思是“實在難哪!”)我說:“學了有用,難一點怕什麼?”他皺了皺眉頭:“用不抗(去聲)啊!”(意思是“用不上啊!”)我知道有不少的念速成中学的工人和机关干部對語法課給了同样的兩句評語。

教語法的語文教師近年來都為語法體系分歧、莫衷一是而苦惱,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去說它了。有些教師還有一個更大的苦惱:學生運用語言的能力,看不出顯著的提高,至少,提高的程度跟他們學習語法所付出的勞動不相稱。

編寫語法教材的同志,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課本的編者和我所知道的別的地方編寫語法教材的一些人,在他們的編寫工作之中遭遇了很大的困難。擺在他們面前的各家語法著作和論文之中,有一種材料多得使他們為難——分歧的術語和解釋,另一種材料又少得使他們歎氣——各類詞和各種結構格式的具体用法。“牆上挂着一張畫”這樣一個句子,甲說“牆上”是主語,乙說“一張畫”是主語,丙說這是個無主句,沒有主語。甲說,說“一張畫”是主語是純從意念出發,這是什麼主義;乙說,說“牆上”是主語是純從形式出發,這是什麼主義;又一個人說,

說“牆上”是狀語，全句是無主句，是折衷，這是什麼主義。教材的編者們十分苦惱了：這樣說也是個主義，那樣說也是個主義，他們的教材無論選擇哪一種說法，都注定了要陷入一種主義，怎麼辦呢？能夠讓中學的孩子跟着專家們一塊兒百家爭鳴嗎？編者們更困惑的是：無論哪個詞是主語，難道語法教學可以講到這裡就拉倒嗎？可是各家著作中的確是講到這裡——指出了哪個詞是主語，哪個詞是什麼語——就拉倒的。

書刊報紙的編輯們，青年作家們，這幾年對作品語言的正確性越來越注意了。人民日報左一次右一次的號召，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編輯們和作家們是十分重視的。自命是精通語言的或者視語言為雕虫小技的編輯和作家雖然不是沒有，然而只是極少數。可是我確實知道有為數不少的編輯和作家在語法書的分歧繁復到難以理解的術語和解釋面前卻步，有為數不少的學習小組不能把學習堅持到底，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參加語法講習班之類，結果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因為他們發現，學了一陣之後，除去知道了一些術語、解釋之外，在運用語言上“依然故我”。當然，他們的學習不是毫無收穫的，他們的學習方法也不是沒有缺點的。然而，作為語法工作者隊伍中的一員，回頭看一看我們自己的語法書籍和論文的内容，責任感使我不願意夸大他們的收穫，更不忍去指責他們的學習方法。

更不好的影響表現在中等學校的語法教學上。前邊說，有的語文教師為語法教學不能很好地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而苦惱。可惜的是，這樣的教師在今天並不占多數。更多的教師却跟着專家們走上了為理論而談理論的道路。儘管教學大綱上明白指出語法教學要密切連系實際，要重視練習作業，要善于啟發學生的思維活動，可是不少教師往往還是習慣於開口先講一個術語，說一套理論，然後舉兩個例子的教學方式。教師們聚在一起的時候，討論得最熱烈的不是怎樣指導學生作練習，怎樣讓學生說得寫得更好，而往往是“為什麼說這個是詞，不是詞組呢？為什麼說這個是主語，不是賓語呢？”這一類“理論”問題。作為語法工作者隊伍中的一員，我不願意責備教師不懂語法教學，我不贊成“教學問題是教師的事，不能讓科學家兼作教師”這種說法。中學教師是從我們的語法著作里學到語法的，是從我們高等學校的課堂里出去的。在我們講語法的著作里和課堂上，語法就是這樣講的，中學教師怎麼會不跟着走呢！中學的語法教學要是不能收到夠好的效果，我認為語法研究工作者是不能辭其咎的。

我想我不至於被誤解為否認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有人把語法上的術語、解釋看成累贅，討厭術語、解釋，也有人認為術語、解釋無須討論，講語法的時候，無論對語言現象怎樣解釋，無論用什麼術語，無論採取什麼樣的體系，都可以，都無關緊要。我不同意這一類的想法。果然是這樣的話，我們又何必批判什麼理性主義語法，批判什麼三品說呢！我的意思是，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作得還太差，主要的缺點是不能結合實際，而不能結合實際的理論是靠不住的。我們的任務不是停止理論研究，絕對不是，而是要把理論研究在今天的基础上向前推進一步。我們不能停留在解釋“這是什麼，那是什麼”上，我們還要往前走，要能找出“該怎麼樣，不該怎麼樣，什麼時候怎麼樣”的規律。說得出“該怎麼樣，不該怎麼樣”，才能有力地證明“這是什麼，那是什麼”的論斷的可靠性。試想，要是我們透徹地分析了什麼時候該用“的”，什麼時候不該用“的”，也就是說，當我們看清了“的”跟別的詞結合的規律的時候，對於我們斷定“的”的性質（是詞尾，還是獨立的詞，如果是詞，是哪類詞）能夠沒有幫助嗎？顯然，不止有幫助，而且是強有力的論據。而同時，說得出“該怎麼樣，不該怎麼樣”，語法研究也就有了實踐的意義。反之，如果我們只能憑着自己相信的道理斷定“的”是什麼，而說不出“的”該怎么用，這個論斷不僅缺乏實踐意義，同時也缺乏說服力，因為架空地談道理，就必然“見仁見智”，各是其是。我想，我們的語法體系之所以如此分歧，對一些極普通的語言現象的解釋之所以如此不一致，跟我們脫離實



际的研究方法是大有关系的。

前边我声明过,在这篇短文里,我談的着重在现代汉语语法的一般性的研究工作上。各种专题性质的研究,例如语法史的研究、方言比较语法的研究等等,我没有談。那些工作显然都是必要的,可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那一类的研究工作也能很直接地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语言实践。然而,就是那一类的研究工作,它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仍然是統一的。第一,例如,研究历史上的某一个语言现象,也得考查那个时候人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规律,不能單憑自己相信的道理去論断、解釋。第二,研究语法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语言;研究方言语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方言。第三,研究语法史或者方言语法或者别的什么,都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现代普通話的语法规律,因而对于指导今天的语言实践,仍旧是有意义的。从这几方面来说,在任何性质的语法研究工作中,讓理論离开实际都是不足取的,那样进行研究工作,要有好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语法教学方面,我也不是說,教给学生语法只是为了讓他們知道話该怎么說、不該怎么說的。知道了詞可以分类,知道了汉语的詞有哪几类,知道了句子可以分析,知道了汉语的句子有些什么成分,等等,这些知識本身就有用,而且对于培养認識能力和思維能力有很大的意义。忽視语法教学的这方面的作用,應該說是不正确的。然而语言是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而存在的,我們是为了掌握运用这个工具而学习它的,那么知道该怎么說、不該怎么說,这个要求就是正当的,必須滿足的。

还得声明,我不是說追究“該怎么样、不該怎么样”的工作我們一点都沒作,也不是說这项工作很容易,只要我們肯作,明天早晨就可以作得好。(自然更不是說我比别的语法学界的前輩們和同道們作得多些。前边說的那些問題,在我的一些淺薄的作品里也是同样找不到答案的。)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在这方面的成績还嫌太小,跟起名目、下解釋的工作比起来,我們所作的努力更嫌太少。尤其重要的是,我們作语法研究工作,必須从認識上到实践中把这个工作的理論意义和实用意义統一起来,不讓它們分离,不讓它們对立。我們應該迅速地前进,为了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广大的語法学习者的利益,也为了語法理論的提高。

## 編者的話

本刊去年的編輯方針今年不作原則上的变动,不过在具体任务上今年想着重在:(一)貫徹“百家爭鳴”的政策,开展語言学有关問題的爭論。为了帮助讀者理解爭論的內容,本刊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做出整理式的总结,不打算过早地强求学术上的結論;(二)帮助語文工作者提高語言学的理論知識和实践能力;(三)进一步討論汉语规范化問題,同时对于使用語言的不正常現象加以評論,以促进祖国語言的純潔和健康。

在此年初,我們觉得有必要再一次明确所謂“中国語文”的性质,我們的刊名所說“語文”兩字指的是“語言”和“文字”,因此,請讀者不要因为本刊沒有登載文艺理論或文艺作品的稿件而責备我們。至于語文教学方面,因已有《語文学习》和《語文教学》分工,本刊只能談一些理論上的問題,而不涉及專篇課文的分析。

《汉语拼音方案》即將公布。随着这个方案的公布,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需要研究、討論的問題提出来。我們欢迎这方面的来稿。

許多讀者对本刊提出意見,說我們長篇大論的文章过多,而这些文章从內容方面来看,又未見得非写这么長不可。我們觉得讀者这项意見是正确的。本刊决定今后少登冗長的文章,多登簡短精煉的作品。



# 汉语语法中字和词的问题

楊柳桥

汉语自从有语法书以来——即使溯到有语法书之前——大都以“字”作为构成语句材料的最小单位，不大说“词”这个名称。像马建忠的《文通》、来恂的《汉文典》和严复的《英文汉沽》，都是如此。后来的语法书才渐渐地改称为“词”，并且“字”和“词”在涵义上也有了区别。

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是这样区分的（所有的着重点都是引者临时加的，下同）：

字就是一个一个的單字。词就是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語詞。有时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如“人”“馬”“紅”“来”等。有时要两个字以上组合起来才成一个词，如“鸚鵡”“老头子”“便宜”“吩咐”等。文法中組織句子，分別詞類，是把詞作單位；不問它是一个字或是几个字，只要表示一个观念的，就叫做詞。<sup>①</sup>

最近黎锦熙、刘世儒合编的《中国语法教材》，还是这样主张，只不过加上了“單音詞”和“复合詞”两个名词并几个新例子而已。<sup>②</sup>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还不够明朗。

吕叔湘先生在所著《语法学习》中解释得是比较详尽的：

语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单位是词，而文字的最小独立运用的单位是字。一个字可能是一个词，也可能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可能只有一个字，也可能不只一个字。例如：“語”和“言”是两个字，但是“語言”只是一个词。……

要知道词是什么，还得从语言的本质说起。我们听人说话，耳朵接触一连串声音，同时脑子里接受一些意义，可见语言是声音跟意义的结合。词就是这种结合的最小单位，例如“語言”；再分析下去就只有声音，没有意义，至少是没有明确的意义了，例如“語”和“言”。<sup>③</sup>

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对“字”和“词”的解释和上面却有点不同：

讲语法的人不大理会“字”这个东西，要讲“词”。词是什么？跟字有什么区别呢？粗疏一点说，字是形体和声音的单位。词是意义的单位。一个字可能也是意义的单位，那个字就同时是一个词；但是许多词是两个字合成的，有些词是三个或四个字合成的。前者我们管它叫單音詞，后者我们管它叫多音詞。如“人”“手”“吃”“喝”，每个字都是有意义的，所以都是词。这是單音詞。“言”“語”“民”“义”这些个，说在嘴里，听在耳朵里，意义都不明确，都只是字，不是词；只有“言語”“語言”“文言”“口語”“人民”“农民”“民主”“主义”“意义”这些才有明确的意义，才是词。这是多音詞。<sup>④</sup>

以上是吕先生对于“字”和“词”的定义和它们的区别，前者说词是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结合的最小单位，字是表现语言的形体的最小单位；后者说，“字是形体和声音的单位，词是意义的单位”。这两种说法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究竟哪种比较恰当呢？我认为是前者。因为语言是以声音为主，以声音代表它的意义；词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斯大林），当然词就是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结合的最小单位，而字不过是固定在書面上的语言的符号而已。那末，后一种的解释，只说“词是意义的单位”而忘了意义是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这一层，显然是不大恰当的。但是，说“字是形体和声音的单位”，却没有错，因为字是表现声音的符号（形体），当然声音也就显示在形体之中了；声音在“字”中究竟不是主体，而只是属性。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而且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与思维直接联系的学说的。

原来，“字”和“词”在概念上的区别，我们祖国的伟大的文字学家许慎早已就分辨得很清楚了。他在他的《说文解字》的自序里说：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类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

他又在“文”字下的解说是：

文，造画也。

可见虽然总起来叫做“文字”，但是“文”是“字”之本。所谓“造画”（交错的笔画），所谓“依类象形”，都是指的表现语言的符号的形体。所谓“形声相益”，便是根据“造画”的形体——当然它也代表着声音——再孳生出来的字形。但是根据“形声相益”的解释，可以看出文字既是形体，又是声符；而其主要的作用是用它来把语言形象化地固定在書面上。

《说文解字》在解说“词”字的时候又说：

詞，意內而言外也。

这里所谓“意”，即是思想，即是“意义”；所谓“言”，即是语言，即是“声音”。“意內而言外”，即是说，一个词是以意义为内容，以声音为外表。这和吕先生的前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2—4页。

② 黎锦熙、刘世儒：《中国语法教材》，第一册，9—10页。

③ 吕叔湘：《语法学习》，2页。

④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8页。

一种解釋——詞是語言的聲音和意義的結合的最小單位——完全相符合。這不是偶然的，這完全是合乎邏輯學的。並且，《說文解字》在“說解”“文字”的涵義的時候，還是以“詞”做單位；即：這個字是一個詞的時候，就單獨地解釋這個字；這個字如果不成一個詞的時候，就聯系到其他的字，一塊兒去解釋。例如：

人，天地之性最靈者也。

民，眾氓也。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忼，忼慨也，忼慨，壯士不得志于心也。慨，忼慨也。

（據段氏本）

嵯，嵯峨，山貌。峨，嵯峨也。

我國最早的一部訓詁學著作《爾雅》，就是如此。例如，“釋詁”“釋言”兩篇，大都是單音詞；而“釋訓”一篇，大都是複合詞；其他各篇，也都是以詞為單位，不以字為單位。許慎的解釋，當然是淵源於此的。可見我們祖國古來的語言學家就對“字”與“詞”在概念上已經有明確的區別了。

但是，還有的語法學者對“字”和“詞”這兩個概念是很模糊的。例如，傅子東先生的《語法理論》說：

詞由形体、聲音、意義三件東西構成；方塊漢字就是它的形体，聲音和意義都從它產生出來。<sup>①</sup>

我同意許紹早先生對他的批評：“這樣說法有兩種錯誤：（甲）把語言和文字混為一談；（乙）把語言當做文字的產物。”<sup>②</sup> 所以，我認為傅先生也犯了唯心論的錯誤：許紹早先生總結“詞”的解釋，我感到很精當：

語言中的詞是由聲音和意義構成的，聲音就是它的形式，意義就是它的內容。<sup>③</sup>

這是完全符合於《說文解字》的“意內而言外”的解說的。但是許先生又說：

文字只不過是書寫語言的工具而已。<sup>④</sup>

我認為卻不大合適：文字是“工具”，語言又何嘗不是“工具”？並且說成“書寫語言的工具”，也不大合乎邏輯，幾乎令人誤會到“紙、墨、筆、硯”上。應該說成“書寫語言的符號”，才比較恰當一些。

至於王力先生對“字”“詞”的觀念，似乎也是糾纏不清的。

現在我們再看看呂叔湘先生對詞的看法。他認為“語”和“言”都不是詞，只有“語言”或“言語”才是詞。並且說：

這個話你也許不信服，你會說“語”和“言”字是有明確意義的。要知道這完全是靠漢字的力量，說話的時候，是只聽見字音不見字形的。你單說 y，人家只會想到天上掉下來的“雨”，你單說 ian，人家只會想到廚房里的“鹽”；誰會想到“語”和“言”呢？只有 y 和 ian 連起來說，人家才知道是“語言”才是一個正確的意義和聲音的結合體，才能獨立運用，才是一個詞。<sup>⑤</sup>

果然如此，那末，“一言不語”“一言不發”“五言詩”“七言詩”以及“細听我來言”等等的詞語，還活在人民大眾的嘴里，應該怎樣解釋呢？是不是它們就不能代表“明確的意義”呢？是不是“完全靠漢字的力量”呢？我反倒感到“語言”一詞，在人民大眾——尤其是在廣大的農民——中，卻還不大普及，他們听了反而領會不出“明確的意義”，這又應該怎樣解釋呢？再說，“語言”這個詞，在構成形式上應該屬於哪一種呢？照呂先生的說法，當然不能管它叫做聯合式的複合詞了。如果叫它多音單詞，合適嗎？至於“文言”“口語”等詞的構成形式，也恐怕沒法解決了！

再就是，呂先生說字的所以具有明確意義，“完全是靠漢字的力量”，並且以“語”和“雨”、“言”和“鹽”為例，也不妥當。我們如果舉出一個 yil 的音來，我們能不能斷定它有沒有哪一種的“明確的意義”呢？如果照呂先生說，他一定以為不能成一個“詞”。但是，這個 yil 音，放到“滿屋子淨是人”、“大家都靜了下來”、“我敬了他一杯酒”等語句里，却都是一個有“明確的意義”的詞，又應該如何解釋呢？

呂先生以上的解釋，是有他的理論根據的。他們在《語法修辭講話》的序中，談到語言的標準問題時說：

一般地說，我們應拿現代漢語的語法規律做基礎，……文言成分……應用文言本身的規律來批判……<sup>⑥</sup>。這裡好像呂先生把漢語分成了兩個“規律”，因而談語法中的詞彙的時候，也一定要使“文言”和“現代語”分家：講語法一定要以現代語作一切的標準。

這樣主張最明顯的，還算是張志公先生。他在《漢語語法常識》中說：

說某個字是詞，某個字不是詞，是以現代話作標準的。古文里的句子，或是現代人的文章里，偶爾引用古語或採用古文的句法，我們不管。成語里偶然有些特殊的現象（很多是古語里遺留下來的），也不能拿來當做說明現代語法的例證。<sup>⑦</sup>

理論雖然如此，但是張先生在他的實踐中，卻又不一定這樣了。像他在“詞的構成”中所列的“意義相反或相關的兩個單音詞連在一塊兒”的結合式的複詞中，把“頭腦”、“矛盾”、“是非”等詞列入；在“兩個意義相近的詞連在一塊兒”的聯合式的複詞中，把“家庭”、“學校”、“親戚”、“道德”、“智慧”、“褒貶”、“美麗”等詞列入；在“其中一個詞的意義是主體，另一個詞的意義是從屬於

① 傅子東：《語法理論》1頁。

②③④ 《中國語文》1955年1月號，30頁。

⑤ 見《語法學習》，2頁。

⑥ 《語法修辭講話》序，2頁。

⑦ 張志公：《漢語語法常識》，5頁。



这个主体的”組合式复詞中,也把“鞠躬”“革命”“建設”“免职”“报仇”等詞列入;試問“腦”、“矛”、“盾”、“非”、“庭”、“校”、“戚”、“德”、“智”、“慧”、“褒”、“麗”、“鞠”、“躬”、“免”、“报”这些字,在“現代話”中能称为“詞”嗎?如果不是,不是和自己的規定相抵触了嗎?但是不这样区别它們的構成形式,又該怎样区别呢?揆之情理,势必又非这样不可。这样区别,就难免要混杂上文言的成分。这真使作者和讀者为难了!

在这个难于解决的矛盾之中,近来一般語法家似乎有了一致的意見:把这些構成“詞”的基本單位——“字”这个表現声符的东西,不叫它“字”,而叫它“詞素”,想拿它来解决这个“字”与“詞”的矛盾。我認为这个办法是不必要的,是非历史主义的,同时照常也是不够妥善的。这样,就真地把“語言”、“簡單”、“困苦”、“美丽”、“保衛”一类的詞的構成都不叫它們联合式的复詞,而叫它們是由两个“詞素”構成的“多音單詞”了;也就几乎把它們看做和“徘徊”、“仿佛”一例,完全否定了“語”、“言”、“簡”、“單”、“困”、“难”、“美”、“丽”、“保”、“衛”等字的“明确的意义”了;这样合乎漢語的構詞法嗎?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虽然要把汉字逐渐改革为拼音文字,但是我們并不主張廢除汉字;既然不廢除汉字,“字”这个概念,还要保留下来。这个“字”的概念,不管是文言,不管是口語,它都包罗在內;不管那个声音是詞,那个声音不是詞,它也都包罗在內。“字”这个詞兒,它这种作用,在現阶段,我們还應該充分利用它;不必立出一个“詞素”的名目代替了它,因为它在人們的口头上还没有死。“字”在語法中虽然不占多大地位,但是它在漢語的構詞学上还是占着相当的地位的;因为它不但是文字的形体單位,同时也是語言的声音單位。《說文解字》所“說解”的都是“詞”,而它却是用“文字”来代表詞的構成單位的。如果我們仍然以“字”来代表現在所謂“詞素”这个概念,并不会加深以上那些矛盾。以上那些矛盾,正是由于我們把“字”这个概

念整个兒排斥在語法范疇以外所引起的,并不是不可克服的矛盾。

汉字除了双声叠韵之类的詞以外,沒有“明确的意义”的字是很少的。例如“美丽”、“艳丽”、“富丽”、“宏丽”一类的詞,兩個字都不能說意义不“明确”,因为它们都是意义明确的字,才能組成意义更复杂的詞来。

我認为我們在区别汉字哪个是詞、哪个不是詞以及詞的構成形式的时候,如果完全依据現代語是不行的,必須牽扯到文言成分。(其实,我們現在的語言并不都是口語,而是逐渐地把“文言”普及为“口語”。)一牽扯到文言成分,必然要矛盾百出的。所以我們只能說,这个字在文言里是詞,在口語里不是詞;往往兩個在口語里不是詞、在文言里是詞的字却能構成为口語中的詞;只有少数的字,在文言里也不是詞,我們才說它只是一个字而不是一个詞罢了。例如一个“民”字,在文言里是詞,它代表一个一定的概念;虽然在口語里,不算一个含有明确意义的詞,它畢竟还是一个詞。这样,在不分析复詞的構成形式的时候,才不至于發生矛盾,才不至于打自己的嘴巴。只有这样,我們才能根据“民”这个詞(字)發展出“民兵”、“民事”、“人民”、“农民”……更多的新詞来。如果我們非得把这个“民”字,認为它在文言中才是詞,在口語中不是詞,而叫它“詞素”,这个办法,究竟是給了我們研究語法上的方便了呢,还是更添了一層麻煩呢?我認为在談現代漢語的詞的概念时,完全排除了詞的历史概念,是会鬧得我們糾纏不清的。

只有在研究漢語的詞的概念时,不要把文言与口語截然分家,才能看出祖國語言中詞彙的發展規律来,才能逐渐地把祖國的語言中的詞彙更發展丰富起来;才能体会出祖國語言中詞彙的丰富內容来,如果割断历史地去講祖國語言的詞彙,不但是行不通的,甚至也蒙蔽了學習祖國語言的第二代,使他們沒法理解祖國語言的發展情况,因而也就降低了他們的語文程度,并給他們带来了學習祖國古典文学的困难。

(接42頁)

学院負責。虽然这对我們苏联來說是有很大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但苏联学者到現在为止还没有積極参加該委员会的工作。

在美国,有国际輔助語协会(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 Association, 简称IALA)做選擇国际通用詞的工作,選擇时考虑到詞在各种不同語言中相同的写法和讀音。該协会活动的成果从1951年起开始發表。<sup>①</sup>这种工作方向在今天來說和国际技术术语工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国际术语工作吸引了广大的語言学家們的注意。1952年在倫敦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語言学家代表大会

上有一个專門报告的題目就是談国际术语工作的远景<sup>②</sup>;国际术语工作的远景,国外期刊上也經常談到。

国际术语工作还只是开始,因此現在談它的成果和今后發展的道路尚嫌过早,但是它有扩大的趋势。苏联学者積極参加ISO-TK-37的活动对国际术语事業是一有益的貢獻。

(刘雄翔譯自《語言学問題》1956年第3期)

<sup>①</sup> 例如,見 A. Gode 的《Interlingua-English [dictionary]》,1951年紐約,以及其他著作。

<sup>②</sup> 見 E. Wüster 的《Die terminologische Sprachbehandlung》《Studium Generale》,Jg. 6,第四分册,1953年。



# 說“所以”

刘冠群

“所以”兩字以复音詞的身份出現，当在東周时期。《詩經》和《尚書》中都有“所”和“以”這兩個單字，但是找不到联用的例子。①《論語》中兩字联用，如：

(1)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為政)

(2)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衛靈公)

例(1)的“所”和“以”結合，很象一个复音詞，但同下面的“所由”、“所安”一起看，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所以”还不是不可分割的。那个“以”字和例(2)的“以”字都还具有相当独立的動詞性。

战国时代的著作中，大量使用了这个复音詞，如《荀子·礼論篇》就一共用了二十八个“所以”。

这个詞在古漢語中的作用怎样呢？

楊伯峻先生說：“‘所以’兩個字，上古只有‘王之所以叱途者，以楚国之众也’（史記，平原君列傳）这种用法。这种‘所以’，相当于口語‘…的緣故’。若用在表示結果的分句，象現代口語一样，只是后起的现象。”②

如果我們全面地考察一下古代文獻，就会發現楊先生的这种說法是与事实不符的。用在表示結果的分句，象現代口語一样的“所以”，在先秦的著作中已見其例③；如：

(3) 礼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荀子，議兵篇)

(4)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义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广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孟子，告子)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早在兩千年以前，“所以”便有了与現代一样的用法。当然，“文言里沒有‘因为…所以…’的說法”。④但是与其說沒有这一种說法，不如說文言里不用“因为”这个連接詞来得妥貼。从例(3)(4)中可以知道，用“所以”連接的因果句在古漢語中确实是存在的。文言不用“因为”，白話可用可不用，除此以外，并沒有什么不同。

“所以”在文言中的用处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連接詞，在因果句中表結果。又分兩类：

甲、前因后果。前面的句子是原因，用“所以”承接，提出以下的結果，如例(3)(4)。

乙、前果后因。前一分句是結果，用“所以”提出，并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一般在句末加“者”，以待后面的句子說明原因；例如：

(5) 察天所以糾奔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墨子，天志)

(6) 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兩人在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二、疑問代詞，相当于現代口語的“怎样”，“为什么”之类；例如：

(7) 公(景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8) 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則于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盡矣。(荀子，礼論篇)

(9) 日夜思惟所以，未能盡明。(漢書，于定國傳)

(10) 公輸盤詰，而曰：“吾知所以阻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墨子，公輸)

(11) 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孟子，公孙丑) 三、動詞，相当于現代口語的“拿来”，“用来”之类的意思；

例如：

(12)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

(13) 今人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所以要譽于乡党朋友也，非惡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

(14) 故礼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聲，琴瑟箏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棖嶺，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体也。(荀子，礼論篇)

(15)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孟子，尽心)

(16) 夭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

四、助動詞，相当于現代口語的“可以”；例如：

(17) 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復舟。(三國名臣序贊)

(18) 人倫虽难，所以相告。(莊子，知北游)

(19) 今人处若家得罪，將犹有异家所以避逃之者矣；今人处若国得罪，將犹有异国所以避逃之者矣；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墨子，天志)

例(18)(19)釋“所以”为“可以”，見于王引之《經傳釋詞》。

① a) “所”在《尚書》中極少見，只有个别例子(如泰誓“民之所欲”)；《詩經》用得較多(一部分是名詞)。“以”字則二書常見。

b) 《周易》中有“所以”联用的例子，如：“子曰，君子进德修業，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乾)；“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几也”(系辭上)。但是《周易》的著作者和成書时期，根据郭沫若先生考証，是战国前半郭臂子弓所作，見所著《青銅时代》中《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

② 見《文言語法》301頁，北京大众出版社。

③ 《战国策》中也有这种例子，如：“願以陈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对者是也”(秦策)；“知伯身死、国亡、地分，此貪欲無厭也。夫不听知过，亦所以亡也”(赵策)。《战国策》是刘向編定的史料彙編，它基本上是一部先秦古書，但是其中也可能有若干秦、汉人的著作。說見潘辰先生《試論战国策的作者問題》，載1956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文学遺產”。

④ 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第三講。

\*

\*

\*

現代漢語的“所以”是從古代漢語演化而來的，前述四種用法只剩下第一種用法了。也分兩類：

一、提出結果或論斷，以待後文的說明；例如：

(1) 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結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一般地說，這種“所以”都可以略去而原意不變。但是前一分句加略去“所以”，便可以獨立成句，跟後文的聯繫就不甚緊密了；有了“所以”，前一分句失去獨立性，後文非補充說明不可，前後便一氣貫通了。

二、承接前文的原因或理由，引出後文的結果或論斷；例如：

(2) 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現在就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毛澤東選集，811頁)

有時在前面的句子開頭加上“因為”(或“由於”)，這樣，前後的照應就更清楚了。

在許多地方，“所以”和“因此”相當，也可以互相代替。有人認為：“用‘因此’的時候是根據上一句所說的原因推論出一個結果；用‘所以’的時候是根據上一句所說的理由得出一個判斷或決定。”<sup>①</sup>這樣的區別是很勉強的。請比較以下兩句：

(3) 國民黨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農民的援助。(毛澤東選集，184頁)

(4) 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一個大的農村變動)，所以失敗了。(又，17頁)

這兩句的第一分句都是原因，後一分句都是結果，而一句用了“所以”，一句用了“因此”。下面兩句的情形也正相同：

(5) 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象癰三一樣，瘦得難看，不象一個健康的人。(毛澤東選集，838頁)

(6) 許多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着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又，852頁)

事實上，用“所以”的時候，也可以是“根據上一句所說的原因推論出來的結果”；例如：

(7) 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對於知識分子覺得特別可貴。(毛澤東選集，817頁)

(8) 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黨八股和教條主義等類，徹底拋棄，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又，846頁)

相反，在用“因此”的時候，也可以是“根據上一句話所說的理由得出一個判斷或決定”；例如：

(9) 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要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敵之際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毛澤東選集，203頁)

(10) 然而人民的信任與否，密切聯繫於幹部的信任與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說服幹部。(又，208頁)

(11) 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又，811頁)

(12) 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因此也比較容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高級作品比較細緻，因此也比較難於生產，並且往往比較難於在目前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流傳。(又，863)

諸如此類的例證可以說太多太多了。這些句中的“所以”和“因此”都可以掉換(有“因為”的句子另當別論)。並且，“理由”往往兼是“原因”，而“判斷”、“決定”也往往兼是“結果”，例如(12)強為區別，將會使人束手束腳，舉棋不定。但這樣說並不等於否認“因此”和“所以”有區別。它們的區別还是很顯著的。

一、“所以”之前不能直接附加副詞或其它連接詞，而“因此”之前卻可以直接附加。我們可以說“我決不因此驕傲自滿”，“我雖然因此受到批評，也決不灰心喪氣”，但是“不”、“雖然”之類無論如何也跟“所以”聯不到一塊。這樣，也就可以理解葛信先生所引証的下面一句話為什麼不能把“因此”改為“所以”了：

(13) 其次是難解之處，忠實的譯者往往會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書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譯錯誤，而間接譯卻不然的時候。(魯迅，論重譯)

二、上一句有“因為”，“由於”之類提示原因或理由的詞時，後面就只能用“所以”而不能用“因此”連接。這是因為“因此”本身就已經包含着“因為”，“由於”的意思了。下面這句話的“所以”就不能換成“因此”：

(14) 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毛澤東選集，307頁)

三、“因此”只能用在“原因”或“理由”的後面，而“所以”既可用在“原因”或“理由”的後面，也可以用在前面，第二段的例(1)就是用在前面的例子。

① 葛信：《“所以”和“因此”》，載《語文學習》總第32期。

本刊連載的《中國語言學史話》本期因故暫停一次。

本刊截至1956年12月底所出版中國語文叢書的目錄已載本期封底，請讀者注意。

本刊編輯部

# 說“除非”

黃誠一

## 一 釋義

“除非”一詞，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解釋說：“除非是，假設一例外以見其只有此也。…省去是字，則曰除非”。① 俗語“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把“除非”換成“只有”，意甚通順。因為“人不知”與“己莫為”是相容的兩個意思，“己莫為”是“人不知”的唯一條件。“除非”是否定的否定，比表示肯定的“只有”更加有力。吳檢齋先生說“‘除非’等于‘非非’，‘非非’等于‘是’”。② 鮑幼文先生說“除非有除此皆非的意思”，也認為是肯定語氣。③ 但是現代漢語中它的用法混亂了，“除非有病，他才請假”和“除非有病，他不請假”，相反的兩句話表達相同的意思，於是發生了“同詞異訓”的事。呂叔湘先生總結這種情況說④：

用“除非”的句子有下面這幾種格式：

- (1) 除非你去請他，他不會來。
- (2) 除非你去請他，他才會來。
- (3) 倘若要他來，除非你去請。
- (4) 除非你去請他，否則他不會來。

第一句的“除非”等于“倘若…不”，其餘三句的“除非”等于“只有”或“必須”。照字面講，“除非”應該作“倘若…不”講；那麼(2)(3)兩種都應該用“省略”來解釋：(2)“除非你去請他，(他不會來；只有你去請他)，他才會來”；(3)“倘若要他來，(只有你去請)；除非你去請，(他不會來)”。(4)是連用省略都難解釋。但是從歷史上考察，(2)和(3)很早就有，而且一直很普通，(4)晚些，但是也普通，倒是(1)既不早，也不很普通。可見“除非”原來就只當“只有”講，到了現代才有人照字面解釋成“倘若…不”，說不定還受了點外國語的影響(英語 unless)。

呂先生說“(1)既不早，也不很普通”，這是事實，因此不宜用(1)例強使後三例就范。如果用(2)(3)(4)普通的用法，來解釋既不早，也不很普通的(1)，或者較為順當，只要把(1)例認作(4)例省掉“否則”就行了。此外(2)(3)(4)例都可釋作“只有”，非常明確；只是(1)例稍為迂迴，但可免去同詞異訓。

## 二 演變

“除非”一詞始見於宋人語錄和詞。語錄接近白話，詞也不避俗語，因此出現於書面。後此的詞曲小說中就廣泛應用。例如：

- 1 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方可休也。(朱子語類)
- 2 若問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見時。(晏几道詞)
- 3 欲寫相思，除非天樣紙。(董西廂)

4 只除非教呼延將軍開城門，唾手可得。(水滸，58)

5 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三國演義，65)

6 除非少各賞我個本錢，才可以回家養活母親。(儒林外史，32)

以上例1、4、5、6是“除非…才…”式，即呂先生例中的(2)式；例2、3是“若要…除非…”式，即呂先生例中的(3)式。呂先生說(2)和(3)很早就有，而且一直很普通，這句話是對的。間或還有上述兩式合用的例子：

7 要破此法，只除非快叫人去蘄州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高廉。(水滸，52)

8 若要病好，除非子孝父心寬，方才可救。(琵琶記23出，代崇湯藥)

9 如要解冤釋恨，除非倚仗佛法，方可懺罪消災。(醒世姻緣，100)

“若要…除非…方才…”三項，就是鮑幼文先生所說的“要求、條件、效果”。但由這三例看來，“要求”和“效果”的內容其實是一樣的，因此三項俱備的句子很少見，一般只用兩項。但間或也有只提“條件”一項，“要求”或“效果”蘊而不露的。例如：

10 我有百日血光之災，[要消此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一里之外躲避。(水滸，60)

11 憑他嫁到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要想出我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紅樓夢，46)

12 他們從來也不吓唬人，除非是那些漢奸們，[才吓唬人，]可我看著你又不像。(孫犁，風雲初記，271)

胡適根據這種省略句，硬把“除非”解成否定連詞，同於 unless⑤。他既然堅持錯誤的結論，自然就否定正確的用法，認為“只除非得這三個，方才完得這件事”(即例1、4、5、6這種最早最普通的用法)“應該避免或廢止”。⑥ 這種對祖國語言的粗暴態度，必須堅決反對。

鮑幼文先生說“除非”的意義和用法一直很明白，到最近二三十年才發生了歧義。這是大致不錯的；不過時間還可以提前。胡適的《除非》發表於1922年，到現在已經35年了，用法的混亂可能還要早幾年。從此以後，“除非有病，他才請假”和“除非有病，他不請假”，竟然表達相同的意思！例如：

13 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給修理。(老舍，駱駝祥子，9)

14 除非睡覺，一刻也不安生。(楊朔，三千里江山，18)

15 股份基金分記在各人的名下，不計利息，除非退社，不抽能回。(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第21條)

這就是呂先生所說的(1)式。怎麼解釋呢？一是把“除非”解作“倘若…不”，認為否定連詞，同於 unless；但是這樣解釋同歷來的用法相抵觸，且有“同詞異訓”之嫌，不足為訓。二是認為下文省掉了“否則”，即呂先生的(4)式的省略；這樣解釋較為簡易，而且近年來也確實出現了下文有和沒有“否則”(“不然”)的兩種句式：

16 除非我們根本不承認漢語里有詞頭、詞尾，否則還是  
(轉26頁)

① 《詩詞曲語辭匯釋》，492—493頁。

② 轉引《胡適文存三集》，960頁。

③ 鮑幼文：《談除非》，見《語文學習》1955年1月號。

④ 呂叔湘：《語法學習》，92—93頁(1954年12月版)。

⑤⑥ 見《胡適文存三集》，967—970頁。



# 談語音對應關係

張拱貴

## 一 發音和讀字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一個民族共同語。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

由於說漢語的人多，漢語分布的地區廣，加上過去交通不便，又長期停滯在封建社會，所以直到現在漢語的方言還是相當分歧。“許多嚴重分歧的方言妨礙了不同地區的人們的交談，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許多不便。”<sup>①</sup> 因此努力推廣普通話就成了當前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方言的分歧主要表現在語音方面，其次是一些常用的詞彙，語法的差別不大。

漢語的方言雖然複雜，它們本是同一語言的支流，都是從古代漢語發展出來的。各方言之間，在語音系統上存在着相當規律的轉變關係。“方音的哪一類音，在北京音里發那一類音，這兒頭是有規律的，學的人掌握了這些規律，就不必一個一個音死學，而且正音也比較容易。”<sup>②</sup> 這就是說，各方言區域的人學習北京語音是有捷徑可尋的，只要掌握了其間的對應關係，就用不着零碎地、一個一個字地學，而可以有系統地、一批批字地學。

各地方音跟北京音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謂學習北京語音，其實就是學習方音跟北京音不同的地方，至於相同的地方，當然就用不着學習。

各地方音跟北京音的不同，總說起來不外發音（音值）不同和讀字不同兩個方面。比方北京的  $z, q, s$ ，吳語方言就沒有（蘇北很多地方也沒有，象鹽城、如皋、南通）。凡是北京有而方言里沒有的音，首先要學會發音；發音準確了，然後講究讀字，比方吳語方言的人學習北京語音，首先要學會  $z, q, s$  這幾個音；但

光學會  $z, q, s$  還不夠，進一步還要把它們用在適當的地方，也就是說還要記得哪些字在北京是讀  $z, q, s$ 。南京本來有  $z, q, s$ ，南京人學習北京語音，這幾個音是不用學了，可是在讀字上面他們還要注意。比方“爭、撐、初、愁、師、士、事、瘦、生、省”這些字，南京念  $z, c, s$ ，不是讀  $s, q, s$ 。因此儘管南京人嘴裡有  $z, q, s$ ，對於上面這些字，他們嘴裡沒有  $z, q, s$  的蘇州人一樣，也要從頭兒學起。

有時候，北京的某些音素方言裡並不缺乏，可是音素的配合方式不同。比方泰州有  $h$ ，也有  $u$ ，可是  $h$  却不跟  $u$  相拼。北京念  $hu$  的一些字如“呼、胡、虎、互”，泰州念  $fu$ ，跟“夫、符、府、富”同音了。泰州人學習北京語音，單個的音素  $h$  和  $u$  可以不用學了，可是  $hu$  這樣一種配合方式，他還得從頭兒學。換句話說，他還得先學  $hu$  的發音，學會了  $hu$  的發音，然後去分辨那些字讀  $hu$ ，哪些字讀  $fu$ 。

有時候，某些音方言裡不是沒有，可是系統不相干。比方北京有  $bo, po$ ，蘇州也有  $bo, po$ 。可是北京讀  $bo, po$  的是“跛、破”這些字，蘇州讀  $bo, po$  的是“把、怕”這些字，系統不同。而北京的“跛、破”蘇州讀  $bu, pu$ ，跟“補、鋪”同音了。蘇州人學習北京語音， $bo, po, bu, pu$  這些音不用學了，可是“把、怕”“跛、坡”“補、鋪”這些字的標準讀音還是要從頭兒學。

總之，學“發音”和學“讀字”（正音）是校正方音、學習北京語音的兩大部份，也是兩大步驟。學發音就是要學會拼音字母，學會一些方言裡沒有的“新音”，能依照注音準確地拼讀。這是一種口耳技能的訓練。學讀字就是要結合語言實際，學會每個具體的字或詞的

① 見《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② 張奚若：《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标准讀音。校正字音要在發音准确的基础上来进行。某个字或某些字在北京是怎样念的,如果必須看着注音才讀得出来,那么我們并没有真正掌握北京語音。必須随时留意記憶,能把三千多常用字的标准音逐漸运用到自己的語言中去,取方音而代之,才算得真正学会了北京語音。

学發音,最好是通过比較,比較自己方音和北京音的相同之点,相异之点,这样就可以較快和較准地掌握北京語音的特点。校正字音的有效办法是应用对应規律,懂得对应規律就可以应用类推法,收到举一反三,聞一知十的效果。

## 二 什么叫做对应关系

对应关系并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發現和掌握本地方音和北京音之間的对应关系,也不是一件难事情。事实上,凡是会說两种方言或学过北京語音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过对应关系。比方一个南京人或苏州人学习北京語音,当他对于北京話的“精=京,焦=交,尖=坚,獎=講”这类字学多了,以后碰到“將、进、酒”这类的字,就会用类比的方法,把它們改讀为“江、禁、九”。換句話說,他懂得方言里的 zi,北京話都把它讀为 qi。方言的 zi=北京的 qi,这就是一条重要的对应規律。如果他更留心一点,他会發現方言里的“先前”“齐心”“想笑”等等,北京話要念得同“掀、鉗”“旗、欣”“响、效”一样。換句話說,方言的 zi, ci, si=北京音的 qi, qi, xi,这就是一条比較完整的对应規律。又比方一个常州人学习北京語音,他知道了一只狗的“狗”北京話念 gou,这类字他学多了,以后碰到哪怕他从来没有听見过的字,例如“手头”“走后”,他也会用类比的方法,把这字的韵母改为 ou。常州的 ei=北京的 ou,这个公式就是一条重要的对应規律。又比方一个徐州人学习北京語音,他發現北京話“懂不懂”的調子很象自己念“东不东”的調子,这类字他念多了,以后他碰到了“早不早”,也就会照自己念“糟不糟”的調子去讀它;碰到了“胆子”,也就会照自己念“單子”的調子去讀它。把这条

規律写下来,就是徐州陰平調值相当于北京上声調值。

由此可見,学习北京語音其实就是拿自己方言的某一类音去和北京的某一类音相适应:相同的不必改,类似的注意分辨,不同的就得特別学习。对应关系不是别的,它是一种語言表現在各个方言間(或历史發展阶段中)的語音变化;这种音变存在着一定的規律,这种規律就叫做語音对应規律。

确定各地方音跟北京語音的适应情形(对应規律),对于推广北京語音有極重要的意义。“各地的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对应比較各不相同,各各找出規律来,得靠方言調查和科学研究,那是語言工作者的事。但是教語音的人必須掌握本地的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对应比較,因为这样才容易指导本地人学会北京語音。”(張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对应規律是学习北京語音的橋樑和捷徑。“只有掌握了方言和普通話的对应关系,才便于有效地教学普通話。”<sup>①</sup>

由于語言自身發展的复杂性,加上汉语各方言都經過了漫长的曲折的演变过程,因此彼此間的对应关系就变得复杂,整整齐齐的一对一的关系固然有,但大多数例子当中却是你分我合,我分你合的錯綜关系。我們不能把語音对应規律看作数学里的公式一样,須知对应的情形往往只發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并且对应規律只能抓住和固定那主要的东西,免不了有例外的情况。因此在寻找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对应規律时,要全面而細心地考察,如果不是簡單的一对一的关系,就得把彼此轉变的一定条件找出来;如果有例外,就得把个别事实列举出来。說明了条件,运用規律的人才可能遵守应用的范围,而不至于犯机械类推的錯誤。比方吳語的 z, c, s 只有在拼 i, y, 时才改为 q, q, x。浦东的 h, 只有在拼 u 时,才改为 f:灰=飞,荒=方。

## 三 音类和音值

各个方言都有它自己的語音系統,因之

<sup>①</sup> 見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論《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話、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各地方音跟北京音的对应比較也就各不相同。这里不是要去考察某地方音跟北京音的具体对应关系，而是試圖概括各地方音（也就是各地方音跟北京音）在对应上的共同之点，找出它們之間的一般的对应类型。应用这几种类型就可以帮助我們去發現自己方音跟北京音之間的一些重要的对应規律。

要說明語音的对应关系，先要說明音类和音值，因为各种对应关系不过是从音类和音值的分合异同中归納出来的結果。

音类就是字音的归类。根据某个方言的語音系統，把讀音相同的一些字归到一起，所得到的就是这个方言的音类。比方北京話里，声、韵、調三方面都相同的有1284个音节；如果不計声調，光是声韵相同的就只有411个音节；如果單就声母是否相同或韵母是否相同来看，北京的声类只有21类，韵类只有37类（6个母音，28个复合音，加上eh(ㄜ)、er(儿)、I(ㄞ)三个）；如果單就声調来看，北京的調类只有陰平、陽平、上声、去声四类。每个方言都有它自己的語音系統，换一个方言，音类的数目可能就和北京的不一样。比方苏州方言，有33个声类，45个韵类（包括入声韵），7个調类，580个音节，（入声在內，非入声不計声調），这就是苏州方言的音类。所有汉字的拼法和讀音都不出这些音类的范围。

音值就是各个音类的实际讀法。比方北京話的ba、bá、bǎ、bà、是1284个音节中的4个音类的讀法。g、k、h是21个声类中的3个音类的讀法，a、o、e、i、u、y是39个韵类中的6个音类的讀法。

音类相同，是說甲方言里讀为相同一类音的一些字，在乙方言里也讀为相同一类音。比方北京話“包、苞、胞、褒、宝、飽、保、褓、堡、葆、报、暴、爆、豹、抱、鮑、鮑”这些字的韵母都相同，都念au；在江苏各个方言里，这些字的韵母也都相同（例如揚州、常州都念au，南通、苏州都念e(ㄝ)，丹陽、常熟都念为一种很开的o。音类虽然相同，音值可不一定相同）。

音类不同，是說甲方言里讀为相同一类

音的一些字，在乙方言里不讀为相同的一类音。比方下面每一对字在北京都是同音的：

班=般，盼=判，蛮=瞞，攤=貪，

喊=罕，难=男，斬=展

这些字的韵母都是an。可是在吳語方言和苏北大多数地方，它們都不是同音字。“班、盼、攤、难、喊、斬”是一类，同一个韵母(eh)；“般、判、瞞、貪、男、罕、展”又是一类，另是一个韵母(on)。

音值相同，是說甲方言有这么一个音，乙方言也有这么一个音。比方北京有b、p、m，江苏各地方言也有b、p、m；北京有ei，如皋、南京、金壇、江陰、常州、無錫等处也有ei。但是在北京是“悲、梅、飞、类”等讀ei，在常州等处是“否、謀、头、走、口”等讀ei，系統上（也就是音类上）彼此不相干。这一点要注意。

音值不同，是說甲方言有这么一个音，乙方言沒有这么一个音。比方江苏方言（除南京一帶）有v(ㄛ)，北京沒有；北京有r，江苏方言沒有这个音。又如北京有ly(驢、呂、旅、慮、律)，如皋、無錫、苏州沒有这个音。

#### 四 对应关系的类型

根据各个方言間音类和音值的分合异同，可以把其間的轉变情形大体归納为下列六种类型，这六种类型，可以用六种符号来表示：

- |         |         |
|---------|---------|
| 1. 相同 = | 2. 相当 — |
| 3. 合并 > | 4. 分化 < |
| 5. 搬家 ∞ | 6. 錯綜 × |

1. 相同 某些字，在甲方言和乙方言里面不但音类相同，音值也相同，这就構成相同关系。例如：

北京	b	巴波碑苞边班奔比标兵布
江苏		
北京	uŋ	东通农龙弓空烘紅中冲虫宗匆从
江苏		
北京	去声 ㄣ(51):	霸到看害見再印
徐州		

凡是方音跟北京音相同的地方，就用不着改，用不着学。但是哪些字是方言跟北京



話相同的,这就得經過全面的考察和比較。

2 相当 某些字,在甲方言和乙方言里面如果音类相同而音值不相同,这就構成相当关系。例如:

北京  $qi, qi, xi$  } 糾見金京居巧鉛輕区曉  
 賴檢  $gi, ki, hi$  } 休限虛

北京  $au$  } 包拋跑毛刀桃勞高招超燒  
 南通  $o$  }

北京  $\gamma(55)$  } 陰平:班拋他湯家花周商宗  
 南京  $\downarrow(32)$  } 生

“相同”和“相当”就是所謂“一对一”的关系。从方音改从北京音,如果音类相同,只是音值不同的話,就可以放心用类推的方法,只要把某某声母全变为某某声母,某某韵母全变为某某韵母,某某調值全变为某某調值就行了,不必一个字一个字去死記。“一对一”的关系最簡單,改起来最不費力。不过要注意例外,例如北京的  $un$  韵字,吳語方言也都念  $un$ ,可是“农”字有念  $yn$  韵的。

3 合并 某些字,在甲方言里面讀为一类音,在乙方言里面分讀为几类音,从乙方言改从甲方言,就要把自己分开的音合并起来。音类不同(音值不同或部分音值相同),由分到合,这就構成合并关系。音值不同的,例如:

北京  $z$   
 知周真正中 暫陣丈 者展專准壯  
 南通  $z$   $c$   $q$

北京  $an$   
 班蚩炭敢含殘 搬瞞探捍寒蚕  
 如皋  $ien(13)$   $on(2)$

北京  $ai$   
 敗帶泰債蔡 胎該开再菜  
 宝山  $a$   $eh(2)$

北京 去声  
 报販到 抱范稻 暴飯盜  
 冻汉救 动旱白 洞汗旧  
 無錫 陰去 陽上 陽去

一部分音值相同的,例如

北京  $q, q, x$   
 几今欺輕希新 挤津妻亲西心  
 吳語  $q, q, x$   $z, c, s$

北京  $\bigcirc$ (零声母)  
 爰安欧袄恩訖 鄂熬額碍藕昂  
 苏州  $\bigcirc$   $\eta$

方言里面分得很細,而北京音当中不分辨的音是学起来最不麻煩的一类,只要記得方言里某某不同的声音在北京合并成某某一种声音就行了。当然,音值不同的时候,第一步先要学会發音。

4 分化 分化跟合并正相反。某些字,在甲方言里面分为几种不同的声音,在乙方言里面合为一种声音,从乙方言改从甲方言,就要把自己不分的声音照甲方言改讀为几种不同的声音。音类不同(音值不同或部分音值相同),由合到分,这就構成分化关系。音值不同的,例如:

北京  $f$   $u$   
 肥費飯攷憤房符腐 微味万文問亡無务  
 吳語  $v(5)$

北京  $ai$   $ei$   $an$   $uai$   $ui$   $uan$   
 埋来再妹雷杯慢蘭难衰帅揣堆吹岁 賺  
 苏州  $eh(2)$

北京 陰平 陽平 上声 去声  
 一缺鴨出白敌革族 法笔渴嘱木踏六月  
 揚州 入声

一部份音值相同的,例如:

北京  $z, c, s$   $z, q, s$   
 子早奏催草私三 紙找縐吹吵师山  
 吳語  $z, c, s$

北京  $in$   $in$   
 宾憑民今亲辛音 兵平明京輕星英  
 江苏  $in(或 in)$

北京  $an$   $a\eta$   
 班單干蘭陝官船 邦当剛郎窗光床  
 南京  $a\eta$

北京 陰平 陽平  
批通灰欺星川虽 皮同回齐形船随  
丹陽 平声

方言混而北京音当中要分辨的音，一定要練習分化。音值全不同的就全部要改，不是改成同一种声音，而是改成两种或多种声音：一部分这么改，一部分那么改。一部分音值相同的，就一部份改，一部份不改。把不该改的改了，就是矯枉过正。比方 n、l 不分（南京）的人，他知道自己方言没有 n，就努力多用 n，把“李”字念成“你”字，把“老路”念成“惱怒”，这就过了火了。

5 搬家 某个音，甲乙两个方言都有，可是系统不相干。音类相同，音值不同，彼此却可以互换，这就构成搬家关系。例如：

北京 丕煤美非 } ei  
常州 剖謬謀否 }

这就是說，常州人可以拿自己讀“剖”的音讀北京的“丕”，北京人可以拿自己讀“美”的音去讀常州的“謀”。又如：

北京 陰平 } 北京 上声 }  
鎮江 去声 } 1(55) 高淳 去声 }  
北京 陽平 } 1(35)  
宝山 陽去 }

6 錯綜 錯綜的情况多种多样，有时是甲方言分別某种音，乙方言也有同样的分別，而所归的字的分配法不完全一样。类数相同，音值也相同的，例如：

北京 s s  
私死四 事师史 試矢始  
南京 s s  
北京 ei ui  
背賠美雷 堆推退最摧虽 追吹水归亏灰  
射陽 ei ui

音值不同的，例如：

北京 ei ui  
背賠美雷 堆推退最摧虽 追吹水 归亏灰  
苏州 eh(廿) ue(X廿)

一部分音值相同，例如：

北京 hu u  
呼灰荒煥 胡回黃換 吳为王完  
苏州 hu hhu(x)[fu]

彼此互混的，例如：

北京 c s s x  
此采草慈才寺随訟 山沙生心小曉希香  
苏州 c zh(ɬ)[z] s x

北京 un en en  
东通龙中从 踹猛風灯耕蒸 眞深跟  
吳語 un en(或 en)

在南京，“踹、猛、風”和“灯、耕、蒸、眞、深、跟”同韵，跟其他方言的分类法不同。又如：

北京 陰平 陽平  
伸商詩 湿失 十食实 时蛇池  
南京 陰平 入声 陽平

北京 陰平 陽平 上声 去声  
發脫博結白独跌縛給撒眨迫或壁六玉  
徐州 陰平 陽平 上声 去声

方言間的对应关系可能不止这么几种，上面提到的是比較常見的有共同性的六种类型。此外象高邮、宝应，n、l 往往随便讀，吳語方言的 en 和 en, in 和 in 也可以互换。这种情形，就不包括在上列六种关系之內。对于这种情形，應該注意把它們分开，讓每一个字固定地讀一个音，例如，“腦”讀 n，“老”讀 l；“难”讀 n，“蘭”讀 l。

### 本刊編輯部資料室啓事

本刊自开辟綜合性的“書刊評介”以来，讀者都表示欢迎，認為对語文学界有一定的帮助。現在为了做好这一工作，要能介紹得及时，我們再一次向作者和各出版社請求协助，遇有語文方面的出版物能隨時寄贈本刊，以便及早組織評介。

# 怎样記詞彙和語法例句\*

李 荣

怎样記詞彙和語法例句,《汉语方言調查簡表》和《方言調查詞彙手冊》前头已經有“說明”。这里再举些例子,补充說明一下。

## 一 怎样記詞彙

記詞彙要請本地人逐条翻譯,本地人怎么說就怎么記。發音合作人有时候怕說得太土,別人見笑,願意說些書本上有的或者先生教过的,不願意說乡下人用的,一时写不出字来的。我們一定要同發音合作人說清楚,調查方言不單不怕土,并且越土越好,免得把学生腔和藍青官話当作方言記下来。比方說我你他的“他”(簡表第 4111 条,詞彙手冊 19 面)方言有“他、渠、伊”等說法,因为白話文平常都用“他”字,普通話也說“他”字,發音合作人不仔細想,很容易就說出一个“他”字。我們一定要追問一下,乡下不識字的人有沒有别的說法。

方言之間詞彙的不同有兩個方面,一是各地用字不同,二是同一个字各地用法不同。比方北京說“吃飯、喝茶、抽烟”,“飯、茶、烟”前头的動詞全不同。广州說“食飯、飲茶、食烟”,“飯”和“烟”前头都用“食”,“茶”前头用“飲”。苏州說“吃飯、吃茶、吃烟”,無論“飯、茶、烟”前头一律用“吃”。“飲、食”兩個字广州常用。北京說“飲食不佳”是胃口不好的意思,“烏食、猪食”是餒烏、餒猪的东西,“肚子里有食”是說吃了东西不消化,“肚子里沒食”是說肚子是空的。这些用法都和“食飯、飲茶”不同。北京“食”字平常不作動詞用,說“飲酒”是轉文,說“喝酒”才是口語。(北京“飲牛”的“飲”去声,是給牛水喝的意思。广州說“畀牛水飲”,“飲”字陰上。)北京說“人很胖”,“鷄很肥”,指人指动物用字不同。广州一律用“肥”,不分人和动物。北京广州都用“脚”

字,可是意义不全一样。广州的脚有广义有狭义,广州狭义的脚相当于北京脚,广州广义的脚包括北京脚、小腿、大腿。北京的“小腿”广州叫“脚瓜瓢”[kœk<sup>1</sup> kua<sup>1</sup> nœŋ<sup>1</sup>],北京的“大腿”广州叫“大髀”[tai<sup>1</sup> pei<sup>1</sup>]。

方言里头同义词意义的差别要仔細說明。比方南昌也說“放”,也說“攔”,意思不全一样。“放”指随便放东西,“攔”指放到一定的地方,如抽屉里等。梅县“泥、爛泥、泥团”意思略有不同。“泥”是松的泥土,“爛泥”是湿的泥土,“泥团”是成塊的土。

有些詞要說明用的上下文意思才显豁。河南有些地方吃晚飯叫“喝湯”。梅县早飯叫“朝”[tsau<sup>1</sup>],“午飯”叫“晝”[tsu<sup>1</sup>],“晚飯”叫“夜”[ia<sup>1</sup>],这些字都要和“食”[sɛt<sup>1</sup>]、“做”[tsə<sup>1</sup>]等字連用。梅县“石灰”[sak<sup>1</sup> foi<sup>1</sup>]也叫“灰”,“灰”字平常指“塵灰”或“炭灰”,当石灰講限于和動詞“燒”字“担”字等連用。

記詞彙的时候特別要注意字音的变化,例如声母的变化,韵母的变化,声調的变化,加“兒”加“子”引起的字音变化,兩個字合成一个音节等等。

声母的变化如广州“今”讀[kem<sup>1</sup>],“日”讀[iet<sup>1</sup>],“今日”讀[kem<sup>1</sup> iet<sup>1</sup>]或[kem<sup>1</sup> mat<sup>1</sup>],[-m i-]变成[-m m-]。杭州“十”字讀[ze<sup>1</sup>],“年三十”讀[ɕniẽ sɛ<sup>1</sup> sə<sup>1</sup>],“十”字声母由濁变清。

韵母的变化如梅县“今”讀[kim<sup>1</sup>],“年”讀[nian<sup>1</sup>],“日”讀[nit<sup>1</sup>],“今年”讀[kin<sup>1</sup> nian<sup>1</sup>],“今日”讀[kin<sup>1</sup> nit<sup>1</sup>],[-m n-]变成[-n n-]。

声調的变化另外討論。

\* 这是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講義的一部分。



兩個字合成一個音節是漢語里常見的現象。如北京“兩個”合成“倆”[<sup>c</sup>lia]，“三個”合成“仨”[saŋ]。又如不用“不用”合成甬[ɛpən]，用字去聲，不字在去聲前讀陽平，所以“甬”讀陽平。蘇州“勿(不)”讀[fəʔ]陰入，“要”讀[iaəʔ]陰去，“勿要”合起來寫成“𠵿”，讀[fiəʔ]陰去，聲調和“要”字一樣。廣州“三十”[samɿ sepɿ]合成“卅”[saɿ]，“二十”[iɿ sepɿ]合成[iaɿ]。

## 二 怎樣記語法例句

記語法例句也要請發音合作人逐條翻譯，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已經在字底下加上圓點。主要是句法的異同和虛字的用法，比方北京說“你到哪兒去？我到城里去”。廣州說“你去邊道？我入城。”梅縣說“唔去□□[naiɿ·iɛ]？厓去城肚□[·uɛ]。”

廣州 neiɿ hɔyɿ pinɿ touɿ

你 去 邊 道

ŋoɿ iapɿ sɛŋɿ

我 入 城

梅縣 nɿ hiɿ naiɿ ·iɛ

唔(你) 去 □ □(哪里)

ŋaiɿ hiɿ saŋɿ tuɿ·uɛ

厓(我) 去 城 肚 □(里)

廣州和梅縣的句法和北京不同。北京用兩個動詞“到…去”，表示地點的名詞放在中間。廣州和梅縣用一個動詞，表示地點的名詞放在動詞後頭。梅縣的□[·ɛ]相當於“里”字，在[-i]後頭讀[·iɛ]，在[-u]後頭讀[·uɛ]。

北京說“給我一本書”，廣州說“畀一本書我”，梅縣說“分一本書分厓”。

廣州 peiɿ ietɿ punɿ syɿ ŋoɿ

畀 一 本 書 我

梅縣 punɿ itɿ punɿ suɿ punɿ ŋaiɿ

分 一 本 書 分 厓

北京、廣州、梅縣三處的句法都不同，北京廣州都用一個動詞，北京“我”在“一本書”之前，廣州“我”在“一本書”之後。廣州梅縣“我”都在一本書之後，梅縣重復動詞，廣州不重復動詞。

北京說“你告訴他”，廣州說“你話畀佢

知”，梅縣說“唔話佢知”，浙江溫嶺說“尔搭渠講。”

廣州 neiɿ uaɿ peiɿ k'ɔyɿ tsɿɿ

你 話 畀 佢 知

梅縣 nɿ vaɿ kiɿ tiɿ

唔(你) 話 佢 知

溫嶺 nɿ tɔʔ gieɿ kɔɿ

尔(你) 搭(和) 渠(他) 講

四處的句法都不一樣，北京的句法最簡單，主語——動詞——賓語。廣州梅縣句法大致一樣，“佢”是他前頭動詞的賓語，又是他後頭動詞的主語。廣州和梅縣的不同，在於廣州比梅縣多用一個動詞，梅縣是“話”，廣州是“話畀”，連用兩個動詞。(比較：北京“你教我唱歌”，也可以說“你教給我唱歌”。)溫嶺“尔搭渠講”，“搭渠”是動詞加賓語，放在動詞“講”前頭修飾他。“搭渠”也可以合成一個音節讀[teɿ]。

虛字的用法各方言也常有不同。北京

他的書[t'aɿ·tə su]。

這個吃得，那個吃不得。[tɕɿv·kə

tɕ'ɿɿ·tə, naɿ·kə tɕ'ɿɿ·pu tɔ]

拿得動[naɿ·tə tuŋɿ]。

重得連我都拿不動了。[tɕuŋɿ·tə li-

anɿ uoɿ·tu naɿ·pu tuŋɿ·lə]

這些例子里頭，“的”字和“得”字都讀輕聲[·tə](例子里有些“得”也有人寫作“的”)。在廣州話里，和這個輕聲[·tə]相當的有“嘅”[kɛɿ]，“得”[tekɿ]，“到”[touɿ]三個字。“他的書”廣州話是佢嘅書[k'ɔyɿ kɛɿ syɿ]；

“這個吃得，那個吃不得”，廣州話是

呢啲野食得，嗰啲野唔食得。[neiɿ tiɿ

iɛɿ sekɿ tekɿ, kəɿ tiɿ iɛɿ mɿ sekɿ tekɿ]

“拿得動”廣州話是

拾得起[leŋɿ tekɿ heiɿ]；

“重得連我都拿不動了”廣州話是

重到連我都拾唔起啦[tɕ'ɔŋɿ touɿ linɿ

ŋoɿ touɿ leŋɿ mɿ heiɿ laɿ]。

## 三 方言里的“兒”

名詞帶“兒”是漢語里頭非常普遍的現

象。有些方言“兒”自成音节，有些方言“兒”是上一音节的韵尾，这两种现象都可以叫“兒尾”。北京話和其他一些方言，“兒”不成音节，也不是上一音节的韵尾，而是上一字韵母加卷舌作用。比如“花”[ $\epsilon$ xua]，“花兒”是[ $\epsilon$ xuar]，不是[ $\epsilon$ xua·ər]。我們用[-r]表示前一个元音卷舌，[ar]是卷舌的[a]，[ər]是卷舌的[ə]，不是先發[a]、[ə]后卷舌。这种现象叫“兒尾”就不大合适，可以叫“兒化”。有些字原来韵母不相同的，“兒化”以后变成同音了，比如“褂子”的“褂”[kua<sup>3</sup>]和“罐頭”的“罐”[kuan<sup>3</sup>]本来不同音，兒化以后“小褂兒”和“小罐兒”就同音[ $\epsilon$ iau kuar<sup>3</sup>]。北京的卷舌韵母，除“兒、而”[ $\epsilon$ ər]、“耳、洱、尔”[ $\epsilon$ ər]、“二、貳”[er<sup>2</sup>]等字以外，一律是兒化韵。北京各种韵母和兒化韵的关系如下：

北京韵母	北京兒化韵
a, ai, an	ar
ia, ian	iar
ua, uai, uan	uar
yan	yar
ɤ	ɤr
o	or
uo	uor
ie (陰平, 陽平)	ier
ye (陰平, 陽平)	yer
ɿ, ʅ, ei, ən	ər
ie (上声, 去声), i, in	iər
uei, uən	uer
ye (上声, 去声), y, yn	yər
u	ur
au	aur
iau	iaur
ou	our
iou	iour
aŋ	ār
iaŋ	iār
uaŋ	uār
əŋ	ēr
iŋ	iēr
uŋ, uəŋ	uēr
yŋ	yēr

少数北京人(年老的一輩)名詞帶“兒”是加輕讀的“兒”字，自成音节，不影响上一字的

韵母。这一派讀音“花兒”是[ $\epsilon$ xua·ər]，“小褂兒”是[ $\epsilon$ iau kua<sup>3</sup>·ər]，“小罐兒”是[ $\epsilon$ iau kuan<sup>3</sup>·ər]。北京近郊的涿县，“兒化”多数加卷舌作用，例如“小櫃兒”和“小棍兒”同音，都是[ $\epsilon$ iau kuər<sup>3</sup>]。少数加輕音“兒”字。例如“树枝兒”[su<sup>3</sup> ɕtʂɿ·ər]。有时候两种办法都可以，例如“瓢兒”[ɕʑā̃r]或[ɕʑaŋ·ŋər]，“(雞蛋)黃兒”[ɕxār]，或[ɕxuɑŋ·ŋər]。

“兒化”加卷舌作用的方言，要注意加上卷舌作用，韵母有什么变化。現在从郑州話举些例子：

疤	ɕpa	瘡疤兒	ɕtʂʰuaŋ ɕpar
鐘	ɕtʂʰan	小鐘兒	ɕsiau ɕtʂʰar
帶	tai <sup>3</sup>	鞋帶兒	ɕɕie tar <sup>3</sup>
車	tʂʰe	小車兒	ɕsiau tʂʰar
芽	ɕia	豆芽兒	tu <sup>3</sup> ɕiar
烟	ɕian	香烟兒	ɕɕiaŋ ɕiar
花	ɕxua	紅花兒	ɕxuŋ ɕxuar
官	ɕkuan	当官兒	ɕtaŋ ɕkuar
縫	fəŋ <sup>3</sup>	細縫兒	si <sup>3</sup> for <sup>3</sup>
狗	ɕkou	小狗兒	ɕsiau ɕkor
油	ɕiu	加油兒	ɕtɕia ɕior
領	ɕliaŋ	衣領兒	ɕi ɕlior
套	tʰau <sup>3</sup>	手套兒	ɕsou tʰər <sup>3</sup>
歌	ɕkɔ	唱歌兒	ɕtʂʰaŋ ɕkər
苗	ɕmiau	树苗兒	su <sup>3</sup> ɕmiər
黃	ɕxuɑŋ	蛋黃兒	tan <sup>3</sup> ɕxuər
活	ɕxuɔ	做活兒	tsu <sup>3</sup> ɕxuər
角	ɕtɕyɔ	牛角兒	ɕniou ɕtɕyər
絲	ɕsɿ	鉄絲兒	ɕtʂʰie ɕsər
枝	ɕtʂɿ	树枝兒	su <sup>3</sup> ɕtʂər
黑	ɕxəi	擦黑兒	ɕtsʰa ɕxər
針	ɕtʂən	小針兒	ɕsiau ɕtʂər
米	ɕmi	小米兒	ɕsiau ɕmiər
信	sin <sup>3</sup>	捎信兒	ɕsau siər <sup>3</sup>
櫃	kui <sup>3</sup>	書櫃兒	ɕsu kuər <sup>3</sup>
棍	kun <sup>3</sup>	冰棍兒	ɕpin kuər <sup>3</sup>
驢	ɕly	毛驢兒	ɕmau ɕlyər
群	ɕtɕʰyn	人群兒	ɕʑən ɕtɕʰyər
路	lu <sup>3</sup>	小路兒	ɕsiau lur <sup>3</sup>
葱	ɕtsʰuŋ	小葱兒	ɕsiau ɕtsʰur

有些方言，“兒化”以后，韵母大为簡化。比方四川荣昌，所有的韵母“兒化”以后合并



成四个: [3r], [i3r], [u3r], [y3r]①。例如:

杯杯兒	cpei c p3r
缸缸兒(水盂)	c kəŋ c k3r
橘柑兒	c tɕy c k3r
鬼灯哥兒(猫头鷹)	c kuei c tɕŋ c k3r
別針兒	c p'ie c ts3r
小刀刀兒	c ɕiau c tau c t3r
眼眼兒	c ien c i3r
电影兒	tien' c i3r
当官兒	c taŋ c ku3r
蛋黃兒	tan' c xu3r
烟灰兒	c ien c xu3r
嘴嘴兒	c tsuei c tsu3r
金魚兒	c tɕin c y3r
湯圓兒	c t'aŋ c y3r

杭州“兒”字不論文白，都讀自成音节的[ɛl]。杭州的“兒尾”总是加“兒”字，自成音节，不影响原来的韵母。例如:

凳兒	təŋ' c l
瓢羹兒(羹匙)	c biə c kəŋ c l
筷兒	k'ue' c l
索兒(繩兒)	soʔ c l
茄兒	c dʒi c l
帕兒(手絹兒)	p'a' c l

甘肃省甘谷、通渭、武山一帶，加“兒尾”是加自成音节的[·z]，武山“兒”字文言讀[ɛər]，白話讀[ɛz]，<sup>②</sup>“我有三个兒子”是[c'kie' iu c sa kue' c z]。武山“兒尾”加輕讀[·z]音节，不影响前一字的韵母，例如:

刀欄兒	c tau pa' ·z
唱歌兒	tɕ'aŋ' c kɕ ·z
小雞兒	c ɕiau c tɕi ·z
核(櫟)兒	c xu ·z
刀兒	c tau ·z
鍋兒	c kuɕ ·z
乖乖兒	c kuei c kuei ·z

浙江义烏加“兒尾”的时候加[-n]韵尾，例如:

瓜	c kua	小金瓜兒(小南瓜)	c suɕ c tɕiən c kua:n
書	c ɕy	小書兒	c suɕ c ɕy:n
鷄	c tɕi	小鷄兒	c suɕ c tɕi:n
牛	c niəm	小牛兒	c suɕ c niɕ:n
鞋	c ɕia	小鞋兒	c suɕ c ɕia:n
茶瓶	c dzua bən <sup>③</sup>	瓶兒	c be:n

狗	c kəu	小狗兒	c suɕ kɕ:n <sup>③</sup>
筍	c sən	小筍兒	c suɕ se:n <sup>③</sup>
碗	c ua	小碗兒	c smɕ ua:n <sup>③</sup>
米	c mi	早米兒	c tso mi:n <sup>④</sup>
馬	c mua	小馬兒	c suɕ mua:n <sup>④</sup>
蓋	ke'	小蓋兒	c suɕ ke:n
凳	nən'	小凳兒	c smɕ ne:n
帽	mo'	小帽兒	c suɕ mo:n
筆	pie,	小字筆兒	c suɕ zu' c pie:n <sup>⑤</sup>

鑿(動詞)	zua,	鑿兒(名詞)	zua:n
口舌(舌頭)	c k'əu dʒie,	小口舌兒(小舌)	c suɕ c k'əu dʒie:n
		猪口舌兒(猪舌头)	c tsua c k'əu dʒie:n

有些字平常說話总是帶“兒尾”，如“簿兒”(本子) bu:n<sup>2</sup>，“鹿兒” lo:n，“盒” ɕo:n，“匣” ɕo:n<sup>2</sup>。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加兒尾的时候延長元音，加[-n]。有时候元音还有变化，[əu]变成[ɕ:n]，[iəu]变成[iɕ:n]，[iɛ]变成[ie:n]。原来有[-n]尾的[ən]，变成[e:n]。凡是帶“兒尾”的字，都是長元音收[-n]尾。(至于調子的变化，見脚注，那是由連讀引起的，不是由“兒尾”引起的。)

以上說的种种加“兒”的現象，有的(加[·ər]或[-r])一眼就看出来，知道是加“兒”，有的(加[-n]或[·z])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比方义烏的“小碗兒”讀[c suɕ ua:n<sup>2</sup>]，起初一看很可能認為就是“小碗”。因为“碗”字古音收[-n]，北京也收[-n]。仔細一想，[c suɕ ua:n<sup>2</sup>]不能是“小碗”本来的讀音。因为义烏“碗”字單讀是[c ua]，而且“官”讀[c kua]，“寬”讀[c k'ua]，“款”讀[c k'ua]，“欢”讀[c xua]，“換”讀[ua<sup>2</sup>]，韵母都是[ua]，都沒有鼻音韵尾。可見[ua:n]和“碗兒”相当。同

① [ə]是比[ə]开的央不圓唇元音。

② “茶瓶”的“瓶”变調讀陽去。

③ “小狗兒”、“小筍兒”、“小碗兒”，“狗兒”、“筍兒”、“碗兒”变調讀陰去。

④ “早米兒”、“小馬兒”，“米兒”、“馬兒”变調讀陽去。

⑤ “小字筆兒”的“筆兒”变調讀陰平。

样,“官”是[ $\epsilon$ kua],“小官兒”是[ $\epsilon$ su $\epsilon$   $\epsilon$ kua:n],“狗官兒”是[ $\epsilon$ kəu  $\epsilon$ kua:n]。义烏“兒、尔、二”白話讀自成音节的[n],文言讀[·fiə]:

	白話音	文言音
兒	$\epsilon$ n	$\epsilon$ fiə
尔	$\epsilon$ n	$\epsilon$ fiə
二	n <sup>2</sup>	fiə <sup>2</sup>

文言音是不帶“兒尾”的,白話音帶“兒尾”加[n],加的就是“兒”字,不过作上一个字的韵尾,和上一个字合成一个音节罢了。“凳”字讀[nən<sup>2</sup>],“凳兒”讀[ne:n<sup>2</sup>],初看也可能認為是“凳”字文白兩讀,元音不同,不过和其他的例子对比之下,我們可以确定[ne:n<sup>2</sup>]是帶“兒尾”的格式。“凳”字本来已經有[-n]尾,不能再加[-n]尾,不过元音还是变成長元音了。“瓶”字“筭”字兒化的情形和“凳”字一样。

又如武山“刀橋”叫[ $\epsilon$ tau pa·z],要是不知道“兒”字文言讀[ $\epsilon$ ər],白話讀[ $\epsilon$ z],就不能确定[·z]是什么,而且誤会成“子”字。等到問出来“書本子”是[ $\epsilon$ su  $\epsilon$ peŋ·tsɿ],“兒子”是[ $\epsilon$ zɿ·tsɿ],“鳥兒”是[ $\epsilon$ təiauz],“願意兒”是[ $\epsilon$ ua i<sup>2</sup>·z],就能完全确定[·z]是“兒”。

有些方言的变調相当于“兒化”,另外討論。

#### 四 方言里的“子”

汉语有不少名詞帶“子”字,如“桌子、椅子、鼻子、痼子”等等。这些“子尾”北京都讀輕声[·tsɿ]或[·tse]。“魚子、蝦子、蚕子、蓮子”等等的“子”字重讀[ $\epsilon$ tsɿ],保留“子”字本来的意思,和一般的“子尾”不同。帶“子尾”不能再“兒化”,重讀的“子”就可以“兒化”,例如“瓜子兒”[ $\epsilon$ kua  $\epsilon$ tsor],“鷄子兒”[ $\epsilon$ təi  $\epsilon$ tsor]。

有些方言用特殊的方法表示“子尾”。河南郑州原陽一帶方言用[-u]韵尾表示。(我們还不能断定[-u]就从“子”来的,只能說[-u]尾相当于“子尾”就是了。)郑州“鼻、皮、笛、蹄、李、茄、叶、芽、脖、婆”等字讀音都不收[-u],可是說到“鼻子、李子、脖子、老婆子”等的时候,一律收[-u]。

鼻 $\epsilon$ pi	“鼻子”叫 $\epsilon$ piəu
皮 $\epsilon$ p <sup>2</sup> i	“皮子”叫 $\epsilon$ p <sup>2</sup> ia
笛 $\epsilon$ ti	“笛子”叫 $\epsilon$ tiəu
蹄 $\epsilon$ t <sup>2</sup> i	“蹄子”叫 $\epsilon$ t <sup>2</sup> ia
李 $\epsilon$ li	“李子”叫 $\epsilon$ liəu
	(和楊柳的柳 $\epsilon$ liəu同音)
茄 $\epsilon$ tə <sup>2</sup> ie	“茄子”叫 $\epsilon$ tə <sup>2</sup> ia
	(和桥 $\epsilon$ tə <sup>2</sup> ia 同音)
叶 $\epsilon$ ie	“叶子”叫 $\epsilon$ ia
	(和腰 $\epsilon$ ia 同音)
芽 $\epsilon$ ia	“豆芽”叫 tou <sup>2</sup> $\epsilon$ ia
	(和搖同音)
脖 $\epsilon$ p $\epsilon$	“脖子”叫 $\epsilon$ pau
婆 $\epsilon$ p $\epsilon$	“老婆子”叫 $\epsilon$ lau $\epsilon$ p <sup>2</sup> au
	(袍 $\epsilon$ p <sup>2</sup> au)

这些加[-u]尾的字常常与原来的[-u]尾韵同音。如“李子”和楊柳的“柳”同音,“茄子”和“桥”同音,“叶子”和“腰”同音,“豆芽子”讀若“豆搖”,“老婆子”讀若“老袍”。这个[-u]尾不能解釋为“兒化”,因为这个方言里也有“兒化”韵,如“小車兒”[ $\epsilon$ siau  $\epsilon$ tə<sup>2</sup>ar],与北京“兒化”相当,“豆芽子”[tou<sup>2</sup>  $\epsilon$ ia]也叫“豆芽兒”[tou<sup>2</sup>  $\epsilon$ iar]已見上文。可見[-u]尾的作用不是和“兒化”相当的。

在汉语方言里,[y],[u]介音和[-u]韵尾照例不同时出現。就是說,有[y]介音或[u]韵尾的字沒有[-u]韵尾,有[-u]韵尾的沒有[y]介音或[u]介音。北京語音沒有[yau],[uau]一类韵母。可是在郑州方言里,相当于帶“子尾”的[-u]尾韵就沒有这个限制。例如:

騾 $\epsilon$ lu $\epsilon$	“騾子”叫 $\epsilon$ luau
桌 $\epsilon$ təu $\epsilon$	“桌子”叫 $\epsilon$ təuau
鐲 $\epsilon$ təu $\epsilon$	“鐲子”叫 $\epsilon$ təuau
刷 $\epsilon$ əua	“刷子”叫 $\epsilon$ əuau
勺 $\epsilon$ əu $\epsilon$	“勺子”(羹匙)叫 $\epsilon$ əuau
果 $\epsilon$ ku $\epsilon$	“果子”叫 $\epsilon$ kuau
	“糖果子”(点心)叫 $\epsilon$ t <sup>2</sup> ar $\epsilon$ kuau
袜 $\epsilon$ ua	“袜子”(不論大小)叫 $\epsilon$ uau
娃 $\epsilon$ ua	“娃子”叫 $\epsilon$ uau
	“狗娃子”(小狗)叫 $\epsilon$ kou $\epsilon$ uau
痼 $\epsilon$ tə <sup>2</sup> ye	“痼子”叫 $\epsilon$ tə <sup>2</sup> ya
靴 $\epsilon$ əye	“靴子”叫 $\epsilon$ əya
	“棉靴子”(棉鞋) $\epsilon$ miən $\epsilon$ əya



罐  $\epsilon y\epsilon$  “罐子”叫  $\epsilon yau$   
(發罐子叫  $\epsilon fa \epsilon yau$ )

鄭州話的[ $uau$ ]、[ $yau$ ]兩韻一律是帶相當于“子”的[- $u$ ]尾。所以我們一看見鄭州[ $uau$ ]、[ $yau$ ]兩韻字，就知道他是名詞，和“兒化”韻是名詞一樣。這是一個語音與語法密切相關的好例子。

以上說的鄭州相當于“子尾”的[- $u$ ]尾，也适用于原陽話。例如：

脖子  $\epsilon po$  “脖子”叫  $\epsilon pau$   
拔  $\epsilon pa$  “鞋拔子”叫  $\epsilon pie \epsilon pau$   
傻  $\epsilon sa$  “傻子”叫  $\epsilon sau$   
(和少 多少  $\epsilon sau$  同音)  
帖  $\epsilon tie$  “帖子”叫  $\epsilon tiau$   
(和挑  $\epsilon tiau$  同音)  
台  $\epsilon tai$  “台子”(戏台)叫  $\epsilon tiau$   
(和条  $\epsilon tiau$  同音)  
茄  $\epsilon tpe$  “茄子”叫  $\epsilon tpeiau$   
(和桥  $\epsilon tpeiau$  同音)  
瞎  $\epsilon pia$  “瞎子”叫  $\epsilon piau$   
(和置  $\epsilon piau$  同音)  
桌  $\epsilon t\epsilon uo$  “桌子”叫  $\epsilon t\epsilon uau$   
刷  $\epsilon \epsilon ua$  “刷子”叫  $\epsilon \epsilon uau$   
豁  $\epsilon xuo$  “豁子”叫  $\epsilon xuau$   
癩  $\epsilon tpe ye$  “癩子”叫  $\epsilon tpe yau$   
柿  $\epsilon \epsilon$  “柿子”叫  $\epsilon sou$  (和瘦  $\epsilon sou$  同音)  
鼻  $\epsilon pi$  “鼻子”叫  $\epsilon piou$   
梯  $\epsilon ti$  “梯子”叫  $\epsilon tiou$

原陽話[ $an$ ]、[ $ian$ ]、[ $uan$ ]、[ $yan$ ]四韻，失去[ $n$ ]韻尾變成開尾韻[ $a$ ]、[ $ia$ ]、[ $ua$ ]、[ $ya$ ]，相當于加“子尾”。換句話說，原陽話加[- $u$ ]尾，減[- $n$ ]尾都相當于“子尾”。例如：

盤  $\epsilon p'an$  “盤子”叫  $\epsilon p'a$  (和爬  $\epsilon p'a$  同音)  
毯  $\epsilon t'an$  “毯子”叫  $\epsilon t'a$  (和他  $\epsilon t'a$  同音)  
籃  $\epsilon lan$  “籃子”叫  $\epsilon la$   
扇  $\epsilon san$  “扇子”叫  $\epsilon sa$  (和啥  $\epsilon sa$  同音)  
竿  $\epsilon kan$  “竿子”叫  $\epsilon ka$   
鞍  $\epsilon an$  “鞍子”(馬鞍)叫  $\epsilon a$   
案  $\epsilon an$  “案子”(案板)叫  $\epsilon a$   
辦  $\epsilon pian$  “辦子”叫  $\epsilon pia$   
面  $\epsilon mian$  “面子”叫  $\epsilon mia$   
(鞏面叫  $\epsilon li mia$ )  
簾  $\epsilon lian$  “簾子”叫  $\epsilon lia$   
剪  $\epsilon tsian$  “剪子”叫  $\epsilon tsia$   
鉗  $\epsilon tpe'ian$  “鉗子”叫  $\epsilon tpe'ia$

簍  $\epsilon ian$  “簍子”叫  $\epsilon ia$  (和芽  $\epsilon ia$  同音)  
緞  $\epsilon tuan$  “緞子”叫  $\epsilon tua$   
椽  $\epsilon t\epsilon uan$  “椽子”叫  $\epsilon t\epsilon ua$   
罐  $\epsilon kuan$  “罐子”叫  $\epsilon kua$  (和挂  $\epsilon kua$  同音)  
捲  $\epsilon tpeyan$  “捲子”叫  $\epsilon tpeya$   
檀  $\epsilon \epsilon yan$  “檀子”叫  $\epsilon \epsilon ya$   
園  $\epsilon yan$  “園子”叫  $\epsilon ya$   
院  $\epsilon yan$  “院子”叫  $\epsilon ya$

[- $n$ ]字失去鼻音韻尾后，常常與原有開尾韻同音，如“盤子”和“爬”同音，“毯子”和他①同音，“扇子”和“啥”同音，“簍子”和“芽”同音，“罐子”和“挂”同音。原陽本來沒有[ $ya$ ]韻，[ $yan$ ]失落[- $n$ ]尾才有[ $ya$ ]韻，所以原陽這一韻字一律是名詞。

河南荻嘉相當于“子尾”的韻母變化比鄭州、原陽都複雜。現在我們挑些韻母來說：

荻嘉韻母	荻嘉相當于加“子尾”的韻母
$a, \epsilon$	$\epsilon$ ②
$ia, i\epsilon, \epsilon, ie$	$i\epsilon$
$ua$	$u\epsilon$
$ua\epsilon, ye$	$y\epsilon$
$i, ei$	$iu$
$y$	$yu$
$\epsilon n$	$\bar{a}$
$i\epsilon n$	$i\bar{a}$
$u\epsilon n$	$u\bar{a}$
$y\epsilon n$	$y\bar{a}$
$\epsilon n, in$	$i:\eta$
$ua\epsilon, yn$	$y:\eta$
$a\eta$	$\bar{o}$
$ia\eta$	$i\bar{o}$
$ua\eta$	$u\bar{o}$

現在舉些例子：

拔  $\epsilon pa$  “鞋拔子”叫  $\epsilon pie \epsilon p\epsilon$   
把  $\epsilon pa$  “一把子香”叫  $ie? \epsilon p\epsilon \epsilon pia\eta$   
帽  $\epsilon m\epsilon$  “帽子”叫  $\epsilon m\epsilon$   
刀  $\epsilon to$  “刀子”叫  $\epsilon to$   
家  $\epsilon tpeia$  “一家子”叫  $ie? \epsilon tpeia$   
(和“交”  $\epsilon tpeio$  不同音)  
匣  $\epsilon pia$  “匣子”叫  $\epsilon pia$   
酵  $\epsilon tpeio$  “酵子”叫  $\epsilon tpeio$

① 許多河南方言和河南毗連地帶的方言“他”字讀上聲，如河南鄭州、開封、原陽、荻嘉、內鄉、山東荷澤。

② [ $\epsilon$ ]下加圓點表示[ $\epsilon$ ]和[ $\epsilon$ ]之間的元音。

盂 <sup>ciə</sup> “水盂子”叫 <sup>ɛsuei ciə</sup> ①  
 篩 <sup>csə</sup> “篩子”叫 <sup>ciə</sup>  
 (和“消” <sup>ciə</sup> 不同音)  
 孩 <sup>ɛxə</sup> “孩子”叫 <sup>ɛxiə</sup>  
 茄 <sup>ɛtə'ie</sup> “茄子”叫 <sup>ɛtə'ia</sup>  
 (和“桥” <sup>ɛtə'ia</sup> 不同音)  
 碟 <sup>ɛtie</sup> “碟子”叫 <sup>ɛtiə</sup>  
 爪 <sup>ctɕua</sup> “爪子”叫 <sup>ctɕuə</sup>  
 袜 <sup>cua</sup> “袜子”叫 <sup>cə</sup>  
 (和“窩” <sup>cuo</sup> 不同音)  
 筷 <sup>kuə</sup> “筷子”叫 <sup>kyə</sup>  
 痼 <sup>ɛtə'ye</sup> “痼子”叫 <sup>ɛtə'yə</sup>  
 靴 <sup>cəye</sup> “靴子”叫 <sup>cəyə</sup>  
 鼻 <sup>ɛpi</sup> “鼻子”叫 <sup>ɛpiu</sup>  
 椅 <sup>ci</sup> “椅子”叫 <sup>ciu</sup>  
 (和“有” <sup>ciou</sup> 不同音)  
 輩 <sup>pei</sup> “一輩子”叫 <sup>ie? piu</sup>  
 痹 <sup>fei</sup> “痹子”叫 <sup>fiu</sup>  
 葦 <sup>cuei</sup> “葦子”叫 <sup>cuiu</sup>  
 (參看上兩條和下文“蚊子”條)  
 駒 <sup>ctəy</sup> “駒子”叫 <sup>ctəyu</sup>  
 鋸 <sup>təy</sup> “鋸子”叫 <sup>təyu</sup>  
 扇 <sup>ɕɛn</sup> “扇子”叫 <sup>ɕā</sup>  
 毯 <sup>tɛn</sup> “毯子”叫 <sup>tā</sup>  
 騙 <sup>p'iɛn</sup> “騙子”叫 <sup>piā</sup>  
 剪 <sup>ctəiɛn</sup> “剪子”叫 <sup>ctəiā</sup>  
 緞 <sup>tuɛn</sup> “緞子”叫 <sup>tuā</sup>  
 館 <sup>kuɛn</sup> “飯館子”叫 <sup>fɛn</sup> <sup>cukū</sup>  
 捲 <sup>ctəyɛn</sup> “捲子”叫 <sup>ctəyā</sup>  
 院 <sup>yɛn</sup> “院子”叫 <sup>yā</sup>  
 盆 <sup>ɛp'ən</sup> “盆子”叫 <sup>ɛpi:n</sup>  
 (與“平” <sup>ɛpi:n</sup> 不同音)  
 蚊 <sup>ɛuən</sup> “蚊子”叫 <sup>ɛui:n</sup>  
 (參看上一條和上文“葦子”條)  
 金 <sup>ctəin</sup> “金子”叫 <sup>ctəi:n</sup>  
 (和“京” <sup>ctəin</sup> 不同音)  
 引 <sup>cin</sup> “藥引子”叫 <sup>ya? ci:n</sup>  
 (和“影” <sup>ci:n</sup> 不同音)  
 棍 <sup>kuən</sup> “棍子”叫 <sup>ky:n</sup>  
 孫 <sup>csuən</sup> “孫子”叫 <sup>cəy:n</sup>  
 (和“胸” <sup>cəy:n</sup> 不同音)  
 裙 <sup>ɛtə'yn</sup> “裙子”叫 <sup>ɛtə'y:n</sup>  
 (和“窮” <sup>ɛtə'yn</sup> 不同音)  
 噪 <sup>csaŋ</sup> “噪子”叫 <sup>csə</sup>  
 帳 <sup>tɕaŋ</sup> “帳子”叫 <sup>tsə</sup>  
 箱 <sup>cɕiaŋ</sup> “箱子”叫 <sup>cɕiə</sup>  
 樣 <sup>iaŋ</sup> “樣子”叫 <sup>iə</sup>

窗 <sup>ctɕ'uaŋ</sup> “窗子”叫 <sup>ctɕ'uə</sup>  
 筐 <sup>ck'uaŋ</sup> “筐子”叫 <sup>ck'uə</sup>

荻嘉這些相當於加“子尾”的韻母，都在  
 原來的韻母系統之外。因此我們一看到這些  
 新的韻母，就知道他是名詞(也有量詞)。聲  
 韻配合方式也有在原來系統之外的，例如  
 [ky:n], [k]拼撮口呼。注意荻嘉[<sup>cuei</sup>] (葦)  
 變[<sup>cuiu</sup>] (“葦子”)，和[<sup>fei</sup>] (痹)變[<sup>fiu</sup>] (“痹子”)一樣，[<sup>ɛuən</sup>] (蚊)變[<sup>ɛui:n</sup>] (“蚊子”)，和[<sup>ɛp'ən</sup>] (盆)變[<sup>ɛpi:n</sup>] (“盆子”)一  
 樣，都把[u-]當聲母看待。荻嘉其他相當於  
 加“子尾”的韻母變化不一一列舉。

荻嘉也有“兒化”韻，同一個字，可以改變  
 元音，相當於加“子尾”，也可以“兒化”。比較：

蓋 <sup>kə</sup> “蓋子”叫 <sup>kiə</sup> 蓋兒 <sup>kər</sup>  
 樣 <sup>iaŋ</sup> “樣子”叫 <sup>iə</sup> 樣兒 <sup>iār</sup>  
 捲 <sup>ctəyɛn</sup> “捲子”叫 <sup>ctəyā</sup> 烟捲兒 <sup>ciɛn</sup>  
<sup>ctəyer</sup>  
 套 <sup>tə</sup> “套子”叫 <sup>tə</sup> 手套兒 <sup>ɕou</sup>  
<sup>tər</sup>

荻嘉“子”字讀書音是[<sup>tsɿ</sup>]，可是“蓮  
 子”、“蝦子”等等的重讀的“子尾”是[<sup>tsou</sup>]，  
 也可以“兒化”讀[<sup>tsər</sup>]。例如：

蓮子 <sup>ɕliɛn</sup> <sup>tsou</sup> 蓮子兒 <sup>ɕliɛn</sup> <sup>tsər</sup>  
 瓜子 <sup>ckua</sup> <sup>tsou</sup> 瓜子兒 <sup>ckua</sup> <sup>tsər</sup>  
 菜子 <sup>tsə</sup> <sup>tsou</sup> 菜子兒 <sup>tsə</sup> <sup>tsər</sup>  
 茄子 <sup>ɛtə'ie</sup> <sup>tsou</sup> 茄子兒 <sup>ɛtə'ie</sup> <sup>tsər</sup>  
 (茄的種子)  
 蝦子 <sup>cɕia</sup> <sup>tsou</sup> 蝦子兒 <sup>cɕia</sup> <sup>tsər</sup>  
 蠶子 <sup>ɕtsɛn</sup> <sup>tsou</sup> 蠶子兒 <sup>ɕtsɛn</sup> <sup>tsər</sup>  
 槍子 <sup>ctə'iaŋ</sup> <sup>tsou</sup> 槍子兒 <sup>ctə'iaŋ</sup> <sup>tsər</sup>  
 (子彈)

注意“茄子茄的種子”的“子”字重讀，是兩個音  
 節，吃的“茄子”叫[<sup>tə'ia</sup>]，是一個音節。

凡是一個字在各種環境里有不同讀法，  
 一定要實事求是的記下來，回來慢慢研究其  
 中的道理。記錄的時候如果發現有“兒尾”的  
 可能，就多挑些同類的例子問問，並且問問  
 “兒子、女兒”怎麼說，“你、二”怎麼說。如果  
 發現有一種說法可能相當於加“子尾”，就多  
 找一些北京帶“子尾”的名詞來問問。

① 荻嘉上聲加上聲，第一上聲變陽平。



# 談歌曲演唱怎样掌握标准音問題

刘 明 綱

在推广普通話和促进汉语规范化的高潮中,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普通話,并且做着具体的推广工作,可是現在很少有人联系到歌詞創作和歌曲演唱方面来談这些問題。其实,在这方面,并不是沒有問題的。無論在語法上、詞彙或語音上,目前的問題还是不少的。像“你的歌声好象玫瑰花”(見《可愛的一朵玫瑰花》)之类的不合乎規範的現象,常常是可以看到的。不过我認为,現在对演唱者來說,最重要的應該是标准音的問題。因为音乐語言与生活語言的特点畢竟是不同的,如果將标准音应用到歌曲演唱里,一定会遇到許多在生活語言里所沒有的困难。所以尽管有人認为只要学好标准音就可以了,可是語音够标准的人,唱歌不一定唱得标准。本文就試圖从这方面来談一談歌曲的演唱怎样掌握标准音的問題,因为談得还远远不够深入,希望得到語言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的指正。

## (一) 关于元音發音的問題

一般的歌曲演唱者,对于元音的發音,确是非常注意的。因为从他們頭一次参加声乐練習时就接触到了。不过有两个問題还是值得提出研究的。一是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元音[i] (如“子”“絲”等字)和[ɿ] (如“知”“時”等字)的唱法問題。在一些短音上还好办,但在一些長音(二拍或三拍)上就有問題了。通常是在拖音时仍按特殊元音[i]或[ɿ]的本来的發音部位和方法来唱的,这就使气流接近堵塞,結果就使字音的清晰和圓潤程度受到了影响。我認为这样作比較好些:在發有[i]或[ɿ]的元音的字音时,在輔音除阻的同时,稍重一些把[i]或[ɿ]發出来,而后馬上使开口度放大些,最后使它变成近似[ə]或[ɐ]的音。这样,一方面保持了原来字音的面目,另一方面也照顧了声音的圓实和飽滿。但需要說明的是,这种方法一定要用得自然,在音变过程中不留下任何的裂痕。

另一个問題,是有些人受了西洋發音法(特別是女声)的影响,無故地縮小了元音的开口度。如有人唱《黃水謠》中的“黃水奔流向东方”的“黃”和“方”时,本来這兩字的主要元音是[a],但他却唱成了[ɔ],甚至近似[o]的音了。結果好象在嘴里含着一塊兒糖球似的。这种現象是應該克服的,因为它不能使声音清晰易懂,当然也不会使听众感到作品內容的亲切和动人了。

## (二) 关于輔音問題

很多的演唱者在練習發音时,只是着重元音的練習,以为元音發得响亮、圓潤就够了,而忽視了字音的另一个重要成分——輔音。其实这是沒有为听众着想的。为了使听众能够听懂歌詞內容而不止是听到“响亮”、“圓潤”的發音,我們必須把輔音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練得准确。K.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談到演員的吐詞問題时,就曾說过:“單字中的字母被換掉,在我看来就好像是一个人用耳朵代替了嘴巴,用眼睛代替了耳朵,用手指头代替了鼻子一样。”<sup>①</sup>那么,在声乐艺术方面,忽視字音的結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又引了C. 伏尔康斯基的話:“元音是河,輔音是岸,所以应当巩固后者,使它不至于發生氾濫的現象。”<sup>②</sup>我想不仅对演員說来是这样,对歌曲演唱者說来也同样是重要的。演唱者除了在演唱时注意克服这种“元音氾濫”現象之外,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在于妥善地安排元音和輔音的練声程序。首先,要注意在元音的基本練習刚开始不久,或者在掌握了音域的中央区域(即“自然音調”区)以后,立即轉入有輔音联合的元音練習。这样就不会过于养成口腔和咽喉的固定位置,而在唱“我的家”时也就不会使人听了好象是“我的牙”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帶音的輔音和元音的結合的問題。有的人把較長的变度音(即一字前后几个音)下面的字的帶音的輔音和元音分割开来發声,这就使一个字音有了兩次“肌肉緊張度”而成为两个音节了。如“馬”[ma]这个音节,如果先是閉口發“啤”声,然后又出来个“呵”,結果就成了“啤呵”了。对听众來說,这同在文章中用了一些生澀的詞句是同样費解的。

輔音發音在声乐艺术中是一个容易被忽視,但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課題。只有使輔音和元音很自然地拼合起来,演唱才会收到預期效果,咏歎調也就不会变成單純的發音練習。

## (三) 关于帶鼻尾音的字音的唱法

一般的帶鼻尾音的字音是不好唱的,如“江”、“芳”、“深”、“芬”等字。它們在短音里出現时,問題还不大,如果在長音或变度音里出現时,就容易唱成下面几种情形。

① 見K.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員自我修養》第二部 110 頁。

② 同上書 104 頁。

如有时把“江”[tɕiaŋ]唱成“激”[tɕi]—昂[ɑŋ]—; 还有时唱成“家”[tɕia]—[ŋ]。更糟糕的是一开始就发出完整的“江”的音节, 结果在音的延续过程中, 声音显得非常阴暗, 使歌者和听者都感到一种感官上的窒息。

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形时, 最好在主要元音——如“江”中的[a]上, 临时加上鼻化元音, 把“江”唱成[tɕi—ã—ŋ]。这样就可避免产生上面那三种感觉。在发[a]的过程中, 一来有“江”的韵尾感觉, 二来可以使字音顺利无阻地延续下去。当然, 这也须要求处理得自然而不留下任何破绽才行。

另一个办法, 是将原作稍微更动一下, 即在带鼻尾音的字音后面附加上语气词, 如“啊”、“呀”或“哪”等。例如:

原作	3/4	1̇ 6̇ 5̇   3̇ · 2̇   1̇ 3̇ 3̇ 2̇ 2̇ 7̇   6̇ —
		满 天 红
唱成	3/4	1̇ 6̇ 5̇   3̇ 3̇ 2̇   1̇ 3̇ 3̇ 2̇ 2̇ 7̇   6̇ —
		满 天 红啊(ŋa)

在保持了原作的创作特点的原则下, 是可以这样作的。这样既容易演唱, 又能增强歌曲本身的表现力。

(四) 关于几个副词的口语化问题 过去有些知识分子用读书音来念副词的“还”[xuan]、“没”[mo]、“都”[tu]——当然, “还”和“没”作为动词, “都”作为名词使用时, 都是应该按照上面的音来读的——, 现在一般人都改为口语音了。“还”念[xai], “没”念[məi], “都”念[tou]。可是在歌词唱法上, 有很多人还没有变读书音为口语音。关于这个问题, 我认为不论在长音或短音、强拍或弱拍上, 这几个副词应该一律用口语音来唱, 因为这是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的。

在一般情形下, 这些字音多是在弱拍出现, 可是也有时由于感情的需要, 就要把这些带有高元音(不响亮的元音)的韵尾的副词, 放在较强的节拍或较长的音上。这时, 要求演唱者将它的主要元音作适当的强调和夸张。如: 把“还”[xai]唱成[xa-e-e-i], 把“没”[məi]唱成[mə-e-e-i], 把“都”[tou]唱成[tə-o-o-u]。这样, 就能把它们在曲调中的作用有力地强调出来了。

(五) 关于几个词尾的唱法问题 “着”、“了”、“的”等词尾究竟应唱什么音的呢? 这确是一个一般人常争论的问题。

我认为, 这类字音的唱法应根据它在歌词中所占的地方而定。如果它是在次要的、附属于别的强拍或次强拍的字音后面, 要唱成[tɕə], [lə], [tə]; 如果处在较重要的地位, 或自己占了一个强拍或次强拍的节奏时, 就要唱成[tɕuo], [liəu], [ti]。以“了”为例, 前者如:

3/4	1̇ 1̇ 1̇   1̇ 5̇   6̇ · 5̇   3̇
	打垮了 美国兵 啊(ŋa)

后者如:

3/4	3̇ · 5̇ 3̇ 2̇   1̇ · 2̇ 3̇ 5̇   7̇ · 6̇ 5̇ 7̇ 6̇ 1̇
	说 了 话

这样处理是既照顾了口语习惯, 又符合曲调和歌词的节奏要求。

还有一种情形是不大好处理的。例如:

3/8	0 3̇ 5̇   1̇ 7̇ 5̇   6̇ · 6̇ ·
	在 遥 远 的 地 方

词尾“的”字在曲调中的地位既不是主要的, 又不是次要的; 唱[tɕi]显得不自然, 唱[tə]又有些生硬。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形(尤其是翻译歌曲)时, 不妨也稍微更动一下词尾的节奏, 使音乐语言更符合于生活语言的规律。碰到上面的情况可以将“的”唱成[tə], 并作如下的处理:

3/8	0 3̇ 5̇   1̇ · 1̇ 7̇ 5̇   6̇ · 6̇ ·
	在 遥 远 的 地 方

这就显得自然得多了。

(六) 关于语气词“啊”的变音 有些演唱者,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一律把语气词“啊”唱成它本来的字音[a], 这是不妥当的。一般作为语气词的“啊”, 都是从属于它前面的字音的, 因为前面字音的韵尾总要影响后面“啊”的音素。在生活中的语言里, 这原是很自然的音变现象, 可是有人在演唱时却忘记与生活语言相联系了。

“啊”除了独立作感叹词仍发[a]以外, 音变现象的一般规律如下:

1. 前面音节末尾是[a], [o], [ə], [ɛ], [i], [y]的音(如“家”、“波”、“草”、“斜”、“期”、“去”等)时, “啊”变成了“呀”[ia];
2. 前面音节末尾是[u]的音(如“出”、“路”等)时, “啊”变成了“哇”[ua];
3. 前面音节末尾是[n]或[ŋ]的音(如“芬”、“芳”等)时, “啊”变成了“哪”[na]或[ŋa]。

有些作词者是重视了“啊”的音变问题的。这对于演唱者说来是很方便的, 但有些作词者却疏忽了这一点, 这就要求演唱者掌握住上面的音变规律来进行演唱。例如《鲜花送给模范戴》里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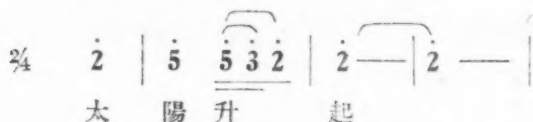
3/8	5̇ 6̇ 1̇   4̇ 3̇ 2̇
	给谁 戴 呀!
	日夜 忙 呀!
	聚宝 盆 呀!

很明显,第一个“呀”的处理是对的,而第二个就应唱作[ŋa]了。(上例可能是受汉字字数的限制写不出[ŋa]的音,不过我认为如果在歌曲里用拼音字母来表示语气词和感叹词,那倒减少很多的麻烦。)至于第三个“呀”,就应该唱成“哪”了,这是毫无问题的。当然有些诙谐曲,由于特定的感情的需要是可以例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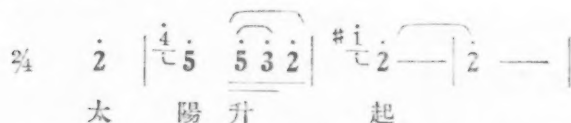
### (七) 关于声调问题

大家都知道,声调能区别词义是汉语的特点之一。因此,中国的作曲家和声乐家比起外国要多作一种工作,那就是怎样使歌词的字调和它的曲调密切结合成为一个有艺术灵魂的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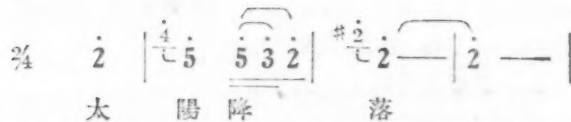
一般的作曲者是注意了声调问题的,可是有些人注意得还不够。当然也不可能每个字音都照顾到,尤其在有两三段歌词只重复同一旋律的歌曲中更是困难。这就要求演唱者能够有意识地运用表演技巧,自然而流利地去表现它。如:



如果在“阳”和“起”的前面加上符合这两个字的声调(“阳”是阳平声,“起”是上声)的装饰音,就会更好地唱出它们的音值。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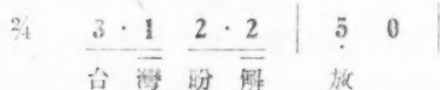
如果歌词是“太阳降落”的话,就不能象上面那样处理了,很可能变成:



在一些强拍上的字音,适当地作这样的变化是可

以的,但不可随意增加装饰音,否则每首歌曲都将变成油腔滑调的庸俗东西了。

当然,有些作品由于作曲者处理得不当,那就很难依靠演唱者的表现力来补救了。如《坚决解放台湾》中有这样一句:



无论怎样唱(当然不能将原作更动得太大),总是给人以“台湾盼街坊”的感觉。这一点是需要作曲者加强修养的。

歌曲是音乐和文学相结合的产物。演唱者只有在清晰而标准的发音吐字的前提下,才有使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意义,才能引导听众一道走进音乐家和诗人的作品中的世界。因此,这就要求演唱者加强音乐修养和文学修养,并且善于使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我们知道,声乐也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它不同于看文章;哪一句话如果没有看明白,还可以停下来重看,而有的歌词没听清楚,就不可能使歌唱停下来重新揣摩那些没听懂的词句。要是听不清楚,当然谈不到歌曲给予听众的艺术力量,至少,这种艺术力量也要受到削弱。因此,不能不严格地要求演唱者熟练地掌握吐词和发音上的技巧。

另外,有一点要附带说明:本文只是从标准语音方面的一般性问题来谈的,至于歌曲演唱中夹杂着方言的情形就更多了。如[n], [l]和[ts], [tsʰ], 以及[ən], [eŋ]不分(用方言唱的民歌和地方曲艺除外)等。这需从普通话的基本知识方面来着手学习和训练,这里就不来谈了。

总之,音乐工作者只有重视标准音的掌握和发音吐词的训练,歌曲演唱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同时,这样也就可以在音乐艺术的园地里,显示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效果。

(接11页)

不把D组划归助词而把它们定为词头词尾好些。(吕叔湘、孙德宣,助词说略,本刊1956年6月号38页)

17 除非举行这样一次会议,不然他们不仅在具体的冷战行动中不能有所成就,而且还会在选举中被赶下台。(1953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18 杨子美的生活,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平常总是像钟摆一样地有规律。(周立波,铁水奔流,8)

例18的“平常”就是“特殊情况”的反面。在这种不注重语句形式而注重思想内容的情下,省掉“否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的思想内容是应该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来表达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这种正确地纷歧混乱的状态,必须树立用词造句的规范。

### 三 小结

用“除非”的句式有五:

1) “若要…除非…”——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除非…方才…”——除非无了此气,方可休也。

3) “若要…除非…方才…”——若要病好,除非子孝父心宽,方才可救。

4) [若要…]除非…[方才…]——除非是那些汉奸们, [才吓唬人。]

5) “除非…否则…不…”——除非你去请他,否则他不会来。

总结“除非”的意义和用法,可概括出下列三点:

一、“除非”是否定的否定,即肯定连词,意为“只有”。

二、“除非”所连的意思,一般都是相容的。肯定前项,必须肯定后项;否定前项,必须否定后项。如果连接的是矛盾的兩项,下文须用“否则”,或认为是省掉“否则”。

三、“除非”表唯一条件,它可用在“若要”之后或“方才”之前,也可夹在“若要”与“方才”之间。单独使用是比较少见的。用“否则”来转折是后起的用法,但是已经习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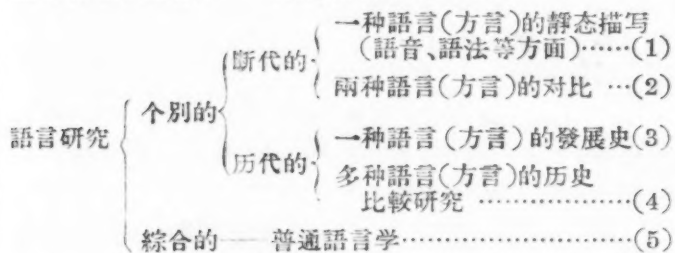
# 談談語言學

——語言學講話之一——

彭楚南

## 1 語言研究的內容

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語言，這些語言都是語言學所要研究的。語言研究的內容是很豐富的，首先，它可以分為個別的(演繹的)研究和綜合的(歸納的)研究。個別的研究又可以分為斷代的(描寫的或靜態的)研究和歷代的(歷史的或動態的)研究。同時對兩種(偶爾也有多種)語言(可以沒有親屬關係)或方言進行斷代的研究，這是主要對語言教學或翻譯有幫助的對比研究。同時對多種語言(必須是有親屬關係的)進行歷代的研究，這就是歷史比較研究。最後，在個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綜合的研究——普通語言學。列表如下：



所有有關語言的研究都可以列入上述五項研究中的一項。比方“現代漢語語法”或“傣語音位系統的研究”是屬於第一項；“俄漢語音比較”或“英漢詞典”是屬於第二項；“漢語歷史大詞典”是屬於第三項；“斯拉夫語言學”或“漢藏語系的聲母和聲調的相互關係的研究”是屬於第四項；“語言學概論”或“普通語音學”是屬於第五項。顯而易見，每一項下面又可以細分為語音、詞彙、語法等不同方面。對於前面四項，由於世界語言數目眾多，可以寫出數量極多的語言學著作。

## 2 普通語言學

普通語言學是各種語言研究的理論部分，它是由於綜合、歸納了上述四項的研究成果，從中抽象出最一般的、不限於任何單一語言的理論而成立起來的。19世紀初葉，由於個別語言研究的著作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因而建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在這一基礎上，在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葉建立了普通語言學。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里說，“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sup>①</sup>這就是普通語言學存在的理由。但是，普通語言學在開始建立的時候主要是依靠了印歐語言的材料和歷史比較研究的結論。它從印歐語言的實踐中來，還能夠為印歐語言的實踐服務。

對於其他語言雖然也考慮到，但應用起來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接着，美國的一些語言學家由於研究了結構不同於印歐語言的印第安諸語言而把普通語言學向前發展了一步，建立了一些新的但還有很多缺點的理論。蘇聯的一些著名語言學家也對普通語言學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大家知道，所有這些理論都還不能解決像漢語這樣特殊的語言的全部問題。關於這一點，可以從最近的漢語詞類討論和主賓語討論中明顯地看出來。因此，它有待於進一步的發展。普通語言學將要在漢藏語系和其他語系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營養。

這一講話的內容將限於普通語言學的一般知識(也談一談歷史比較研究)。材料是從各家的研究成果中歸納出來的，但不可避免地將要敘述到個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3 語言學的对象

光說語言學的对象是語言還不夠。語言學為什麼能夠構成一門獨立的科學呢？語言跟其他社會現象的區別在哪裡呢？

斯大林說：

語言之替社會服務，乃是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為社會交流思想的工具，作為使人們相互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這一切活動範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濟關係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會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這些特點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而且正因為它們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所以語言才是獨立的科學——語言學——底研究对象。如果沒有語言底這些特點，語言學就會喪失獨立存在的權利。<sup>②</sup>

斯大林是從語言的特點來說明這個問題的。

羅常培同志在《語言學的对象和任務》<sup>③</sup>一文中引用了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關於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对象就是該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的理論，推論出語言的特殊的矛盾就在於“怎樣由現實抽象、概括成語詞，使說話的跟聽話的兩方面通過構成語詞的一個或一連串聲音所代表的概念，彼此間由互不了解達到互相了解；並且進一步地理解現實，發展智慧，創造科學”。(原來的着重點)。該文作者接着敘述了人類的祖

① 《毛澤東選集》283頁。

②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35頁。

③ 《中國語文》1952年8月號12頁。

先在創造語言中需要經過一段怎樣艱苦的過程，而“現在，語言已經成了咱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生在同一語言社會里的人們也許不感覺這種矛盾的特殊性了”。（着重點是我的——彭）。

這種特殊的矛盾無論在人类的祖先，無論是在現在和在將來，都是一樣存在的。比方現在要推廣普通話，就是因為漢族人們的語言社會不完全是同一的，因而發生了矛盾。對於文字改革，漢語规范化等現實問題都可以找出矛盾的所在。這些都構成了目前語言研究的中心內容。

#### 4 語言學的實踐意義

語言研究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冷門，在舊中國也是一樣，因為它是脫離實際的。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中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工作之旨趣》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臘文在歐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們在學問上之進步，恰恰成正比例，我們希望在中國也是如此。現在中國希望製造一個新將來，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歐美的物質文明，即物質以外的東西也應該取精神于未衰敗的外國。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式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這一行的學術。

資本主義國家的語言學的特点是：反對普及，不解決實際問題。它是沒有群眾基礎的。它不能解決最起碼的問題——比方文字改革。在英國，雖然有蕭伯納等名流的倡導，英文的正字法改革總還不能成功。法文的正字法更需要改革，但是少數語言學家的努力總不能改變政治制度對群眾利益漠不關心的態度。相反地，在社會主義國家里，語言研究是為生產服務，密切結合實際的科學。我國解放後，由於客觀形勢的發展，語言作為社會交際工具的作用越來越顯得重要了。《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的社論号召我們“正確地使用語言，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於是大家就注意語法的学习；1952年在國務院下面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4年底取消“研究”兩個字），進行文字拼音化的準備工作，於是就有一批人，包括語言學家和一般語文工作者，進行各種各樣的研究；國務院最近發出指示，要在全國漢族人民中間推廣普通話，於是就有大批幹部為了普通話而調查方言，參加普通話訓練班學習，編寫“××人怎樣學習普通話”之類的小冊子；1955年在北京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把漢語規範化的問題提了出來，於是就有許多人認定了研究題目，企圖解決規範化的許多問題；我國又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幫助少數民族創立或改

革他們的文字是人民政府的政策，為了貫徹這一政策，就有大批漢語幹部和民族幹部從事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創立文字、改革文字和翻譯政策文件等工作；為了學習蘇聯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從解放以來就有許多人學習俄語，從事翻譯工作；由於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地位日益提高，中國跟世界各種類型的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頻繁，各種外國語言（包括中國人從來沒有學過的語言）的學習任務正需要許多人去完成；為了提高學生的語言使用能力，在中學里開始將語言和文學課程分家，由於漢語課程的設立，一系列有關古今漢語的問題急待語言學家們去研究解決；最後，由於自動機器理論的發明，在自動翻譯、數理邏輯等新的問題上也需要我們迎頭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這些研究是跟語言研究有關係的。一句話，從事語文工作的人數突然增加起來了。他們所從事的語文工作都有一項共同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作為理論的指導。作為語言研究的理論部分的語言學，更确切些說，普通語言學，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為生產服務，密切跟實踐結合起來了。

#### 5 語言學的理論意義

語言研究的功用當然不只限於實用的一方面。語言既然是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又是很特殊的一種社會現象，那麼對它的研究就會給人類帶來意義重大的知識，可以豐富人類的知識寶庫。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提出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29頁）。這一任務是屬於普通語言學的。語言發展內部規律應該如何了解呢？語言有各個不同的方面：語音、語法、詞彙、文字（個別的）、方言等等。這些方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它們是會互相發生影響的。每一方面有它的內部發展的特殊規律，而這些特殊規律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規律性就構成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比方，語法構造的变化是語音变化引起的，或者是語義变化引起的呢，還是兩種变化共同引起的？它們之間有些什麼關係？又比方，文字的發展一般有三個階段：圖畫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這是文字發展的特殊規律。語音的發展沒有這個階段性。為什麼漢語到現在還停留在以形聲字為主的表意文字階段呢？在這裡，語音發展的特殊規律跟文字發展的特殊規律之間的規律性，就構成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一部分（這些只是舉例說明而已）。語言的各方面之間具有許多錯綜複雜的矛盾，解決這些不斷發生的矛盾，發現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規律——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這就是語言學的主要任務。人類對於語言發展規律的認識的加深，一方面可以指導語言實踐，一方面又可以促使人類在真理的長河中更加接近絕對真理。



語言学的研究还丰富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上層建筑基础的学說，打破了社会現象不是屬於基础就是屬於上層建筑的偏見。語言学的材料和結論对于哲学、心理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人种学等等的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

资产階級語言学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产为资产階級狹隘利益服务的反动理論，其中最显著的是有种族主义傾向的語言进步論和反动透頂的語义学理論。前者鼓吹德語(德国学者)或英語(美英和它們的附庸国家的若干学者)是最純潔的或者最进步的語言，因而得出德国人或盎格魯·薩克遜人應該統治世界的結論。在希特勒时代，据挪威語言学者 Alf Sommerfelt 說，他的朋友 Marstrand 教授因为在一次演講中說到德語語音比其他日耳曼語言保留得更少的古代系統，就被納粹政府逮捕了。<sup>①</sup> 这是种族主义的露骨的表现。斯大林在《关于丘吉尔 1946 年 3 月 13 日演說答《真理报》記者》中对于英美的种族主义也給了猛烈的攻击：

丘吉尔和他的朋友們在这方面令人惊奇地使人想起希特勒和他的朋友們。希特勒开始發動战争时宣布了一种种族理論，說是只有說德語的人才才是真正的民族。丘吉尔先生也是用种族理論来开始發動战争，說是只有說英語的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被賦予了决定全世界命运的使命。……

实际上，丘吉尔和他的英国、美国朋友們对不說英語的民

族提出了类乎最后通牒的东西：自願地承認我們的統治，一切就会很好，——否則战争就不可避免。

可是各民族在五年的殘酷战争期間流血，是为了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不是为了要換希特勒的統治为丘吉尔的統治。因此完全可以設想，不說英語而同时是占全世界居民的最大多数的民族將不同意再度被奴役。

丹麦語言学家叶斯丕遜就是英語优越論的热烈鼓吹者。

为美国帝国主义服务的語义学派的著作近年来在資本主义国家泛滥着。这派人物露骨地破坏作为交际工具、斗争工具和認識客观世界的工具的語言，他們企圖从語言中除去和取消一切客观內容，因为語言里面有許多东西是令反动派討厭的。他們号召用新的名称代替“資本主义”“剝削者”等等术语，他們說这些語詞跟事实不相适应，这些語詞引起世界战争，毁灭人类。語义論者認為只要更改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现实。他們就希望这样消灭社会的矛盾，取消階級斗争。

对于納粹的德意志民族优秀論，叶斯丕遜之流的英語优越論和美国語义学派的反动企圖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的和錯誤的理論給以坚决的揭露，这就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在理論方面的重大意义。

① Alf Sommerfelt,《The position of linguistics in the post-war world》,載在《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1942年,2頁。

## 动态

### 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

1956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鋒，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中央民族学院院长苏克勤、語言研究所所長罗常培、苏联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和国内著名語言学專家、少数民族代表等一百余人。

在成立大会上，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所長包尔汉致开幕詞。他說少数民族語言所的成立是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大喜事。談到少数民族語言所的今后任务时，他說：“在过去，我国少数民族中，只有蒙、藏、維吾尔、哈薩克、朝鮮等二十个民族有代表本民族語言的文字，其他多数兄弟民族都沒有自己的文字。在現有的少数民族文字当中，也有許多不能适应目前的需要。这些就大大阻碍了他們的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帮助少数民族發展文字，就成为少数民族語文科学工作者的重大政治任务。今后必須大力調查研究汉藏、阿尔泰、南亞、印欧等四个語系的語言，并使我国逐渐成为汉藏語言的研究中心，向国际語言学界作出有价值的貢獻。”接着，少数民族語言所副所長傅懋勳报告研究所的筹备經過以及七个調查工作队半年多来的工作成就，并且举了許多生动的例子說明研究所成立的政治基础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他还就研究所今后的工作计划，作了一些簡單的介紹。例如：在 1957 年，七个工作队將帮助哈尼、卡瓦、納西、白、黎、侗、水家、塔吉克、东乡、保安和裕固等民

族提出設計文字的办法；对已經設計了文字的民族也將要大力地帮助他們实验推行；同时展开語調調查工作。在 1957 年还要从事編写若干民族語言調查报告和語法書、詞典的工作。

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鋒，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也給大会做了重要的指示。他們扼要地闡明了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的意义。汪鋒同志強調从事民族語文調查研究工作要尊重各民族的特点，坚决地反对大汉族主义。潘梓年同志也說，从事这项工作是要更細心、更深入，不要犯大汉族主义的錯誤。

苏联謝尔久琴柯教授在大会上的講話受到热烈欢迎。他首先代表苏联專家們祝賀少数民族語言所的成立。并且希望中苏兩国的民族語言研究工作者互相交流經驗，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

在会上講話的还有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罗常培。他生动地說明民族語言研究所的成立是語言科学界的大喜事，他真摯地說：“虽然这两个兄弟所分家了，但是将来还是要合并的，这都是工作的需要。”他举了許多例子說明了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和語言研究所之間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可分割的；正因这样，兩所的工作同志們要互相学习，取長补短，共同提高，为了語言科学水平的迅速提高而努力。

大会在当日正午圓滿結束，全体攝影留念。（郝达）



# 評 漢 字 筆 順 排 檢 法

周 勛 初

到目前為止，通行的漢字排檢法中還是部首法的勢力最大。但是部首法的缺點實在太多，因而許多年來陸續興起了很多新排檢法，希望能夠代替這陳舊的傳統的排檢法。現在可以把幾百種新排檢法分成幾大類，筆順排檢法就是新興起的排檢法中的一大類。

一般筆順排檢法的擬制者認為：拼音文字是用幾十個字母結合而成的，漢字是由幾種筆畫搭配成的，漢字的筆畫就相當於拼音文字的字母。拼音文字字母之間的順序（如 a、b、c、d……）是由傳統習慣固定下來的，同樣，我們也可以把漢字的各種不同筆畫定出個誰先誰後的次序來。排列漢字時，可以把每個漢字逐筆還原成組成它的筆畫，並且依照手寫習慣順次排列（如“田”字可分解成“丨 冂 一 丨”，“木”字可分解成“一 丨 丿 ㇏”）。仿效拼音文字比較上下字字母而排定文字先後次序的原則，我們也可以比較上下字筆畫的順序而確定每個漢字在字典里的固定位置。筆順排檢法的原理就是這樣提出的。

## 筆 畫 不 等 於 字 母

現在我們試來考察一下，漢字的筆畫到底象不象拼音文字的字母呢？

在拉丁語系的拼音文字中，每一個詞中的字母，照例是自左至右排列，次序是固定的。漢字的情況卻不同了。在每一個方塊漢字中，筆畫與筆畫不是依次排列而是交互錯綜的。漢字筆畫的發展方向是沒有一定的，筆畫與筆畫間的結合方式也是沒有一定的，這比起拼音文字單純“一面倒”的排列方式當然是複雜多了。

起筆在筆順排檢法中占重要的地位，因為起筆往往是分部的根據。如果你第一筆的寫法和字表、字典上的規定有出入，那你就會錯到別部里去亂找，找不到你所要的字。有些字表只取第一筆來分部的更是如此。但是解決起筆問題卻有很大的困難。因為漢字的起筆不是完全固定的，許多字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習慣寫法，有了問題並沒有什麼客觀的標準來判斷誰是誰非。

起筆問題包括起筆筆形和起筆順序兩方面。

我們知道，印刷體和手寫體的字形是不完全相同的。手寫體的“言、戶、亡”在印刷體中作“言、戶、亡”形，“丶”部中的字分到了“一、丨、丨”部中去了。為了解決這些漢字本身的固有的缺點，筆順排檢法的擬制

者便不得不加上一條“依手寫體”為準的規定。可以說，這個問題是可以由這個規定而大體上得到解決的。隨着漢字標準字形的規定等一系列的措施，字體問題就可以有圓滿解決的希望。異體字問題隨着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整理異體字工作的逐步實施，也大體上可以解決了。

但是起筆筆形問題還不能說是已全部得到了解決，因為手寫體中起筆的寫法也有不同，“反、疑、刊”就有人寫作“反、疑、刊”，仍有發生錯部的可能。

起筆順序問題更是複雜了。許多字的起筆存在着兩歧情況。就拿旧部首來說吧，“丩、非、革、長、門、門……”就都有兩種不同的寫法，有關這些部首的字都有混亂的可能。有些字的起筆更是“三可”的，象“世”字，有人從“丨”起，有人從“乚”起，有人從“一”起，三種寫法都有人用；但是，筆順排檢法的擬制者只能選擇一種。

由起筆順序不同而產生的後果是第一、二筆的不穩定。象“丩”旁，如果你先寫“丨”時，那“丨”就成了第二筆；如果你先寫“乚”時，那“乚”就成為第二筆了。第一、二筆穩定的字第三筆還是有分歧的可能，如“耳”字，第一、二筆沒有問題，第三筆却又有從中間的“一”起和從右邊的“丨”起兩種不同的寫法。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漢字筆順的複雜性來。

筆順排檢法的基礎是群眾書寫漢字的習慣。不能說我們書寫漢字時的筆順習慣毫無規律可言，但是書寫漢字的習慣畢竟沒有經過科學的整理。有人覺得這樣寫順手，有人覺得那樣寫順手，這樣各種寫法就并存下來了。

就是拿每個人的書寫習慣來說吧，同一個字有時也會有不同筆順。因為書寫時還要考慮到每個字與上下字的聯繫，它內部筆畫間的聯繫。為了使文字書寫迅速和順手，上下字的筆畫應該考慮聯結起來；為了避免漢字內部結構的鬆懈，減少上一筆與下一筆在空間上的距離，這也要求書寫時對筆畫結構作合理的安排。某些字起首幾筆形體雖然大致相同，但每個字與內部其他筆畫之間的結構、與上下字的聯繫還有不同，這樣就是同樣一個人書寫起來也會發生差別了。這種情況在行、草書中更是常見。楷書中某些相同形體的書寫單位的筆順所以會發生分歧，也往往是受行、草書的影響形成的。

也有人說：漢字筆順並不雜亂，它有規律可尋，可以從中總結出“先左後右”“先上後下”“先外後內”“先中後邊”等幾條大原則來。

可惜的是這些大原則都有些例外。

- (1) 先左後右 有些字就是從中間開始的，如“小、水、當、變”等。有些字是從右邊開始的，如“义、丰”等。有些字的左邊却是一個習慣上放在最後書寫的旧部首，如“退、道、這、遺”“巡、延、廷、建”等。
- (2) 先上後下 這規則有些地方是與“先左後右”衝突的，如“花、布、戒、麥”等，往往是先寫橫畫然後再寫位於上端的一筆。有些字的最高筆在筆順上講却是放在後面書寫的，如“心、川、由、刊”等。
- (3) 先外後內 真正的口形字也不純是先外後內的，象“四、目、国、圈”等字的底部一橫，照例放在最後書寫。有些包被字的筆順更是“先內後外”，如“凶、函、幽、幽”等就是。
- (4) 左右部分相同的字，先中央後左右 “小、水、當、變”等字，與“先左後右”的原則有矛盾，為了解決這問題，有些人就另列出這一項來求得解決。但是象“猗、鸚、斑、玢”等也屬於左右部分相同的字，却又是“先左後右”，而不能“先中央、後左右”了。

大原則與大原則之間常起衝突。為了更進一步解決矛盾，有些人就再加上筆畫次序的規定：

- (1) 先橫後直 象“土、井”等字，固然符合這原則，但“貴、骨、肉”等字却又是“先直後橫”的了。“長、門”等部首也有人先從“直”開始的。
- (2) 先橫後撇 “大、刀”等字是先寫橫後寫撇的，但“九、月、母、女”等字又把順序顛倒過來了。
- (3) 先撇後捺 這一條原則本身可能沒有什麼例外，但“义、余”等字却又與“先左後右”的大原則矛盾。

絕大多數的原則都有例外，彼此又常發生矛盾，因此僅僅規定這樣一些原則還不能解決問題。

為了使這些原則精密化，有些人便在有問題處層層分析下去，分門別類地定出許多細則來限制例外字。這樣做當然能夠解決些問題，只是規則過多過細的排檢法往往會犯上繁瑣、不切實用的毛病，很難被群眾接受。

也有些人主張用互見法來解決起筆筆順分歧問題。互見法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對全部漢字說來，漢字筆順有分歧的為數還不算大，但以個別字計算起來，為數卻相當多，所以用互見法來強行解決必然會增加前後翻檢的麻煩。

拼音文字字母編排上是否也有這麼一大堆混亂情況存在呢？沒有。因此從排檢法來說，字母與筆畫形式上的相似只是一種錯覺，筆畫並不相當於字母。

## “江山千古”及其他

“江山千古”是最簡單的一種筆順排檢法。所謂“江山千古”是指這四個字的首筆“丶丨丿一”而說的。筆順排檢法的擬制者把漢字所能有的筆畫都歸并到這四種筆形中去，他們并把從漢字分解出來的筆畫依“丶丨丿一”次序排列。

和“江山千古”法的原理相同的還有“元亨利貞”、“寒來暑往”、“勞動世界”等多種，這都是以四字的首筆代表四種筆形而命名的。此外，也有直接命名為“點橫直撇”法的。

“江山千古”法的缺點，除了上面所說的起筆問題外，還在於把筆形分析得太簡單，許多曲筆沒有好好地安排，只是大体上依照筆畫開端的形態歸并到“丶丨丿一”中去。漢字筆畫變化多端，硬性地將不同的筆形分派進四大部類有時就不能不勉強一些了。

由於“江山千古”法只簡單地把筆形分成四種，所以在進行比較筆畫而排定字的位次時，老是會碰到點對點、橫對橫、直對直、撇對撇的情況，許多形態截然不同的筆畫會被認為是同類，許多形態截然不同的字也會被認為是筆畫組織相同，這樣必然會發生同部類字過多的問題。“江山千古”法過去只用於檔案上，現在也只用來編排人名表、字表或小字典之類篇幅不大的東西，就是因為以上這些原因而限制了它的用途的。收字不多的東西容易處理，其中間或發生混亂時也只要前後多翻一下就行了；但是如要用來編制收字較多的字典時，那“江山千古”法就必須和部首法、筆畫法等結合一起應用。

把漢字筆畫分成四類無論如何是不敷應用的，就是再增加“曲筆”一項也不濟事。一些筆順排檢法的擬制者有見於此，於是便不能不把筆畫的種類擴大。

漢字筆畫的不同形態究竟有多少種呢？

對漢字各種筆畫形態的研究，過去的書法家們曾做過許多細致的工作。晉衛夫人筆陣圖列筆畫七種，唐歐陽詢八法列筆畫八種，但最著名的筆法論要算是隋智永的“永字八法”<sup>\*</sup>。

“永字八法”是指構成“永”字的八種筆畫而言的。有些人說漢字筆畫不超出這八種，這種說法不合實際情況。

“永字八法”等等是為練習書法而提出的。書法論者的意思是叫人在精究書法之前先練好這八種基本筆畫。這樣的做法不是對漢字筆形作科學的分析或歸類。“永字八法”與排檢法上的研究筆畫形態目的是不同的。

<sup>\*</sup> “永字八法”，有說是晉王羲之所創的，有說是後漢崔瑗、張芝所創的，也有人認為是唐張懷瓘所創的。



汉字的笔画到底可分多少种，各家说法不一。据陈公哲的研究，就是不同形态有72种之多，这就等于“永字八法”的九倍。

当然，我们在排检法中也用不到把笔画分得这么细，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一般笔顺排检法的拟制者都倾向于把汉字的不同笔画分成七类、八类或是十类。他们把最常用的称为“基本笔画”，用来统率一大批形体近似但比较不常用的“附属笔画”（或称“变形笔画”）。

无论分类怎么精当，一大群复杂的笔画归那一“基本笔画”统率，“基本笔画”之间的先后次序如何？总要把它们强记住，这就不能不增加脑力负担。

分类时最难于处理的有“乚”“ㄣ”“ㄚ”等几种笔画，有些时候它们老是与其他笔画相混。处理这种笔画时要慎重考虑与其他笔画的分合问题。

我们假定某一笔顺排检法已全部解决笔画分类问题，各大类的先后次序也已确定，那它还要进一步解决编排上的一些问题。

笔顺排检法的另一难题就是汉字笔画的计算问题。汉字的笔顺问题是和笔画问题密切相关的。决定两字谁先谁后，需要将两字一笔对一笔地比下去，这里就有一个“怎样算是一笔”的问题先要解决。汉字的笔画问题历来也是混乱的，有许多疑难字《康熙字典》上就只能作硬性规定，如凹(5笔)、亞(8笔)、臣(6笔)、頤(15笔)、淵(11笔)、肅(13笔)等，各人计算时会得出各不相同的笔画数来。

笔顺排检法的拟制者也曾想出许多办法，试图解决计算笔画的问题。有些人沿用习惯的计算方法，那当然会遇到一系列的老问题而难于解决；有些人主张笔画每转折一次就加算一笔，这样“乚”“ㄣ”“ㄚ”等就要算成两笔三笔，进行逐笔比较时更见繁瑣、复杂了；有些人主张遇到曲笔时都作一笔计算，这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曲笔的界限有时很难确定。而且以上两种硬性规定的办法也就违反了笔顺排检法以习惯为基础的准则。

可以说，如果笔画问题不能彻底解决，那笔顺问题也就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

### 部首笔顺综合式和首末笔排检法

笔顺排检法用逐笔比较的办法来定先后，有些字一比较起首几笔就可以分出谁先谁后，有些字却不成，你总要比较到七八画之后才能确定。显然，无论排字或是检字，遇到这种情况都令人头痛。为了避免笔笔相比较的麻烦，笔顺排检法的拟制者便设法只从整个字中挑取几笔来进行比较，部首笔顺综合式和首末笔排检法便是这样产生的。

部首笔顺综合式是把笔顺原则结合部首拟制的。

大多数的汉字是以偏旁作为结构单位的。根据专家的统计，左右字占汉字总数的80%以上，而偏旁中的部首又大都集中在字的左边，所以把部首集中在一起编排是合乎汉字结构原则，使用上有着实际意义的。相同的偏旁笔顺必然相同，所以笔顺排检法的拟制者大都提出笔顺排检法有“聚同形”的作用。部首笔顺综合式是在巩固这优点的基础上来进一步解决汉字编排问题的。

光从笔顺排检法着手来“聚同形”，工作还只做了一半，因为部首右边的一半还没有处理。一些收字较多的部首，如“亻”“艹”“彳”“金”等，每部都包含有几十或几百字之多，这中间还得分出个先后次序来。

一般的部首笔顺综合式都先比前几笔来聚部首，越过部首再从后面比几笔来定各字间的次序。用来比较的笔数随材料的不同而决定。有些收字较多的材料，问题较麻烦。象《辞海》附录“五笔检字法”中，先比前三笔聚部首，越过部首再取两笔来定同部首字之间的次序，这样已经比了五次笔形；但有些部类，如“彳”部的“一”“一”“一”里面，还有三四十字之多，同部类字过多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部首笔顺综合式保存了部首法的某些好处，但也把部首法的某些缺点带进来了。像《新华字典》（音序本）“笔形部首检字表”中，“一”“一”“一”四大类下还列有126个部首。有些字是无部首可归的，《新华字典》（音序本）“笔形部首检字表”的拟制者便只能仿效老部首法把它们硬性派给某一部首来统率，如“直”（1）部之下含有28个部首，第一个部首[1]下㊀类中还加了个附部（非），表明底下一群字是用（非）开头的，但最后却硬性地附上了“北、背、冀、凸”几个字形悬殊的字。又如“直”（1）部[1]之下排列了“以、与、扌、與、譽、舉、歟、母、母、貫、水、氷、沓、鹵、鹽、蚩、出、巢、糴、崇、收、艸”22字，这中间的某些字实在看不出与[1]有什么关系来。编者所以要这样做，显然也只是为了这些流浪儿无家可归，因而不得不强行委托[1]来收容罢了。

首末笔排检法解决问题是很巧妙的。首末笔排检法光从字首字尾取笔，取字首的笔画用以“聚同形”，取字尾的笔画用以编同形字间的次序，它跳过字的中段来避免逐笔比较的麻烦。

我们假定取起首几笔已经不成问题，现在专就取末笔问题来谈谈。

在汉字中，那一笔最后写比起起笔来要固定些。但末笔的笔形也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笔形出现的次数又不一样。首末笔排检法依靠末笔来区分同部首字中间的次序，结果会把许多字集中到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一”“一”中去，这样同一部首字之间的先后次序还是很



难分列清楚。如果字数较多,那问题就更复杂。为了使过多的末笔相同的字分散,字的尾部就要取上两笔三笔……,但是从末尾逆推上去的取笔画法是有困难的,结果查检的人还得从头至尾数上一遍,才能确定出末后几笔来。这样做起来,也就和逐笔比较的麻烦相差无几了。

对初学文化的人来说,纯粹依照习惯建立起来的首末笔排检法也不太切合实际。汉字末笔的位置不是绝对固定的,大部分汉字的末尾几笔虽是集中在右下角,但也有不少的例外情况,象“寸、刃”的末笔就在左方,“戈、甫”的末笔在右上角,“女、册”的末笔在腰部,等等。要是有人不认识这些事而又要应用首末笔排检法来查对时,他就根本不知道从何处去取末笔。这样也就限制了首末笔排检法的应用。

### 笔顺排检法的优点

汉字体系极为复杂,因而拟制完美的新排检法有很多困难。各种不同类型的排检法的拟制者试从不同的方向去寻求解决,结果总是在顺利地解决了大部分汉字的排检问题之后,剩下一部分疑难字难于安排。

从现有各种类型的排检法看来,很难说那一种排检法已在各方面具有绝对的优点。情形往往是这样,某种排检法具有他种排检法所没有的优点,但也带有一些自身特有的缺点,而优点和缺点又往往是交叉地并存着的。比较排检法的优劣时,主要的条件之一是看某种排检法在顺利地解决了大部分字的安排之后,剩下难处理的疑难字是多是少?又解决这些疑难字的方法是否完善?

笔顺排检法也不例外。它也是既有短处又有长处的。它既具有前几节中所谈到的一些内在障碍,但也具有不少其他类型的排检法所没有的优点。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几项来:

笔顺排检法能在相当大的限度内继承旧部首法的优点。笔顺与笔画不是一回事,但解决笔顺问题有助于解决笔画问题。

(接36页)从而容易使人误解为译语的。如页193把“案板”一词注为“猪”。猪在蒙古语里是“合孩”(见《华夷译语》)女真语里是“兀黑彦”(见《女真译语》),都与“案板”的音读无任何联系。作者举的例子是《怒斩关平》二折曳刺白:“哥哥用心刷油的泼油也似光,案板也似肥……”。这个词是汉语里的词。同折正末唱:“我着这两只手洗渲了皮毛,他案板也似平铺着脊梁”(《孤本元明杂剧》本)。这是说马养肥了,马脊梁如同案板一样平。朱先生可能并没有细读全剧,只是看到肥便想到猪,从而作出了这样错误的注解。

如上所举,朱先生对元剧里的译语的注释,除元剧

笔顺不是绝对一致的,但会写汉字的人大体上总有个笔顺次序。应用笔顺排检法来查字,正象其他类型的排检法一样,除了一部分例外字,大部分字都容易解决。小孩子练习书写时就已基本掌握了笔顺的原则,所以熟悉笔顺排检法用不着象学其他排检法那样来从头学起。

部首排检法、笔画排检法等,都不能单靠一个方案来解决全部汉字的排检问题,它们总要和其他方案结合起来,这就必然地增加了方案的复杂性,增加了使用者的困难。笔顺排检法虽然也常和其他方案结合起来,但在原则上说,它本身可以成为单一的排检法。

把汉字分解成笔画并依笔顺一一排列,由于笔画形体的杂乱,所以前后次序常是看不清楚。为了使笔画前后排列整齐,可以把笔画和号码结合起来,把不同的笔画用不同的号码代替,利用整齐的数序来排顺汉字。笔顺法和号码法的结合比起其他类型的排检法和号码法的结合来更为自然。许多笔顺排检法的拟制者便常是这样做了的。

当然,要把笔顺排检法提升成为一个科学性很强的方案,还需要做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是:

(1)列出笔顺有分歧的例外字,全面地进行分析,简单扼要地概括出几条规则,把混乱的笔顺统一起来。

(2)合理地把所有的笔画分成几类,既不能为求简单而硬性地把形态悬殊的笔画归并在一起,又要照顾学习、记忆上的方便,不能分类过细;还要注意到解决因“同字异体”而引起的笔画分合问题。

(3)要解决笔画计算问题,以免比较笔画时发生困难。

(4)设法避免从头至尾逐笔比较的麻烦。

(5)进行笔顺排检法的研究时,要适当地重视前人已取得的成就。笔顺部首综合式能继承旧部首法的优点,能与汉字结构的一般原则相适应;首末笔排检法能精简逐笔比较的手续,避免典型的笔顺排检法所固有的麻烦,这些都是它们进步的地方,可以供笔顺排检法的研究者作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

中已有交代或前人已有的注解从而转录的以外,几乎很少可采。某些前人已有的正确注解的,经过转录时的更改,又产生了若干新的错误。应该指出:元剧里的译语的注释,不仅是元剧研究中一项必要的工作,也是汉语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环,而就它所涉及的范围来说,也和历史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而相当艰巨的工作。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就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语言资料,特别是非汉语方面的资料,也必须付出大量的劳动。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这里也是没有什么平坦大路可走的。

# 元代杂剧中的若干譯語

蔡 美 彪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朱居易的《元剧俗語方言例釋》不仅引起了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也引起了历史、語言工作者的極大的兴趣。遺憾的是,这書虽然彙集了一些資料,但作为主要內容的注釋却是很难使人滿意的。已經有人对本書漢語的注釋提出了簡單的但是恰当的批評。<sup>①</sup>我在这里不打算对本書进行全面的評論,只是想从書中提出一个問題来談一談,那就是:元代杂剧里的若干譯語的注釋問題。<sup>②</sup>

本書最先出現的譯語是蒙古語“兀剌赤”一詞,我們的討論也就从这里开始。

著者在兀剌赤后加上小字“兀赤”兩字,注云“駕馬或牧馬的人。一作兀赤,意同”(原書頁56)。案蒙古語中並沒有作“駕馬或牧馬人”解的“兀赤”一詞。著者所舉的例証是朱有燬《誠齋樂府》里的《桃源景》:“淨白:‘俺是蒙豁阿堵兀赤。’…末白:‘他說他是達達人放馬的。’”这个剧中本来已有明白的注脚,但作者沒有仔細考察,錯把“兀赤”兩字和“放馬的”相对,而对“蒙豁阿堵”等字又沒有再作任何注解。其实“阿堵兀赤”才是一个詞。法国伯希和(P. Pelliot)在1930年《通报》上曾指出此字源出“阿都溫”。《元朝秘史》中“阿都溫”(adu'un. 注音据《元朝秘史》伯希和音譯本,1949年巴黎版。下同)旁譯为“馬群”。阿都兀赤(adu'uči)即放牧馬群的人,《元朝秘史》旁譯为“放馬的”,与《桃源景》同。《华夷譯語》譯作“牧馬人”。这里“溫”所以变为“兀”,乃是由于联接“赤”字后失掉了語尾“-n”的缘故。至于“蒙豁”一詞,不用說,是“蒙古”的旧譯。著者既沒有把这个詞辨認清晰而又主观地把“阿堵兀赤”分成兩詞,这就不仅是注解本身的錯誤問題,而还容易造成其他的誤解。如所周知,“阿堵”恰巧也是古代漢語中的一个語辭。馬永卿《懶真子》卷3曾引王衍及顧長康的事例,并解釋說:“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稗海全書》本)。如果讀者誤信朱書的注解,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阿堵”一詞的历史,从而可能發生很大的誤會。

关于“兀剌赤”一詞,應該指出,徐嘉瑞注为“馬夫”是对的。<sup>③</sup>“兀剌”一詞,《元朝秘史》和《事林廣記》的蒙古譯語(即至元譯語)均譯作“鋪馬”(日本元祿復泰定本作“疋剌”,誤;此据元至元刊本)。元代碑刻中八思巴蒙古字“兀剌”一詞也有同样的漢譯。“兀剌赤”

《华夷譯語》譯作“馬夫”。《元朝秘史》写音“兀剌阿臣”,旁譯也是“馬夫”。馬夫与放牧馬群的人(阿堵兀赤)当然不同。作者对这两个詞都沒有作深入的了解,而又要和徐書有所区别,从而把兩者混而为一,造成了錯誤。

本書注釋的第二个蒙古語彙是“牙不約兒赤”。注云:“走。簡作牙不,一作啞步,又作耶步,意并同”(頁83)。这里的錯誤情形和前者大致相似。其实“牙不”才正是蒙古語的“走”(或譯为行)。这个詞屢見于《元朝秘史》,其他史籍中也可見到。权衡《庚申外史》記元末紅巾軍起義事称“(元軍)見紅軍气势甚盛,即揚鞭呼‘阿卜、阿卜’。”这和著者所举《陰山破虜》“我敌不过他也。逃命,啞步,啞步”用法極為相似。至于“約兒赤”一詞乃是蒙古語的“去”。此字在《元朝秘史》和《华夷譯語》中都可見到。杂剧中也有單用“約兒赤”的例子。如《桃源景》:“淨云:打刺苏兀該呵,約兒只有”(据《奢摩他室曲叢》本)。這句話的意思是:“酒(打刺苏)沒有(兀該)呵,去也”。著者虽用了桃源景劇,但沒有把这一例句举出来。如果按照著者的注解,把“牙不約兒赤”看成一詞,“牙不”当作簡化,單用約兒赤(只)就無法解釋了。不过,我們應該肯定,著者对这字的注解比《金元戏曲方言考》还是前进了一步。徐嘉瑞在《金元戏曲方言考》中引黑旋風劇:“跳上馬牙不約兒赤便走”,竟誤把“牙”字連上讀,而把“不約兒赤”写成一詞,注云:“打馬声”(原書頁7)。在新出增訂本中又加了一条旁証說:“今昆明語为皮兒赤,形容鞋声。如皮兒赤皮兒赤的走过来”(原書補遺頁3)。徐先生在注解兀剌赤一詞時曾参考了《华夷譯語》,但这里却沒有再对此書加以充分利用,而竟傳會于昆明方言。

“把都兒”一詞,本書注为“武士、兵士、將士”(頁128)。这个詞也是蒙古語的音譯,原意是“勇士”,可以用来作为“將士”的称号,元初蒙汉功臣多有此称;也可以用来称呼“武士”“兵士”。这个詞在元初本来是指

① 見1956年12月号《中国語文》,“書刊評介”第1条。

② 由于近来出版的其他某些元剧注釋書籍中也多少包罗了一些譯語,而所作的注釋也有一些地方还值得商量。因之,本文將以評論朱書为主,但关涉到其他書籍时,也將在此提出一并討論。

③ 見《金元戏曲方言考》,1956,商务版,頁4。



經過选拔的素軍，元代杂剧中也被用来泛称一般兵士。因此，著者的这一注解基本上是可以的，但可惜始終沒能把这个詞的真正意义搞清楚。

作者把“哈喇”注为“杀头”（原書頁167），把“鉄里温”注为“头”（原書頁334）。这两个詞，前人本已有过注釋。《拜月亭》傳奇第三出罗懋登音注云：“胡人謂首为鉄里温，謂杀为哈喇”。“鉄里温”为蒙古語“头”，这是沒有問題的。“哈喇”为“杀”仍然有些疑問。顧学頤注《汉宮秋》杂剧在注11里說：“哈喇——或作阿蘭。蒙古語：杀”。①这条注釋很細密。“阿蘭”一詞当是从《元朝秘史》中檢出的，alan 这一写法乃是此詞的現在时。同書中此詞的过去时写作阿剌罢(alaba)，未来时写作“阿剌忽中”(alaqu)。此詞在現代蒙古語里还保存着，是“杀”的意思。但这里的问题是，把“阿剌”譯做“哈喇”，語音上的困难还是無法解决。这是否只是由于汉人轉述时在語音上發生了錯誤，还是由于其他原因，顧先生沒有明白說明。我总觉得这还是一个疑難。不过，無論如何，朱居易把它注为“杀头”是不妥当的。“杀头”和“杀”当然不能完全等同。徐嘉瑞的解釋是：“杀。(拜)‘鉄里温都哈喇’(鉄里温蒙古語头也)此云杀头”(原書补遺頁11)。朱書很多是抄徐書的，这条虽然沒注明出处，但很可能也是录自徐書，但只是誤录了它的下半。

最使人看了吃惊的，是朱居易对“米罕”和“撒因”兩詞的注解。朱先生注“米罕”为“羊肉”（頁116），注“撒因”为“牛、牛肉”（頁293）。例句有《哭存孝》一折李存信白：“撒因答刺孙，見了搶着吃。”又《破天陣》一折顏洞宾白：“若不是你这等的撒因答刺孙米罕管待我呵，我怎肯替你擒拿楊六兒。”案“米罕”是蒙古語的“肉”字，並沒有專指羊肉的意思。“撒因”是蒙古語的“好”，与牛和牛肉更是毫不相干。第一例原意为“好酒見了搶着吃”，第二例为“若不是你这等的好酒肉管待我呵……”。朱先生在“撒因”和“答刺孙”后面都加上了頓号，誤当成三个詞。他的注釋可能是想到酒（答刺孙）应当和肉連用，便把酒字后面的一字注成羊肉，而把前面一字注成了牛肉。举例中又有：《射柳捶丸》三折阻字白：“不会騎撒因抹鄰。”此句原意当为“不会騎好馬”。如依原注，解为“騎牛肉馬”，显然不通。于是朱先生又把“撒因”一詞加了一个注：“牛”。其实这里“騎牛馬”也还是很难講通的。

下面我們再討論一下書中所注其他一些古代語言的譯語。了解这些譯語的含义要比蒙古語困難得多。但朱先生显然也沒有对此进行必要的鑽研。

我們仍从最先出現的注解說起。原書頁57在“兀兀秃秃”条下注有“兀秃”二字。注云：“不冷不热的。簡作秃秃，意同”。“兀兀秃秃”是漢語里的詞，注解的前

半大体是对的。但注解的后半就很成問題了。書中所举的例子是节录《酷寒亭》三折張保白。为了便于討論，我們把节录文前后的一些句子也一并引在这里。原剧張保上云：“……小人江西人氏。姓張名保。因为兵馬嚷乱，遭驅破虜来到回回馬合麻沙宜差衙里。往常时在侍長行为奴作婢。他家里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餅，秃秃茶食。我那里吃的？我江南吃的都是海鮮。曾有四句詩道來：（詩云）江南景致实堪夸，煎肉豆腐炒冬瓜。”②这里張保自叙在回回宜差家为奴时，不習慣于回回飲食，并以回回食物和江南食物对比。“水答餅”的作法在剧中有所交代。“秃秃茶食”沒有提。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卷1有回回食品秃秃麻食一种，原注云：“系手撒面”。这种食物以白面及羊肉作原料，“用好肉湯下炒，葱調和勻，下蒜酪香菜末”。秃秃茶食是否就是这种秃秃麻食，我們一时还难于确切判断。不过“秃秃茶食”必是元代回回的一种食品，是大致可以肯定的。这里的“秃秃”和“兀兀秃秃”并無任何关系。漢語的“兀兀秃秃”有时可簡作“兀秃”，但沒見到过簡作“秃秃”的例子。

同頁又有“土木八”一詞，注云“厨子”。著者只举了一个例子，即《十探子》2折：“回回官人白：經歷，拏那土木八來。經歷白：有，令人拏过那厨子來。”著者把“土木八”注为“厨子”，显然只是把这兩句加以簡單对比的結果。这种簡單对比的方法是很危險的。元剧中有时使用一种詈語。詈語与所罵詈的人称所指虽是一人，但不能就看作同義語。更使人怀疑的是，《十探子》下文回回官人白中用了許多譯語，但仍用漢語称“你这厨子”。元代回回一般通用的語言是波斯語。“厨子”一詞，在波斯語和元代蒙古語中都叫做“保兀兒赤”，当是来自古突厥語（参看《元朝秘史》及 Steingass: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頁153）。至于元剧中这个“土木八”，我怀疑它可能是波斯語的“dumba”，意为“羊的尾部”（参前引 Steingass 書頁535）。羊尾这个詞可以被用来作为罵人的詈語。《元朝秘史》卷6第181节：“桑昆說：他几曾說是皇帝父亲來，只說好杀人的老子；我行也几曾說是安答來，只說脫黑脫阿师翁續着回回羊尾子行有”（連筠蓀本誤作“續着羊回羊尾子”，李文田注同誤。此据《四部叢刊三編》本）。这里便是桑昆追述成吉思汗过去罵他們的話。元剧中回回官人罵人为“土木八”，《元朝秘史》也称“回回羊尾子”，这一詈語很可能是来自回回的。不过“土木八”一詞除《十探子》剧外，我还没有再在旁处見到过，我所提出的这一說解是否妥当，还希望历史語言学家予以指正。至

① 《元人杂剧选》，1956，作家出版社。

② 見臧懋循《元曲选》已集下。



于朱先生把它注为“厨子”恐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朱先生还注了一个契丹語名詞“曳刺”。这个詞，徐嘉瑞注做“兵、差”（原書頁13）。朱先生沒有注明这条是引自徐書的，但他的注釋：“軍士、衙差”（原書頁114）实际上只是文字的变动，沒有增加任何新的解釋。顧学頤的注釋是：“曳刺——或作曳落河、爷老。契丹語称走卒为曳刺”（原書頁302）。顧先生这条注釋我想是根据王国維的《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史》。“曳落河”是唐代史料里習見的写法。契丹語“走卒謂之曳刺”，出于《辽史》卷46“百官志”2。遺憾的是，元剧的注釋者們似乎忽略了王国維以后关于这个詞的研究成績。早在1938年，陈述就写过《曳落河考釋及其相关諸問題》一文<sup>①</sup>。陈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所論历史語言諸問題，有些地方还很值得商量。把曳落河比对于“梟罗箇”（此言“黃”）显系錯誤，比对于“迭刺”也还缺乏充分的根据。但是，陈先生在本文第1节和第8节里曾依据丰富的史料分析了这个詞的用法，并正确地指出“曳刺”的原意当是“健兒”。元剧的注者忽視了这个提示，是不應該的。陈先生所釋“健兒”之意出于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及《新唐書·回鶻傳》。《資治通鑑》卷216又解为“壯士”。陈先生以为除了这个意义外还有官名、禁衛、走卒、胥吏等意，并說明“究为公名而專名者，抑先專名而后公名，尙未敢遽而論定”。我以为契丹語里这个詞的用法当与蒙古語“把都兒”相似，本义是“健兒”或“壯士”，可以用作职官的称号，也可以泛用来指胥吏、走卒。辽国也曾有过拽刺軍的建置<sup>②</sup>。唐宋等朝的汉人于此未能分辨清楚，各自看到了一个方面，因而有些記載表面看来好像有所不同。如果我们依据个别記載，膠执于某一用法，那是不易求得通解的。至于說到元剧中習見的用法，顧先生据《辽史》注为走卒，一般还是可以的，只是不够完备。徐書及朱書似只就元剧数例加以推測，就未免粗疏了。

元代某些杂剧中有时用“阿馬(媽)”、“阿者”称呼父、母。徐嘉瑞对这两个詞曾作过正确的注解，并注明是女真語（原書頁20）。現代蒙古語口語中母亲的称谓虽然也可与“阿者”相对，但从元剧中常和阿馬同时使用来看，这一詞显然还是女真語。朱書轉录这两个注子时，可能也只是由于有意区别于徐書，而取消了女真語这一說明。这是不應該的。元剧并不是在所有場合都用女真語。取消了这一說明，就可能使人誤会为一般的通称，也可能使人誤会为汉语俗語。

朱居易在注解“赤瓦不刺”一詞时，注明了是引自徐書。徐書这个注解是錯的，朱書也跟着錯了。朱注云：“形容强辯多言”（原書頁137）。徐注云：“多言之意”（原書頁17）。在新出增訂本中，和誤解“牙不約兒赤”一样，又發生了这样的誤会：“昆明俗語，凡好說話

的叫做‘舍巴嘴’，舍巴即赤瓦不刺”（原書補遺頁7）。徐書和朱書的这个注解全出臆測，都不正确。这个詞和“多言”毫無关系。注者可能只是看到《丽春堂》有“則你那赤瓦不刺强嘴”便勉强猜測。顧学頤注《魔合罗》云：“赤瓦不刺海——或作窪勃辣駭。女真語：敲杀；就是打死的意思。这里是罵人該挨打的意思”（原書頁261）。顧先生这个注远胜于徐書及朱書，但也还有可商之处。顧注所引“窪勃辣駭”一詞当出于洪皓《松漠紀聞》卷上。原書注曰：“彼云敲杀也”。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亦有同样的解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3把这个詞写作“窪勃辣駭”。窪字显系窪字之誤，不可据。《女真譯語》，杀字为“瓦都刺”，打为“都古味”，都不作“瓦不刺”或“窪勃辣駭”。滿洲語中有“瓦不魯”（waburu）一詞，是一个感歎詞，用为罵人的詈語。原为“砍头之意”，罵詈則可有“該死的”或“該杀的”之意（參《清文彙書》卷12，日本陸軍省編《蒙古語大辭典》卷上頁62）。我怀疑元剧中的“瓦不刺”或“瓦不刺海”，可能就是这个詞。由于現在对古代女真語的結構还不能完全了解清楚，我們一时無法确切指出它的語尾变化情形。不过，元剧中这个詞的确都是用来罵人的。剩下來的冠在此詞上面的“赤”字，顧注沒有作出交代，便和“窪勃辣駭”相对，未免含混。这个“赤”字我以为当是女真語的“你”。“你”在滿蒙諸語中大都如此讀，区别只是語音上的一些差异。如果以上推測不誤，元剧中的“赤瓦不刺”或“赤瓦不刺海”，当解作“你該死的”或“你該杀的”。除前举一例外，朱書所举“虎头牌”：“才打到三十，赤瓦不刺海，你也忘官不威爪牙威”及《魔合罗》：“赤瓦不刺海翹孙头，尝我那明晃晃势劍銅錘”兩例也都可以这样解釋。后一例顧先生釋为“罵人該挨打”，很难惬意。解作“你該杀的翹孙头”，与下文当更吻合。

最后，我还想指出朱書关于元代譯意名詞的注解也有錯誤。誰都知道，元代所謂“羊羔利”或“羊羔兒息”是当时流行的高利貸。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云：“取借回鶻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sup>③</sup>元代史料中有关羊羔利的記載甚多，这是一个普通問題，不需多加引証。朱先生虽然从剧中看出这是高利貸，但把它解釋为“羊产羔时本利对收之一種”（原書頁116）。是的，它的起源可能是以羊羔为喻，但把通用的“羊羔利”都只理解为是“羊产羔”，那就成为笑談了。

此外，朱書还有时因对汉语俗語作了錯誤的注解，  
（轉33頁）

① 見《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

② 見《辽史》“百官志”。

③ 見苏天爵《元文类》卷57。

# 从附加成分看僮語的詞类

王 澤 宏

在詞形变化不太發達的語言里，詞类的划分以及划分的标准是意見最分歧的問題；比方，汉语詞类的划分，到現在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在汉藏語系語言里，有一些語言(比方僮語)詞形变化比較缺乏。在詞类的划分上也产生了同样的困难。但是我們不要因为这些困难就不積極地去想办法。

关于僮語詞类划分的标准，我的初步意見是，可以根据各类詞所固有的附加成分，划分出名詞、動詞、形容詞。現在分別討論如下：

## (一)前加成分

(1)表示飞禽走兽虫魚这类动物名称的詞，它們的前面，都要加上 $tu_1$ 。(当 $tu_1$ 前面沒有和数詞“二、三、四、五、…十、”后面沒有和数詞“一”相結合的时候，它不能起量詞(只)的作用。)在詞彙意义上在語法功能上都不起什么变化。

$tu_1 mo_1$ (黄牛)	$tu_1 va:i_1$ (水牛)
$tu_1 ma_1$ (狗)	$tu_1 ma_1$ (馬)
$tu_1 mi_1$ (熊)	$tu_1 pit_1$ (鴨子)
$tu_1 nuk_1$ (鳥)	$tu_1 pja_1$ (魚)
$tu_1 ru_1$ (蛇)	$tu_1 ku_1$ (大蝦)
$tu_1 ni:u_1$ (小蝦)	$tu_1 p'a_1$ (烏龜)
$tu_1 no:n_1$ (虫)	$tu_1 pu_1$ (蟹)
$tu_1 ka_1$ (烏鴉)	$tu_1 ma_1 mi_1$ (螳螂)
$tu_1 ru_1 lai_1$ (黃鱸魚)	$tu_1 kam_1 fu_1$ (蝴蝶)

(2)表示植物名称的詞，它們的前面同样要加上 $ko_1$ 。如果不加，会使人誤解。(当 $ko_1$ 的前面沒有和数詞“二、三、四、五…十、”后面沒有和数詞“一”相結合的时候，它也不能起量詞(棵)的作用。)加上去以后，在詞义上和在語法功能上也不起什么变化。凡是能与 $ko_1$ 結合的这些植物名称的詞，都是名詞。

$ko_1 ja_1$ (草)	$ko_1 mai_1$ (树)
$ko_1 ka_1$ (茅草)	$ko_1 ʔo:i_1$ (甘蔗)
$ko_1 k'au_1$ (稻子)	$ko_1 me:k_1$ (麦子)
$ko_1 p'jak_1$ (菜)	$ko_1 ku:i_1$ (芭蕉树)
$ko_1 mai_1 k'jau_1$ (楓树)	$ko_1 mai_1 k'jau_1$ (桐树)
$ko_1 mai_1 ɬo_1$ (松树)	$ko_1 mai_1 sa:m_1$ (杉树)
$ko_1 mai_1 pe:k_1$ (柏树)	$ko_1 ja_1 ho:m_1$ (香菜)

(二)表示动作或行为的詞的后面，可以加上一个音节(本身沒有詞彙意义)；这个音节的構成是由它前面动作或行为的詞的声母作为声母，加上元音 $u$ 作韵母再和高平調相結合而成的，(如果动作或行为这些

詞的声母是唇化和顎化的話，附加音节的声母要把唇化和顎化去掉)，加上去以后，在語法功能上起了一些变化，帶有“随便”的意思。

$pai_1 pu_1$	(随便去)	$fo:n_1 fu_1$	(随便养)
$vi_1 vu_1$	(随便梳)	$dap_1 du_1$	(随便熄)
$tso:t_1 tsu_1$	(随便燒)	$se:u_1 su_1$	(随便炒)
$lit_1 lu_1$	(随便拆)	$ɬa:u_1 ɬu_1$	(随便洗)
$hu_1 hu_1$	(随便給)	$ju_1 ju_1$	(随便生)
$p'ja:k_1 p'u_1$	(随便曬)	$pju:ŋ_1 pu_1$	(随便放)
$mjai_1 mu_1$	(随便換)	$kwa_1 ku_1$	(随便过)
$bjak_1 bu_1$	(随便罵)		

上面的这些例子，是動詞所固有的附加成分，它是很普遍的，我們可以利用这些附加成分，作为划分動詞的主要标准。

(三)表示事物性質及状态名称的形容詞的后面，可以加上附加成分，有加一个音节和加两个音节的，加上去以后，表示事物性質及状态程度加深。

(1)加一个音节的，互为双声。如：

$lo:m_1 lut_1$ (較松)	$man_1 me_1$ (較慢)
$no:i_1 ne_1$ (較少)	$ke_1 ka:k_1$ (較老)
$ɬi:ɬ a:t_1$ (較長)	$ɬu:ɬ ɬa:ŋ_1$ (較高)
$lu:ŋ_1 la:ŋ_1$ (較大)	$ten_1 te:t_1$ (較短)

(2)加兩個重叠音节的。如：

$dam_1 ja:m_1 ja:m_1$	(更黑)
$man_1 lun_1 lun_1$	(更圓)
$du:t_1 faŋ_1 faŋ_1$	(更热)
$mau_1 ɬa:ŋ_1 ɬa:ŋ_1$	(更新)
$nak_1 ku:t_1 ku:t_1$	(更重)
$k'e:ŋ_1 k'wa:ŋ_1 k'wa:ŋ_1$	(更硬)
$lo:i_1 pa:i_1 pa:i_1$	(更湿)
$lu:ŋ_1 sa:ŋ_1 sa:ŋ_1$	(更涼)
$ɬam_1 ɬa:p_1 ɬa:p_1$	(更髒)
$he:u_1 jik_1 jik_1$	(更瘦)

上面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名詞、動詞、形容詞所固有的附加成分，名詞(指飞禽走兽虫魚、植物名称)前面都要加“ $tu_1$ ”或“ $ko_1$ ”，動詞后面可以加原来動詞的声母作为附加音节的声母，再加上“ $u$ ”作韵母所構成的音节(声調是高平)。形容詞的后面，虽然它沒有像名詞、動詞的附加成分那样單純，那样固定，但它到底与名詞、動詞的附加成分不同，另外有它的附加成分。

总之，我們可以根据这些附加成分，作为划分詞类的主要标准，为僮語划分詞类开辟一条道路。



# 国际上关于科学技术术语的工作

H. K. 苏 賀 夫

大家知道,在各个科学技术部門的發展过程中,科学和技术的术语有着很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术语的所謂“自然”發展不能永远保証获得确切的、簡煉的和合适的术语,尤其重要的是不能保証获得术语的严整系統,因此有必要进行專門的术语工作。根据科学或者技术領域的不同,以及任务的不同,术语工作可以有不同的內容。一种最簡單的术语工作就是給尚無术语的已知概念創造术语,例如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就进行着这种工作。有的地方是根据現有知識水平对現有术语进行审查和整理并为新形成的概念創造新的术语,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就做这样的工作。①研究各种語言的各个科学技术部門的各种术语工作,不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實踐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各国的專家們在国际交往中,除去因不同的語言在交际中引起的一般困难之外,还会發生特殊的困难。大家知道,同一門技术的术语在各个国家里往往是很混亂的,因此在翻譯的时候要表达术语的确切意思,就显得很困难。每一个專家不仅應該知道两种語言的术语,而且还得知道在两个国家里形成了的概念系統。这样一来,每个專家为了国际的交往就似乎應該成为本門科学技术的職業翻譯家。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这种不便也就会愈来愈多。

在專家們的国际交往中跟术语障碍作斗争,就是国际术语工作的目的。跟这种障碍作斗争的企圖,很早就已經有了;曾經按照下列一些主要方向进行过:采用一种統一的語言——一种現存的活的語言或人造的語言(世界語\*, Occidental等);或在整理各国都能接受的概念系統的同时,統一各国的术语。这类工作(主要是自然科学領域內)的历史,在20世紀30年代之初Э.德烈任和E.維尤斯特尔的著作中有所闡述。②

技术領域內的国际术语工作,是以20世紀国际电工委员会拟定的整理数种語言电工术语的大綱开始的。③后来,各种国际性的技术协会也在其他技术部門中逐漸推广类似的工作。1933年,苏联建議成立一个关于国际术语工作的特殊中心,附設在当时的国际标准化联合会(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Association,简称ISA)之下。这一建議获得了許多国家的

支持,因此在1936年成立了一个專門的委员会——第37国际标准化联合会(ISA-37)。

在30年代,世界語被推广,并且有人想把它用到各个技术部門的專家的国际交往中去。④第37国际标准化联合会(ISA-37)初期的基本工作方向是創造各国和各种語言統一的、人为的国际术语。由于在这一目的上使用世界語有些实际困难,Э.德烈任就建議制訂所謂“国际术语密碼”。⑤大家知道,在各种不同的語言中,某些概念和某类概念人为地創造了一些詞或詞的要素,如:ампер(安培),микрон(微米),кило(千),милли(千分之一厘),等等。这类詞大部分已在国际上通行,并成为許多語言共同的詞。德烈任的建議中还有一項內容,就是要为已有的科学技术概念創造一种可以作为国际詞来通用的詞;这种詞應該具有在国际上通用的讀音和写法,應該可能更簡便地使用,應該有固定的內容。

建立术语密碼时要选用:(1)詞根和詞綴的成分,主要是希臘拉丁語中已在国际上通用的成分(如:аэро-[气], гидро-[水], фото-[光], транс-[超], а-[無,非], -изм, [主义], -ист[主义者]等等);(2)在一群語言或一种語言中通用的成分;以及(3)国际語系統中的成分。同时必須解决一系列其他問題,如关于字母表的問題。曾經設想,这样制訂出来的术语密碼(即

① 見 А. М. Терпигорев 的《关于技术术语的整理》一文,《語言学問題》1953年第一期。

② 見 Э. К. Дрезен 的《科学技术术语和表示法以及它們的标准化》,1956年莫斯科第三版;E. Вюстер 的《技术中的語言在国际上的标准化》(譯自德文),1935年列宁格勒-莫斯科。

③ 見上述 E. Вюстер 的一書。

④ 見 Э. Дрезен 的《世界共同語的研究》,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际語的理論基础和沿革》,1932年莫斯科第三版;E. Drezén, «Pri problemo de internaciigo de Science-teknika terminaro [关于科学技术术语国际化問題]» 1935年莫斯科-阿姆斯特丹。

⑤ Э. Дрезен 的《科学技术术语的国际化》,193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 Esperanto在国内通称为世界語,这里沿用——譯者。



国际上通用的术语彙集，最初可以在使用本国术语的同时，用作一种国际交往的工具（主要在来往文件中），正如同某些自然科学中的双重命名制（拉丁语的和本国的）一样；这种术语密码同时也可以作为制订本国术语的范例。最后这种密码应该逐渐成为国际上统一的科学技术术语，并且代替本国的术语。

关于创造国际术语密码的建议，只是以运用世界语的经验为根据，因为它不把科学技术的术语词彙看作是某一民族语言词彙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德烈任的建议用最一般的形式加以说明以后，被提交到各国的标准化机构中去讨论。这一建议初步获得了支持。但是当1936年E. 维尤斯特尔<sup>①</sup>企图具体实现这项任务的时候，就证明了它是不现实的，因而关于国际术语密码的意图也就打消了。

1933年，在柏林召开的ISA-37第三届会议上，决定加强确定现有语言中模范术语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如果每一个概念都给出了确切的定义，并在任何语言中都采用同一个术语来表示这个概念，那么国际交往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便利起来。因此就认为各国专家首先要用适当的力量在某些技术部门进行确定概念系统的工作，然后再选择和确定对概念来说是单义的、最合适的术语。采用了三种语言作为术语的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并决定用这三种语言给概念下定义或给概念做叙述。其他语言的术语就应该完全以这样制订出来的术语系统为根据（在意义方面，尽可能在读音和写法方面）。

ISA-37的委员会曾经试图拟定进行国际术语工作的规章<sup>②</sup>，并确定应该研究的问题的范围，其中有：（1）各种语言中术语写法的统一；（2）在各种语言中术语的写法和读音之间的相互关系；（3）术语的字面意义（所谓“内部形式”）的类型；（4）术语的字面意义及其所表达的概念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5）术语意义的性质；（6）语言发展的途径以及对语言的控制；（7）术语方面的词典工作。委员会也曾把国际的十进分类法作为术语材料标准化的辅助工具推荐了出来。在ISA-37的这一工作阶段中，苏联没有参加。1939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ISA-37就停止了活动。

战争结束后立即成立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简称ISO）。苏联是它的组织者之一。俄语跟英语、法语一块儿被承认为ISO的正式语言。ISO是由从事各技术部门的国际标准化工作的许多技术委员会（TK）组成。一些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中，主要障碍就是各国的术语不成熟，互相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由于这一原因，许多部门就开始整理本门的各国术语并加以统一（例如：关于混凝土、钢筋混凝土、锯子、纸张、机轮联动装置等

方面的术语）。

技术委员会的任务中，一般都包括选择概念以及相当的术语并下定义。术语采用该委员会中作为工作语言的那些语言，一般都是用法语和英语；有时根据参加国的选择，还同时列举了其他语言的术语（不带定义）。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了上面提到的一本名叫《国际电工词典》<sup>③</sup>的著作，就可以算作进行多种语言工作的这类最好的例子。该词典所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用它们下定义和推荐术语。此外，对于每一个概念还给了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瑞典语、波兰语以及世界语的术语（没有定义）。1951年在准备出这本词典的第二版时，已决定术语不利用世界语。

随着国际术语工作的发展，有些技术部门就感到有必要使工作协调起来并总结经验。1952年，按照战前ISA-37的例子，在ISO中成立了关于国际术语工作的技术委员会ISO-TK-37。根据ISO的章程，这个委员会由所谓积极会员国和消极会员国组成；消极会员国虽然也收到所有印发的文件，但一般只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

最初，ISO-TK-37的积极会员有奥地利\*、英国\*、德国\*、荷兰\*、印度\*、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法国\*、瑞典\*；而观察会员有比利时\*、匈牙利、丹麦\*、以色列、加拿大、新西兰、苏联、芬兰\*、智利、瑞士\*、南斯拉夫。委员会的秘书由奥地利担任。

1952年10月，ISO-TK-37在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一届会议。上面用星号（\*）标明的国家是这一届会议的参加者。讨论的对象是关于工作范围、工作目的和任务等各项问题。会上决定ISO-TK-37的工作目的是研究和总结术语工作（各国的术语工作和国际术语工作）的经验，在科学技术各部门中制订各国和国际工作共同的、统一的原则和统一的方法。根据这些目的，这个委员会就具有“术语、原则和协调”委员会的称号。这样一来，ISO-TK-37就成为各个技术部门的国际组织在术语工作方面的一个联系中枢。

根据规定的任务，ISO-TK-37拟定了它的初步工作纲领：（1）术语。关于技术术语和概念的原则。（2）国际术语。关于国际术语的原则。（3）一种语言的术

① 见 E. Wüster 的《Die Hauptfragen bezüglich des Code-Aufbaues》《ISA 37—Terminologie. Bericht über die Sitzungen vom 31.8 bis 2.9 1936 in Budapest》（石印版）。

② 见《Règles générales de terminologie [Comité ISA 37—Terminologie]》1939年3月（玻璃版）。

③ 见《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vocabulary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1938，伦敦。现在这本词典已经修改、补充，准备出第二版。

語詞典。編制一種語言的某個部門的術語彙編的原則。(4)多種語言的術語詞典。編制多種語言的某個部門的術語彙編的原則。(5)語言的假定符號。用在各個部門的術語彙編、詞典和書目等等里頭的國際上的語言符號。(6)其他符號。用在各個部門的術語彙編中的國際上的其他符號。這個綱領正確地規定了工作的基本方向,但還應該在以後加以修訂。

為了了解術語工作進行的實際情況,ISO-TK-37曾委託秘書處用分發調查表的辦法搜集各國組織(ISO-TK-37的會員)和國際組織從事術語工作的材料。打算在收回調查表以後在維也納召開ISO-TK-37的第二屆會議。

調查表是在1952年10月24日發出的。調查表中提出了需要了解的問題:術語工作在什麼地方進行和怎樣進行,在哪些科學技術部門進行,進行術語工作的原則怎樣,以及對國際術語工作的關懷程度等。

從收回來的答案中証實了在ISO-TK-37的所有會員國里以及許多其他國家里都在進行着本族語言的術語工作。下面是各國出版的關於術語標準(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тандарты)的數字材料,它可以給我們一個關於這一工作的規模的概念。

德國.....312	智利.....20
法國.....238	巴西.....18
荷蘭.....145	以色列.....17
英國.....134	匈牙利.....15
羅馬尼亞.....81	印度.....15
瑞典.....67	墨西哥.....15
美國.....66	烏拉圭.....14
蘇聯.....59	捷克斯洛伐克.....11
意大利.....46	南斯拉夫.....10
瑞士.....43	葡萄牙.....8
比利時.....39	澳大利亞.....8
西班牙.....35	阿根廷.....3
芬蘭.....34	冰島.....2
波蘭.....25	日本.....2
奧地利.....25	南非聯邦.....2
丹麥.....23	加拿大.....1①
挪威.....21	

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蘇聯在技術領域內的術語工作規模還落後於英國、德國、法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所達到的水平。②調查表上的答案也表明了約有20個國際組織在進行各國的各技術部門的術語協調工作。

為了統計各國的術語工作的所有形式,在調查表中同時詢問到各國編纂詞典(包括術語詞彙的)工作的所有形式。③各國的答案表明了專門術語方面的詞典工作是各式各樣的。有些國家刊印《標準詞典》,有些國家刊印《術語標準》,有些國家刊印《術語規範》;或者

是單獨出版,或者是作為工業標準的一部分刊出。在不久以前出版的書目中就收集了1500多種這種作品的材料。④

術語工作主要由各國的標準化機構進行。此外,有一些國家(例如: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荷蘭)還有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科學組織。答案也証實了在術語工作中廣泛採用國際的十進分類法。

對於編纂“詞典”的原則這一問題的回答,也很有趣。各國運用着各種各樣排列術語的方法:有按字母表順序的,有按系統的(邏輯的),也有綜合性的。哪一種方法對具體工作更適合,就偏重哪一種。至於選擇術語和創造術語的原則,所有國家的組織都指出他們是按目的來選擇術語的,但選擇的標準,並不是所有國家的組織都指出了的。大部分組織承認要有新術語,只要對新術語有真正的需要,並且新術語符合語言的精神,但制訂出創造新術語的規則的只有一個國家(荷蘭)的組織。⑤

關於術語工作原則的答案,說明了在多數國家的術語組織中總結經驗的工作還遠遠落後於實際工作的規模。多數國家還只是打算從理論上總結術語方面的經驗,因此對總結經驗工作現在尚難以給予一個客觀的評價。答案中反映了一致的願望:需要擴大總結各國經驗的國際研究工作,還反映了許多具體的建設性的建議。

① E. Wüster 的《Technische Sprachnormung. Aufgaben und Stand》.《Sprachforum》,1955年,第一分冊。

② 應該聲明,有些國家的材料,特別是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材料,是不夠確切的。

③ 在調查表中把所有出版的東西都叫做“詞典”,這不能認為是正確的。應該區分出:一種是編制推薦性術語的彙編的術語工作,一種是實實在在的詞典工作。

④ 見 Wüster《Bibliography of monolingu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glossaries》,vol. I—National standards,1955年巴黎版。必須指出,這一非常有益的作品對蘇聯出版的東西反映得不完全。

⑤ 見 H. E. Buiskool《Over het ontstaan en de vorming van nieuwe woorden[論新詞構成和創造]》二版,《Mededeeling [Centrale taalcommissie voor de techniek]》[技術語言中央委員會報告] № 3)1942年海牙版。在這本書里描述了現代荷蘭語補充術語詞彙的主要方法,而特別有益的是列舉了構成新術語的最重要的構詞型式:派生詞的、複合詞的和詞組的。雖然在這本書里還沒有說明某些技術部門的術語特征,但它有無可反駁的優點,這就是它用了一種為專業技術工作者容易理解的形式鮮明地表示出怎樣可以創造新術語。更出色的是這本小冊子是語言學家寫的,而不是術語工作者寫的。



研究各国术语工作的经验，不仅对总结国际经验有益处，而且对改善各国的工作来说，也有益处。国际术语工作的顺利发展以及某个国家参加国际术语工作的程度，就要取决于各国国内术语工作的成绩。

分析了调查表上的答案之后，就有可能使 ISO-TK-37 的(初步活动)纲领精确起来，同时就有可能拟定完成这一纲领的步骤。1954 年 10 月 13—16 日在维也纳召开了 ISO-TK-37 第二届会议，讨论了在调查表中提出的上述问题。出席第二届会议的有：积极会员国——奥地利、英国、德国、印度、意大利、苏联①、美国，观察员有南斯拉夫、七个国际技术部门的组织以及联合国经济科学文化组织 (UNESCO) (关于这点，请见下面)下的关于精密科学 (точные науки) 和自然科学的文件和术语问题的国际咨询委员会。

ISO-TK-37 的秘书处建议同时研究初步纲领中各项条目，因此纲领中的各项条目也都包括在会议的议程之内。会议从讨论一个基本问题开始：关于制订术语的原则。经过长期的争论（在争论中表现出各个国家的代表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最后确定下面一些原则：(1) 每一个术语在每一种运用范围内应该只表示一个它所限定的概念，同样，每一个概念应该只有一个限定它的术语；(2) 术语应该尽可能确切表示它所限定的概念；(3) 术语应该简短。

苏联在回答 ISO-TK-37 的调查表的时候就曾申述了关于这些原则的建议。为了进一步讨论制订术语的原则，会上决定需要成立第一专门工作小组，由苏联、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代表组成。德国担负小组的领导工作。

讨论一种语言和多种语言的术语彙编的结构的时候，在会议的参加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讨论了排列术语的顺序问题。除法国以外，所有代表都认为术语应该按系统的(逻辑的)顺序排列，并要附有字母表索引以备查考。这一决议完全符合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的观点。

在讨论多种语言的术语彙编的类型这一问题时，产生了很多的困难。意大利代表建议把多种语言的术语彙编按所包括材料的宽度和说明术语意义的方法等特征区分开来：

- |            |                  |
|------------|------------------|
| 一个技术部门的术语： | (1) 不带定义和插图的术语彙集 |
|            | (2) 带简单插图的术语彙集   |
|            | (3) 带定义的术语彙集     |

各个技术部门的术语：(4) 带定义的术语彙集

这种区分法遭到了多数代表根据各种不同理由的反对，因此决定把它延期到各国组织对这一问题研究

过后再来讨论。

在会议上还讨论了编纂术语词典的程序问题以及 ISO-TK-37 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根据初步工作纲领中关于审查建议的条目，通过了成立第二工作小组来审查建议的决议；第二小组的成员有英国(召集者)、美国、法国和奥地利的代表。由于时间不够，国际上使用的假定符号和其他符号的问题(ISO-TK-37 的工作纲领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就没有讨论。

ISO-TK-37 的第二届会议指明，为了要完成所通过的工作纲领，所有参加总结已有术语工作经验的成员还需加倍努力。

苏联学者参加这届会议是对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的工作一次很严肃的检查。苏联对各项议程所发表的观点获得好评，证明了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工作的总方向是正确的，并且表明了苏联的制订术语工作的原则，很好地从国外实践中得到了论证和证实。

两个工作小组基本上是用通信的方法进行工作的，只在下一届 ISO-TK-37 会议的前夕再来开会。在 ISO-TK-37 的第二届会议上第一工作小组推荐了德国的一个标准草案供讨论：德国工业规范 DIN 2330—《概念的形成。一般的原理》。② 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对这个材料研究后觉得它有重大的缺点，因此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认为利用“DIN 2330”作为讨论的材料是不合适的；并决定草拟反映苏联对术语工作基本原则的观点的文件。这个文件的题名是《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关于概念、定义和术语的基本原理》③，寄给 ISO-TK-37 的秘书处转交第一工作小组。秘书处对《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的基本原理》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认为把它分发给 ISO-TK-37 的全体会员研究是有益处的。为了达成协议，奥地利在德国的“DIN 2330”和苏联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又写了一个只谈到其中一个问题的文件：术语定义的原则。

这三个文件在第一工作小组的会议上都讨论了。德国代表同意苏联文件中对 DIN 2330 的批评，并赞成接受奥地利的草案作为以后工作的基础。英国和荷兰对苏联的整个草案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认为苏联草案比奥地利和德国的草案都要好。苏联代表鉴于奥

① 1954 年春天通过关于苏联加入 ISO-TK-37 为积极会员的决议，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以标准委员会 (Комитет стандартов) 的名义担任了这方面的工作。

② 见《DIN 2330—Begriffe und Benennungen. Allgemeine Grundsätze》，1954 年。

③ 在 A. M. Терпигорев 的上述一文中曾简要地说明作为这个文件基础的一些原则。



地利的草案已考虑到苏联《原理》中的基本论点，并为了加速工作进程，同意接受奥地利草案作为编写定义工作中的基础。这样，苏联关于术语工作原则的草案就得到了公認。

在第二工作小组中英国代表卡朴(Capp)教授也写了一个关于准备术语彙集的方法的材料，其中并总结了国际电工委员会的经验。这个材料经过讨论后，还需要大大加工。

ISO-TK-37 的秘书处筹备下一届会议期间准备了许多材料，以便讨论工作纲领中的各项条目。1955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 ISO-TK-37 的第三届会议。参加的成员与上届会议略有不同，美国、印度和南斯拉夫没有出席，人民民主国家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首次参加。ISO 的秘书长圣-列泽尔(Saint Ledger)在欢迎各国代表时着重说明了 ISO-TK-37 面临的重大任务，ISO 的 26 个会员国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对 ISO-TK-37 的活动都表示极大的关怀。议程规定继续讨论上届会议的工作和工作小组的工作。会议上听取了两个工作小组的报告并通过了它们继续活动的决议。

从 ISO-TK-37 以前的工作过程中可以看出，会员中间在了解如“术语”“特征”“概念”等基本概念上，还缺乏必要的统一。这对于顺利解决 ISO-TK-37 面临的任務，自然是有妨碍的。因此奥地利代表建议在这方面确定一个统一而确切的术语彙集，并提出了自己用英语和法语给某些基本术语下定义的方案。会上决定把这个材料分发到各国的组织中去讨论；这件事委托给第一工作小组去做。

关于多种语言的术语“词典”的类型问题的讨论，表现在长时间地争论有关词典著作的种类上。词典著作的分类是 E. 维尤斯特尔博士(奥地利)以下面的图解形式提出的。<sup>①</sup>

	按系統排列	按字母表排列
一种語言的詞典	不帶定义	不帶定义
	帶插圖	帶插圖
	帶定义	帶定义
	帶定义和插圖	帶定义和插圖
多种語言的詞典	不帶定义	不帶定义
	帶插圖	帶插圖
	帶定义	帶定义
	帶定义和插圖	帶定义和插圖

会上根据苏联代表的意見指出，术语工作虽然和

词典工作有紧密的联系，但是术语工作的成果畢竟只是《推荐性术语的彙編》(vocabulary, vocabulaire)，与词典(dictionary dictionnaire)不同，词典是词典工作的成果。会上决定继续进一步研究編制术语彙編的原则。

在讨论术语彙編中的假定符号这一问题时，出乎意外地在意見中有很大的分歧。为了研究大批的建议，就成立了第三工作小组，第三工作小组中有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代表。因为 ISO-TK-37 的第三届会议和上届会议一样，来不及详细讨论议程上的所有问题，所以决定工作的基本形式是由各个国家的组织先准备自己的意見，然后在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中讨论。ISO-TK-37 的第三届会议指明了在最近几年里各个国家不仅开展了实际的术语工作，而且产生了新的科学的方向——科学技术术语的理论。根据全体代表的共同見解，《苏联科学院技术术语委员会关于概念、定义和术语的基本原理》这一文件所获得的好评，使得苏联成为发展这一科学方向的主导国家之一。

必須指出，在战后的年代里，其他知識部門也逐漸注意了国际术语工作。一些联系自然科学各个部門專家的国际組織，也在进行整理所用术语和促使所用术语协调的工作。1950 年在联合国 UNESCO 的第五届代表大会上，确定該組織在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基本的任务是要使科学技术的术语标准化和出版各个科学技术部門的多种語言的词典。根据这一任务，在 1952 年成立了以霍尔姆斯特罗姆博士为首的关于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文件和术语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并开始工作。从 1954 年起，該委员会每月出版一次情报性的公报：《Documentation et terminologie des sciences exactes et naturelles》。这个委员会完成了許多有意义的研究<sup>②</sup>，并且出版了关于各种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两种語言和多种語言的词典的书目。<sup>③</sup>

1954 年，苏联代表願意参加咨询委员会的活动这一件事，使得該委员会非常兴奋。这一工作由苏联科  
(轉 8 頁)

① 一种語言和多种語言的推荐性术语的彙編，用双框框出。

② 見 J. E. Holmstrom 的《The language problem of sciences》，《Research》，vol. 7, 1954 年 5 月；《Report 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ng and related problems》，UNESCO, 1953 年(石印版)；O. Thoridnet 的《The semantic abstracting of documents and the use of the card file for terminological purposes》(石印版)，UNESCO, 1954 年巴黎。

③ 見《Bibliography of interlingu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ictionaries [UNESCO]》3 版，1953 年，巴黎。

# 语文短评

106 这个青年的社主任是誰？魯艺的同学大概記得，有一次，毛主席給你們作报告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娃娃)，他曾光着脚爬在毛主席旁边的记录桌上…(人民日报 1956 年 1 月 12 日)

括号放在“时候”后面，容易誤解为毛主席在那时是个很小的娃娃应改为“…有一次，毛主席給你們作报告，有一个很小的娃娃，光着脚爬在毛主席旁边的记录桌上，那就是他。…”(潘永)

107 克罗齐認為“美是純美与純丑的統一”乃是毫無意义的說法。(人民日报 1956 年 7 月 9 日)

容易誤会成从“美是…”到句末都是“認為”的宾語，应该在“統一”之后点断，把“乃是”改做“这是”。(潘永)

108 关于客观真理的討論目前进行得十分熱鬧，…(光明日报 1956 年 6 月 18 日)

用“熱鬧”形容“討論”，多多少少有不严肃的含义。这里討論的是客观真理，用“熱鬧”不如用“热烈”(海寬、偉森、河水)

109 語文教学在中心小学的各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門帶有綜合性和基础性的学科。(光明日报 1956 年 7 月 23 日 1 版)

“語文教学”是教学法之一，不是学科，应该把“教学”兩字去掉。(柯英)

110 这样極可珍貴的作品，虽只剩了很不完整的一段，但是很可惜的。(光明日报 1956 年 9 月 16 日)

“虽然”和“但是”配合使用，表示兩件事情有点背道而馳。这里是一意相承，不能用“虽”和“但”，应删，留“是”字。(餘培英)

111 九月一日和三日，为了庆祝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首都十个民間職業剧团和国营剧团、一百另三个演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联合演出京剧傳統节目“奴才庙”…(中国青年报 1956 年 9 月 4 日 3 版)

(一)“庆祝”的不应该是“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这个团体，应该是“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的成立”这个事件。(二)

“十个民間職業剧团和国营剧团”和“一百另三个演員”之間不是并列的关系，应该把頓号改做“的”字。(溫端政)

112 帝国主义在匈牙利制造的反革命复辟陰謀，已經从头到脚地輸了。(中国青年报 1956 年 11 月 6 日 1 版)

“陰謀”不能分輸贏。“从头到脚”不如“徹底”来得現成。可改为“已經被徹底粉碎了。”(潘佳)

113 一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滋味，酸甜苦辣，我們是样样都尝过的。(同上)

(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滋味”，是帝国主义尝到侵略別国的滋味，还是被侵略者？很含糊。(二)若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滋味，就不会有“甜”的。可改为“一百年来，我們已經尝够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滋味。”(程月)

114 必須要把技术訓練和增長力量做适宜的配合鍛煉，才能使举重成績进一步迅速向前推进。(解放日报 1956 年 3 月 1 日)

(一)“技术訓練”和“增長力量”不是同一結構，并列在一起，别扭。(二)“做…配合鍛煉”意思不明白。可改为：“必須把提高技术的鍛煉和增長力量的鍛煉結合起来…”(乔維森)

115 英雄的保加利亚人民在解放以后，立即以高度的劳动热情投入了改变旧社会遺留下来的落后經濟。(黑龙江日报 1956 年 9 月 9 日)

“投入”的宾語是什么？不清楚。应在“經濟”后加上“的斗争”。(王遷)

116 班集体的制度已經沒有实行了，但是在教师和学生們中間对通过班集体向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这一問題上还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河南日报 1956 年 10 月 16 日 3 版)

(一)“已經实行”就是“已經实行”，“沒有实行”就是“沒有实行”，沒有“已經沒有实行”的說法。从前实行过但是現在不实行了，只能說“已經不再实行”。(二)“对…上”講不通，应去掉“上”字。“在…中間”这一詞組位置也不合适。全句应改为“…但是对通过…問題在教师…中間还存在…”(刘之一)

117 剛从西班牙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專門委员会的會議的我国代表团团长陈宗器对新华社記者說…(文汇报 1956 年 10 月 27 日 2 版)

句子長而意思不明。如果陈宗器是回国后对記者說話，那末“西班牙”后面应加上“回国的”。改法：(一)“出席了…會議，剛从…回来的我国…”；(二)把“从”改作“在”。(顧逸)

119 我並沒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文藝學習 1956 年 5 月 8 頁)

“修養”習慣上只說深淺，不說多少。可把“多少”改為“多深的”，去掉后面的“的”字。(海寬、偉森、河水)

119 果戈里的故鄉在烏克蘭的一個村子里，…(文藝學習 1956 年第 7 期 50 頁)

“故鄉在…村子里”不通。應改為“果戈里的故鄉，是烏克蘭的一個小村子”，或是改“烏克蘭的××村，是…”。(遼章)

120 在萊佛士這種政策的推動下，因此各地中國帆船都逐漸被吸引集中到新加坡進行貿易，於是僅在 1823 年新加坡的貿易地位已經超越過雅加達，進而成為當時亞歐之間貨物集散的最大中心。(歷史研究 1956 年 8 月 15 頁)

(一)“因此”“於是”用不着，應刪；(二)“僅在 1823 年…”和“進而成為”搭配不攏，“僅在”應改為“到”；(三)“地位”一般只說升降、加強、削弱、獲得、消失…等，但不說“成為中心”。全句應改為“…到 1823 年，新加坡就貿易地位言已經超過雅加達，成為當時亞歐之間貨物集散的最大中心。”(竹蕪)

121 早晨，當陽光尚未升起時，你如果站在撫順城郊的小山上，這一剎那——由靜止變為喧囂的時刻中，是多麼美妙的早晨！(文學月刊 1956 年 9 月 9 日)

“陽光”不能用“升起”，應改為“太陽…升起”；(二)“靜止”與“喧囂”意義上不相對，應把“靜止”改為“寧靜”；(三)“如果”有點無着落，一般總是“如果…那麼就會…”相呼應使用的；(四)“這一剎那”不能包括整個“美妙的早晨”應刪。為了表達得更確切，句末可加“啊”字。全句可改為“早晨，當太陽尚未升起時，如果站在撫順城郊的小山上，向城內一望，就會覺得這由寧靜變為喧囂的一刻，是多麼美妙啊！”(王涯)

122 《我的第一個師父》是記敘一個作者在童年時曾拜之為師的和尚的事跡。(語文教學 1956 年 10 月 13 頁)

數量詞可以離開被它修飾的名詞，但有一個條件必須遵守：在它和中心詞之間不能隔上另一個可以被它修飾的名詞。這裡的“一個”是“和尚”的定語，現在放在“作者”的前面，就可能誤會為“一個作者”。應把“一個”移到“和尚”的前面。(劉涇逸)

123 電車飛馳着，斯大林大街、勝利公園、人民電影院…，又在我們跟前消失，進入郊區了。(萌芽 1956 年 10 月 1 日 7 期 11 頁)

照文句意思看，進入郊區是“電車”。但照字面看，好像是“斯大林大街…”進入郊區似的。應在“進入”前加“我們”。(齊雲)

124 柏油馬路又直又寬暢，中間兩條電車軌道，兩旁是汽車跑道和人行道，馬路兩旁栽種着綠葉成蔭的行道樹。(萌芽 1956 年 10 月 1 日 7 期 11 頁)

(一)主語可以因承上而省略，但必須使人一看就明白。這裡的“兩旁”按句面看是馬路兩旁，但這樣理解又和下一句的“馬路兩旁”重復，其實這“兩旁”的主語的“軌道”，在這裡是不能省略的。(二)“汽車跑道和人行道”合在一起，則下句的行道樹好像在人行道之外了，而行道樹不會在人行道之外的，應刪去“和人行道”，把“馬路兩旁”改為“馬路和人行道中間”。(三)馬路寬了當然會“暢”的，“暢”字和“寬”一起修飾“馬路”不必要，可刪。(齊雲)

125 我想從《中國文學史稿》發表以來，像我這樣的從它裡面曾獲得了許多教益的青年人，當然不僅青年人，會大有人在，…(文史哲 1956 年第 10 期 24 頁)

前面已經用了“青年人”，後面再用“大有人在”就重復了。可以把“會大有人在”，改做“是很多的”。(二)“當然也不僅青年人”是補足說明前句的，應該加上括弧。(福熙)

126 印度方案的方針是：嚴格尊重埃及的主權，由埃及管理運河問題由使用運河國際利益集團同埃及蘇彝士運河公司建立適當的聯繫。(中國青年 1956 年 17 期 4 頁)

(一)“使用運河國際利益集團”意義不明確。(二)在一句中連用兩個“由”，使句子意義含糊。全句可改為“…由埃及管理運河，并由使用運河的国家同埃及…”。(劉汝燮)

127 這又怎能不使這位焦躁萬分的三關大將孟二爺不發點小脾氣呢！(文藝報 1956 年第 18 期)

“怎能不使”等於“必然要使”，但下面又用“不”字，反而變成“孟二爺不發點小脾氣了”。第二個“不”字應刪。(斯爾登)



# 书刊评论

《小学词典教学基本知识讲话》，張世祿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第一版。32开，82页，定价0.26元。

这是一本关于汉语词典基本知识的通俗小册子。虽然著者在本书序言中说“是供小学语文教师参考的”，我们认为对于想知道一些词典知识的一般读者也有用处。

这本小册子有下面三个优点：第一，所谈的问题较全面，文字和例子也很浅显。例如：对于词典学的一些术语、词和字的分别、同义词和反义词、社会生产的发展对词典的作用、汉语词典的一般构造等方面，著者都深入浅出地作了介绍。第二，著者还着重讲解了词的音读、词义的辨别、词的缩减规律以及如何正确地运用词典，等等。这对汉语词典的规范化工作有良好作用。第三，本书除了第六讲专讲词典教学的方法外，在其他几讲中也经常结合各节内容来讲教学方法。对小学语文教师有参考价值。

这本小册子有某些地方读者应该注意。例如：第一讲第四节中，著者认为在教学生阅读时，一定要指导他们按照“连写办法所显示出来的词的单位来念、来讲、来认识各个词的办法”，认为按照词儿连写的办法念，“又好听，又容易懂”（第8页）。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并不是要我们教小学生朗读课本或说话时词与词之间都有停顿，而是要学生明确词的概念以及词和字的区别。第六讲第二节谈到指导儿童读音的问题，著者认为在教注音字母时，可以“用字母形象上所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来跟字母的读音联系。如……‘x’就是‘交互’的互”（第64页）。这种方法值得考虑，它有时很可能要影响到读音的准确性。第六讲第五节还要求在指导儿童运用词典时，要跟语法教学结合进行，“确定各个词语在句子中的地位，也就是从它们的配合关系来辨别词性：如‘需要’是动词，后面可带宾语，‘必须’是助动词（或者归入副词），不能直接带宾语，常常用在另外一些主要动词的前面。”（第81页）对小学语文教师和小学生提出这种要求是不很切合实际的。（雪扬）

《怎样对幼儿进行语言教育》，源良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一版。32开，26页，定价0.08元。

本书副标题是“关于巴甫洛夫的两种信号系统学说在幼儿语言教学中的运用”，内容包括“绪言”、“两种信号系统学说的一般概念”、“怎样发展儿童的言语”、“语词在儿童认识客观事物过程中的作用”、“在语言教学中儿童两种信号系统的相互作用”、“语言教学的一般过程”等六节。

在过去，语言学家们对儿童的言语方面的论述不多，应该说，作者做了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虽然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概念理解得还模糊，对语言和心理的关系说明也不够具体，但是，作者能从儿童的言语活动的具体环境和言语的成具

过程出发，解释了巴甫洛夫两种信号的作用，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祖力）

《谈谈汉语规范化》，王了一著。工人出版社，1956年8月第一版。32开，36页，定价0.10元。

这本书包括“什么是汉语”、“什么是规范化”、“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怎样推广普通话”等七节，概括地说明了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的作用。

目前广大的人民群众都非常关心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问题，作者能用通俗的文字解释这些问题的道理，应该说很有意义的。（实）

《简化汉字问答》（文字改革小丛书），江成编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9月第一版，32开，36页，定价0.09元。

汉字为什么需要改革呢？汉字是不是可以改革呢？可以的话，它的方法和步骤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些基本问题有全面而透澈的理解的人现在还不很多，这就需要《简化汉字问答》这样的小册子来多做一些宣传工作。本书用问答的方式通俗地解答了在文字改革方面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其中也谈到了一些文字的演变，汉字的构造、构词法、正音法等基本常识。虽然本书还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在讲述汉字的缺点的同时，很少谈到汉字在我国文化上的伟大贡献，在举例时没有结合已经公布的简化汉字表，但是作者在讲述上面的基本问题时讲得很透澈。作为一本宣传文字改革的小册子来看，这书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光）

《改病句》，王自强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第二版。32开，42页，定价0.11元。

《改病句练习》王自强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10月第一版。32开，72页，定价0.17元。

《改病句》这本小册子，从报刊和稿件里摘录下许多比较有代表性的病句，分为“用词不妥贴”、“结构不完整”、“表达不周密”三大类，一一加以改正。

《改病句练习》的分类比较多。每一类的名称比前书通俗。如不合逻辑称为“两头不等”，“不合道理”；修饰语用错称为“张冠李戴”等。这两本书对于学习语法修辞的人和中小学语文教师是有帮助的。

后一本书，所举的例句，有时候似乎有些“吹毛求疵”，如“不合道理”中第27例句：“他临去把所有的书都带走了，只留下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作者以为“既然‘所有的书都带走了’，怎会‘留下这本’？”因而把它改为“他临走时只留下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余的书都带走了。”其实原句的意思是强调留下《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与“所有的”发生矛盾，但一个“只”字是可以解决矛盾的。经修改以后，句子的重心就落在“其余的书都带走”上面去了，反不如原句的好。（慎）

《好句子和病句子》，丁羽著。通俗讀物出版社，1956年10月第五次印刷。36开，54頁，定价0.13元。

这是一本非常通俗的講解語法修辭的小册子，包括13节和一个“附：答案”。作者在“前面的話”中說，本書內容大致可分四个部分：（一）詞义的配合和复音動詞的用法（1—4节）；（二）虛詞的用法（5—6兩节）；（三）句子的結構（7—10节）；（四）修辭上的其他問題（11—13节）。作者在介紹語言的基本知識時，盡量避免運用術語，這對初學文化的人是有好处的。

但是書中的修改还不够仔細，有經過修改后和原来句子的意义有出入的。如“我过去學習不積極，現在認識學文化有很多好处。”（原句）改為“我过去沒有認識到學文化有很多好处，學習不積極。”很显然，修改句只說了过去的學習情况，而拋棄了現在對學文化的認識。照理應該在“不積極”之后加上些东西才能接气。此外，練習的答案有些也沒有改好，这就不多舉了。（佳）

《語法和語法教學》，張志公主編，王力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10月。32开，324頁，定价0.80元。

这是一本供中學語文教師參考并供其他語法學習者閱讀的書，編寫這本書的主要意圖在於說明中學漢語課本的語法系統。全書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漢語編輯室介紹漢語課本中語法系統的产生过程和內容梗概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簡述；第二部分是王力、任錫善先生等說明語法教學中几个重要的原則性問題的四篇文章；第三部分是王力、張壽康先生等闡述这个系統里在詞法和句法方面的各項論点的十六篇文章。

漢語語法體系的分歧一向給語法教學造成很大的困難。在全國中學實行系統的漢語教學以前，必須立即確定一個統一的體系，才能在教学消除混亂現象，增加教学效果。人民教育出版社漢語編輯室廣泛地吸收語法學界的意見，擬訂“語法系統”簡述，并根据这个體系編寫初級中學漢語課本中有关語法部分的教材，陸續出版，語法教學上體系分歧的問題可以說基本上得到了解決。

漢語課本的語法體系既然兼采各家的見解，同時在某些問題上又有它自己的處理方法，因此事實上就是一個不同于任何一家的新體系。這個新體系對一般中等學校的語文教師來說是生疏的。而且漢語課本現在只出到第三冊，一時還不能窺其全豹，無法了解這個體系的詳細內容。語文教師不能充分掌握這個體系，在教学時不免照本宣科，或者任意發揮。為了幫助他們對這個體系融會貫通，舉一反三，編寫這樣一本參考書是極有意義的。許多語法工作者集體擔任這個工作，正足以說明這個體系得到廣泛的支持，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

本書第三部分的文章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編寫意圖，可以在說明課本體系和提高教師業務水平方面發生良好的作用。其中個別的一篇在總結前人的研究成績和解決具體問題方面還達到了相當的深度。而《語法體系和語法教學》一篇，對於體系分歧的原因和必須統一教學的道理，也作了淺顯而又詳盡的說明，在幫助語文教師澄清思想和放棄成見方面也一定會產生有力的影響。中等學校的語文教師應該

把這本書當作業務學習的主要資料。

但是這本書“編集倉促”，缺點在所不免，我們所看到的主要有下列幾點。

一、事前缺乏通盤的規劃，因此（1）選題不全面，詞類的說明中遺漏嘆詞；（2）各篇長短不一，深淺不一；（3）有的文章分析各家之說，解釋課本體系所以取舍的道理，有的文章只是根據《簡述》作一般性的介紹，有時甚至不及課本詳盡。

二、作者對課本體系的認識不同，因此各篇之間有互相抵觸之處。如《簡述》45節說“去吧！”“快點告訴我！”這種祈使句是省略句，46節說“隨手關門”“不許抽煙”這種“表示一般的命令或者禁止的句子”是無主句，顯然因為前者是對特定的對象說的，後者是對一般的對象說的。但是三篇文章中有兩篇與《簡述》的精神相符：（1）《句子的成分的省略和倒裝》中舉“不要掉隊呀！”“小心點啦！”做省略句的例（239頁）；（2）《單句、復句、復句的緊縮》中舉“小心觸電！”（標語）“堅決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標語）做無主句的例（313—314頁）。有一篇與《簡述》的精神不符：《漢語里的單部句》中誤舉“前進！”“走過來！”做無主句的例（307頁）。又如《簡述》42節說附着在句子上的嘆詞（后加逗号的）是獨立成分，47節說單獨成句的嘆詞（后加嘆号的）是獨詞句。但是三篇文章中竟然作了三種處理：（1）《漢語里的單部句》認為單獨成句的嘆詞是獨詞句（310頁）；（2）《談獨立成分》中說嘆詞“雖獨立句外，但和正文也有一定的聯系，所以我認為不是‘獨詞句’”（259頁）；（3）《單句、復句和復句的緊縮》和第2篇文章的看法適得其反，附着的和獨立的嘆詞一起認作獨詞句，同時把“哦，這種事怎麼能沒有意見呢？”認作復句（314—315頁）。①

三、寫作編校不夠嚴謹，因此措詞疏漏、舉例錯誤。前者如《漢語里的單部句》中分獨詞句為五類，第一類就是“用嘆詞表示感嘆而成句的”（310頁）；但是下文反復地說“獨詞句一定是名句”（311—312頁），就不能概括這一類。後者如《句子的基本成分》中誤舉“王冕七歲上死了父親”做呈現句的例（216頁）②；又如《關於漢語構詞法》中誤舉“風化”一詞做實詞素加虛詞素的例（108頁）③。至於“噴氣式、標本式、馬特洛索夫式”的式，作者認做虛詞素，並以為“它加在動詞素、名詞素後面，使整個詞成為形容詞”（108頁）。“式”字的虛實還可以斟酌，但是由它構成的詞應該是名詞性的（試看“我學會蛙式了”）。因為形容詞能單獨做謂語，而這種詞不盡能做；形容詞一般地要加“的”字構成“的”字結構才能判斷詞組成合成謂語，而這種詞不需要加（如“這是噴氣式”）。

四、還是寫作編校不夠嚴謹，因此各篇體例不太一致，甚至同一篇中也有參差。如《句子的基本成分》中“用符號Ⅱ分

① 本刊編者按：課本第四冊中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已經修改，凡是感嘆語、稱呼語、應對語都認作獨詞句，這種獨詞句附着在另一個句子上時有獨立成分的性質，不是復句中的分句。

② 《漢語里的單部句》一篇中說：呈現句的作用“只在於敘述存在着或者出現着什麼事情，因此沒有主語；有時加上主語而說：‘我有許多朋友’、‘他走露了消息’、‘花園的技工正在種着各種各樣的花呢’，這就是另外一種句子結構……”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③ 請參看《辭海》注釋并比較“氧化、電解”。



开主語和謂語”(評介者案应称主語部分和謂語部分)。遇到主謂結構作句子成分时有加“||”的,如“同志們||都說我||变了”一組四例(214—215頁)、“哭得眼||都紅了”一組兩例(218頁);也有不加“||”的,如“我||問他們王福榮的思想是不是进步”(214頁)、“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哭”(221頁)。

基于上述的情况,我們有兩点具体的建議:(1)讀者閱讀这本书时要审慎,要加以鑒別,不能照單全收;应该密切注意序文中“万一各篇文章里在某个地方有講得不一致的情形,在教学中以課本和参考書的講法为准”这句话。中学語文教师最好在可能条件下組織小組學習,进行討論,遇到疑难时請編者解答。(2)这本书在教学上能發揮一定的作用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其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錯誤徒乱人意,可能引起相反的效果,希望出版者能够履行“再版的时候修正、补充”的諾言。(方砚田、黎方)

《經詞衍釋》,清·吳昌瑩著。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重行。32开,214頁,0.85元。

《經詞衍釋》是根据王引之《經傳釋詞》的内容触类引申、推衍补充而成的。这書写成于《釋詞》之后約七十多年,著者的身世不很清楚,最初刊行的年代也待考查。上海古書流通处曾經刊印,但也沒有注明年月。这書的刊本不多見,現在中华書局排版重印,是很有益的。重印本也沒有說明所据的是什么本子,或者仍旧是根据古書流通处刊本翻印的。

这書在《釋詞》所收160个詞以外增加了23个虛詞(从、但、舍、第、宛、果、必、誠、审、举、百、又、合、职、会、頁、既、遂、公、方、才、何、此)。它的体例是先列举《釋詞》对某一虛詞的解釋(如[与]《經傳釋詞》曰:与,“及”也。常語也。与,犹“以”也。与,犹“为”(平声)也。与,犹“为”(去声)也。与,犹“謂”也。与,“如”也。与,語助也。(凡七义)。其次就《釋詞》的解釋补充例句,共补充了114个詞(如[於音烏]《經傳釋詞》曰:於、歎詞也。衍曰:《孟子》:“於!答是也,何有?”於讀烏音,歎詞也)。又其次就《釋詞》未尽之义,加以推衍,共推衍了71个詞(如[許]《經傳釋詞》曰:許,犹“所”也。衍曰:《詩》:“昭茲來許。”傳曰:許,“进”也。进訓曰“益”,“多”也)。它引用的書多于《釋詞》:如《孙子兵法》、《墨冠子》等,《釋詞》都未引用。它对《釋詞》所引例句的解釋也間有不同的看法(如[与]与,犹“为”(平声)也。《孟子》:“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鑽穴隙之类也。”与亦“为”义,为犹“是”也。見“为”字詁。《釋詞》訓此“与”曰語助。又[即]衍曰:即,犹今人言“即今”,故孙炎《尔雅·釋詁》註曰:“即,犹今也。”《左傳》昭十三年:“即欲有事,何如?”謂今欲行一事也。《釋詞》訓即為“若”)。它补充詞义的根据,主要的不出《釋詞》已分析过的范围,如《釋詞》中有:[候]《尔雅》曰:“伊維,候也。”[伊]“伊”有也。[維(惟)]“惟、有也。”这几个詞的意义相关,它把这些詞义輾轉比較后,在[候]字条下說:“《尔雅》曰:‘伊維,候也。’伊維并訓曰‘候’,則候自訓伊,訓維矣。伊維并訓曰‘有’則詞亦可訓為有矣。此义《釋詞》不載”这种演繹的办法,在补充《釋詞》的疏漏方面是很有益的。(鄭梅)

《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二集)》,彭楚南等譯。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第一版。32开,95頁,定价0.46元。

近几年来大家在語言学各个部門的研究工作中都在积极

學習苏联先进的語言学理論,可是能够清楚地了解苏联語言学的发展全貌和目前整个情况的并不多;常常有人征引苏联語言学者的理論或材料,苦無綫索,也有过因各人理解不同或征引錯誤而發生爭執的情况,这都說明,徹底了解苏联語言学,特别是1950年苏联語言学問題大爭辯以后,各个部門已有的成就以及如何發展起来并將向什么方向發展,确是十分必要的。現在我們看到《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二集)》所收的三篇文章,是很可以满足我們这种需要的。

这三篇文章是从苏联的《語言学問題》和《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两个杂志里譯出来的。第一、二篇是前者的社論,第三篇是B·B·維諾格拉多夫等在后者發表的“关于苏联語言学的情況和任务”。由于第一篇是举世注目的苏联語言学問題大爭辯后出版的《語言学問題》创刊号社論,其中首先对資產階級語言学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接着全面地叙述出摆在該杂志面前的苏联語言学各个問題和任务;所以它不但可以使我們認識到苏联語言学之所以先进,而且还提供出語言学領域应该研究的多方面的題目。本文虽然發表于五年前,可是从五年来苏联語言学的成就上看,就証明它当时提出的任务和方向是正确的。

至于最近苏联語言学的情況和任务,其次兩篇都談得很清楚,特别是維諾格拉多夫的文章中指出的“一些理論問題”和“語言修養問題”,很值得我們参考。

本書“譯者附言”特別指出讀者閱讀時要注意“其中(尤其是第二篇)难免有个人崇拜的成分”,这是必要的。(勞寧)

《談談現代漢語詞彙规范化》,王松茂著。通俗讀物出版社,1956年11月第一版。32开,35頁,定价0.10元。

本書一共分“关于詞彙规范的标准”、“吸收方言詞的规范”、“繼承文言詞的规范”、“关于外来語的规范”、“生造詞、縮簡詞、破裂詞的规范”等节。作者企圖用通俗易懂的文笔解釋漢語詞彙规范化的各个方面,以提高一般人对詞彙规范的認識。

这本书曾經以論文的形式在《教学与研究》月刊上(1956年11月号)發表过,現在不过加上头尾并略加修改成为單行本。文章中的結構和内容都与《現代漢語规范問題学术會議文件匯編》(現代漢語规范化問題学术會議秘書处編,科学出版社,1956年7月出版。)一書中郑奠的《現代漢語詞彙规范化問題》一文差不多,仅仅是扩充了一些例子和說明罢了,而作者始終都沒有只字提到过郑奠的文章。这是不应当的。(元直)

《漢語的主語賓語問題》(中国語文叢書之一)。中华書局,1956年12月第一版。25开,233頁,定价0.85元。

《語文學習》从1955年7月發动討論漢語句法中的主語賓語問題,历时十月,陸續刊載了三十來篇文章。到1956年第二季度开始,因为編輯任务明确規定以密切配合中学語文教学为主,討論終止,有不少留用的稿件未及發表,其中有兩篇是苏联漢語學者参加討論的譯稿。中国語文杂志社从这些文章和稿件中选集了三十篇,收做《中国語文叢書》之一。

主語賓語問題是漢語句法中的一个特別重要的問題,在前一时期的語法學者的著作里始終沒有得到比較接近的看



法。这一次的討論是以前人的成績做基礎，把這個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對若干癥結作出了比較深入的揭露。參加討論的同志即使在分析具體的句子時不免意見參差，因此結果不同；但是在原則問題上幾乎一致同意應該把結構和意義結合起來考慮，不能偏執一端。這個認識上的一致是這次討論的最大收穫。參加這次討論的同志里面，有語法研究者，也有語法教學者，有前輩的語法學家，也有年青的語法工作者，因此討論中所發表的意見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而本書在選編時似乎也酌量兼顧到作品廣泛的代表性這一特點。

《語文學習》編輯部對這次討論並未作出總結；但是1956年4月號上有張志公同志的一篇《關於漢語句法研究的幾點意見》，說明了這次討論的性質和收穫，同時陳述了今後句法研究應循的方向。這篇文章本書未收，讀者可以參看。（梁吟）《語言調查常識》（中國語文叢書之一），馬學良等著。

中華書局，1956年12月第一版。24開，175頁，0.75元。

本書是1956年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籌備處和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合辦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訓練班上的

集體講稿，出版時經過修訂。全書分十講，由馬學良、羅季光、傅懋勳、喻世長、王輔世、金鵬、李森等人分別擔任一講或二講。其中《怎樣分析語音和描寫語音》和《怎樣分析和記錄漢藏語系語言的聲調》兩講曾在本刊1956年5、6兩月號先後登載過。本書的特點是：（1）比較全面地講論了與語言調查有關的理論和方法，對於語音方面的講得尤其詳細。（2）講授人都是多年來從事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的專家，所以每一講都能結合語言調查的實際經驗來講，能引用我國各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的許多例証來講明白分析語言、記錄語言以及編寫調查報告等方面的具體方法和手續，也能切近地闡明在調查語言時必須明白的某些基本理論，例如關於音位的理論。書中也適量地介紹了一些蘇聯在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中的先進經驗。（三）因為本來是講稿，所以在內容上說理詳盡，在文字上淺顯明白。

本書雖然當初是為訓練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幹部用的，舉例也偏重在少數民族語言方面，但是對於漢語方言調查工作也很有參考價值，一般的語文工作者也能從這裡得到許多有關語言學和某些語言的實際知識。（因夢）

## 複合句和停頓

——對胡附、文煉《現代漢語語法探索》的商榷之二

孫毓莘

胡附、文煉兩位先生反對把停頓當作區別複合句與簡單句的重要標準。他們認為：“把停頓來區別簡單句和複合句，在某種場合是有点效用的。”例如：

我知道那位同學很用功。

我知道那位同學，很用功。

前一例是簡單句，賓語是個句子形式，後一例是複合句，包括兩個分句。“但這並不等於說停頓可以作區別簡單句與複合句的主要標準。……有停頓的句子不一定是複合句，……複合句也不必一定非有停頓不可，例如：‘你上哪兒我也找得着！’‘你有力氣你擡吧！’句中雖然沒有停頓，但是我們仍以把它們看做複合句為宜”。（150—151頁）

作者認為看做複合句為宜的這兩個例子，是轉引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語法講話》的。

《語法講話》在複合句一節的結尾處說：“複合句也有當中可以停頓而不停頓的，例如：

你怕丟人你走開！（趙樹理）

你不問我替你問！（趙樹理）

你上哪兒我也找得着！（老舍）

放了你你還不快回去！（趙樹理）

一開春天就長了。

這幾個例句，當中全可以停頓”（見《中國語文》1953年6月號28—29頁）。《語法講話》的作者儘管指出了這些複合句中可

以停頓而沒有停頓的實例，但是並不妨礙他們採取“並列的謂語都在主語後頭，中間沒有停頓，也算是複合句”的主張。因為根據有無停頓來鑒別，“吳天寶人小，器量可大”和“張先生胆大心細”這兩種句子，還是很有用處的。胡、文兩位先生轉引了上述的例子，從而反對有無停頓這個標準，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用特殊推翻一般的做法。因為現代漢語的複合句中雖然不一定都有停頓，但是究屬以有停頓為常。作者轉引的兩例，其一出于《趙樹理選集》；這種句子在趙樹理的作品中比較多，但是根據粗略的統計，全書中也不過十句。<sup>①</sup> 其二出于老舍的作品；這種句子在《老舍選集》中就更少見。我們認為“一般的現象，特殊的現象，個別的現象，必須分別對待，否則我們就會失迷在錯綜複雜的語言現象之中。”<sup>②</sup> 因此有無停頓仍然不失為鑒別複合句和簡單句的一個重要標準。

① 1. 你有力氣你擡吧！2. 你怕丟人你走開！3. 我趕到那裏人家就問罷了。4. 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5. 你不問我替你問。6. 放了你你還不快回去。7. 人家說個話你偏要亂吵！8. 人家要說理咱怎麼辦？人家要翻了臉咱怎麼辦？9. 他會說咱不會說。

② 張志公：《關於漢語句法研究的幾點意見》，見《語文學習》1956年4月號。

## 信箱

### 多叠并列的最后两叠之間

#### 加“与”類連詞的問題

##### (一)

蕭斧同志的《再說“与”類連詞在多叠并列中的位置》一文(見本刊1956年8月号)中論到为什么現代書面語中只有少数人在三叠并列詞語之間用兩個“与”類連詞,認為原因之一是受了歐洲語法在最后兩叠之間加并列連詞的影响。不特蕭斧同志這樣說,很多語法專家也是这样說。例如黎錦熙同志也說過:“近年通行歐化的句法,連詞‘和’以放在最后兩名詞之間為原則”(見《中國語法教材》第一冊,55頁)。高名凱同志也說過:“歐洲語的情形,在一大串的并列关系之中,最后一个并列关系之間大半加上一個連詞”。(見《普通語言學》下冊,221頁)。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理由是多叠并列中最后兩叠之間加并列連詞並不是歐洲語法所創始的,中國古籍里很早就出現在最后兩叠之間加并列連詞的形式;例如:

叔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与孤耳。”(資治通鑑,赤壁之戰)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驃騎。(世說新語,政事第三)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以上都是在最后兩叠之間加“与”的例子。還有,古漢語里作用和詞義跟“与”字相近的還有“暨”、“以”,“惟”等,它們的位置,有時也放在最后兩叠之間;例如:

禹拜稽首,讓于禪,契暨皐陶。(書,堯典)

天大雷雨以風(書,金縢)

齒革羽毛惟木。(書,禹貢)

因此,現代漢語里,在多叠并列中最后兩叠之間加“与”類連詞不一定是受歐洲語法的影响。與其說是受歐洲語法的影响,毋寧說是沿襲古漢語的好。(斯爾鑫)

##### (二)

現代漢語的“与”類連詞常常加在多叠并列的最后兩叠之間是受歐洲語法的影响,誠如斯爾鑫同志所說,這的確是很多語法專家一致的看法。除了斯爾鑫同志所指的黎錦熙、高名凱兩位先生之外,還有別位專家也說過類似的話。如王了一先生在《中國語法綱要》(第四章)里說:“和”字的用不用,是很自由的。依中國的舊習慣,还是不用的時候居多。但是,近年有些人因為受了西洋語法的影响,遇有三項以上的等立仿語時,就只把

“和”字放在末項的前面。例如:“三國就是魏、蜀和吳”,“古人把紙,墨,筆和硯叫做文房四寶”。又如呂叔湘、朱德熙兩先生在《語法修辭講話》(第三講第四段)里說:“和”的用法(“与”字同)有一個限制:兩個部分用一個“和”字連接,三個部分就不用兩個“和”字連接,例如“你和我和他”听起来就不順耳。①遇到這種情形,有三種應付方法。第一種是傳統的办法,就是索性都不用連接詞,第二種办法是模仿歐洲語言,只在最后兩個部分中間用連接詞,……(按重點號是我加的)

各位專家都說只在最后兩叠之間用“与”類連詞是模仿歐洲語言或受了歐洲語法的影响,這樣說法是不是意味着古代漢語里面沒有這種用法呢?不是的,我相信斯爾鑫同志所舉的這類句子,專家們在中國古籍里也都看見過。那麼他們的話應該怎樣理解呢?

依我看來,多叠并列之間“与”類連詞的傳統用法是富于變化的;以三叠并列為例,可以有四種形式:

(一)甲、乙、丙——取鷄、狗、馬之血來!(史記,平原君列傳)

(二)甲+乙+丙——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論語,子罕)

(三)甲+乙、丙——陳靈公与孔宁、儀利父通于夏姬。

(左傳,宣公9年)

(四)甲、乙+丙——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左傳,庄公19年)

但是現代漢語中的用法起了演變,除熟語中一般还是不用“与”類連詞外,逐漸趨向於第四種形式。所謂模仿歐洲語言或受了歐洲語法的影响,就是針對這種“从分散到集中”的演變來說的。我的理解是這樣,不知專家們的本意怎麼樣?至少我在另一篇文章(見《語文學習》1953年3月号)里說過“祖國語法是不一定把它(指“与”類連詞)加在最后兩叠之間的”,可見并未從傳統用法中排除第四種形式。

話呢,可能大家都說得不太暢達;但是文章的意思还是可以捉摸的。比如讀前引的“傳統的办法,就索性都不用連接詞”這一句,就不能一口咬定是意味着“傳統的办法只有不用連接詞這種形式”。要是我們認識到其間有一般和特殊,多數和少數的分別,那麼前一句話的意思也还是可以領會的。(蕭斧)

① 這句話有點疏忽,其實呂先生自己也受了傳統用法的影响,在《中國文法要略》(第二章)里就有這樣一句:“我們把‘牛狂奔’里面的‘牛’和‘奔’和‘狂’也定為甲乙丙級。”



## 中国語文叢書

### (一)截至1956年12月已出版各書

- 論漢語(康拉德著,彭楚南譯) 0.30元
- 中国文字拼音化問題  
(郭沫若等著) 0.47元
- 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較  
(陈越等著) 0.55元
- 国内少数民族語言文字的概況  
(罗常培等著) 0.71元
- 中国文字改革問題(郑林曦等著) 0.60元
- 漢語的詞儿和拼写法(第一集)  
(林汉达等著) 0.55元
- 漢語的詞类問題(第一集)  
(賀重等著) 0.65元
- 汉字的整理和簡化(丁西林等著) 0.56元
- 汉族的共同語和标准音  
(王力等著) 0.80元
- 簡化汉字問題(吳玉章等著) 0.50元
- 漢語的詞类問題(第二集)  
(高名凱等著) 0.75元
- 拼音形声字批判(曹伯韓等著) 0.36元
- 語言調查常識(馬学良等著) 0.75元
- 漢語的主語宾語問題  
(呂冀平等著) 0.85元

### (二)在排印中

- 北京話輕声詞彙
- 普通話和方言叢刊(第一本)
- 普通話和方言叢刊(第二本)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新 書

- 成人識字教學 教育部工农教育局 0.20元
- 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批判第三集  
文化教育出版社編 0.36元
- 小学音乐教學法  
苏联 魯美尔等合著 丰子愷等譯 0.50元
- 青年工人学校算術教學法  
苏联 契克馬列夫著 魏庚人譯 1.40元
- 小学教學實驗園地  
苏联 札維塔耶夫著 王汶譯 0.24元
- 学校和教師經驗的研究和總結  
苏联 穆恩·斯卡特金著  
哈尔滨外語專科學校教材編譯室 0.48元
- 苏联普通教育法令选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翻譯室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學研究室翻譯室 1.20元
- 苏联中学体育 足球教學大綱  
团体运动部 俄罗斯苏維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編訂 0.10元
- 苏联中学体育 排球教學大綱  
团体运动部 俄罗斯苏維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編訂 0.09元
- 苏联中学体育 田徑运动教學大綱  
团体运动部 俄罗斯苏維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編訂 0.11元
- 苏联中学体育 游泳教學大綱  
团体运动部 俄罗斯苏維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編訂 0.11元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化教育出版社  
新華書店發行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年1月号

总第55期

1957年1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總發行处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郵電局、所

代訂 全国各地新華書店  
代銷处

預定：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1. 平郵寄費不計，2. 挂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38,395